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推动历史进程的  
巨人演讲——

世纪回声(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世纪回声（下）

## 秋瑾

### 敬告二万万女同胞

——1904年10月在日本担任“演说练习会”会长时的演讲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项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说，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么？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天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甚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甚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黑奴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着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辨，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甚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既做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也觉得难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缠足。幼年姑

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定。有钱作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作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黄兴

革命青年的责任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孙先生所说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条理；章先生所说的，是革命实行时代的政策；各位来宾所说的，是激发我们革命的感情。大抵诸君听见，没有不表同情的。但是兄弟所望于诸君的，却还要再进一步。“表同情”三个字，不过是旁观的说话。凡是革命的事业，世界人人都表同情的。惟有自己的国民却不是要他表同情，是要他负这革命的责任。（拍掌大喝采）诸君现在都是学生，就拿学生的责任来说。1817年的时候，奥国宰相梅特涅利用俄皇的势力结神圣同盟会，压制革命党，得普王的赞成，到了十月，开宗教革命三百年祭同利俾塞战胜纪念祭，耶路大学学生齐去市外运动各州响应，革命党从此大盛。这样说来，欧洲大革命的事业是学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日本的革命，人人都推西南一役。那西乡隆盛所倡率的义师，就是鹿儿岛私立学校的学生。这样说来，日本革命的事业也是学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诸君莫要说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得要尽那革命的责任。（拍掌大喝采）今天这会，就是我们大家拿着赤心相见，誓要尽这做学生的本份的。（拍掌大喝采）

孙中山

尊师重教

——1912年5月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

今日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开会，欢迎兄弟到校，兄弟对于此校，极为赞成。惟有一言为诸君告，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万种事业皆由此时发起，由此时举办。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甚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皆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今诸君发起此校，诚得要务。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其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师范第二校，生徒达百七十人，将来此百数十人，各担荷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

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诸君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即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国。但今乃军政时代，正宜上下一心，补救政府，巩固教育，诸君能竭力维护，兄弟有厚望焉。

## 李大钊

### 今

——1918年4月

我以为世界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宝贵。

为什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什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地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制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薪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予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沈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只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以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邓中夏

劳动万岁

——1922年9月在劳动界招待议员开会时的讲话

今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工会代表为劳动立法事招待议员先生，承议员先生惠然肯来，我们十分感谢，而且很荣幸的。我们为什么要招待议员先生呢？诚恳的来说：中国劳动阶级法律上向来是没有保险的，约法上未订，天坛宪法上也未定，我们认为极不满意。幸此次议员诸君来京重新制宪，十分可庆，但是我们必定要求为劳工规定权利。这个有种种理由。简单来说：中国既为民国，所谓实行全民政治，当然全国人民皆有权利。即退一步讲，根据“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劳动阶级实占人民的绝对多数，如只少数人得利益。实在不平之极。而且，劳工是社会的柱石，没有劳工，也就没有社会了。这还是就理论上讲，即按人情来说，劳工每天作工卖力气而视同牛马，未免太不平等了。没有劳动阶级，便没有社会，世界全由劳工造成，利益当然要定。况且工人每天作工十余小时，困苦不堪，工资甚少，养己且不足，甚且家困以至于死，此更就事实上看。于正义人道方面，对于规定工人权利不能说不是应当的。不论说理说情，都应该为我们规定劳动立法。但是也许有人以为照劳动法所定，八小时工作，在工业未发达的中国，未免反使实业不能发达，而且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之中国无聊代表，且曾言中国不适宜于八小时工作，实在不对。因为时间减少，未必出产减少，且依照欧美往事记之，反见产品精良，因人在疲倦时候作工，总是作不好的。又有人以为工人利益太多，资本家自然损失太大，于是他们不愿拿钱出来办实业，岂不更为害工人，实在也错了。资本家有钱，决不愿不使之生利，更不能由工人利益稍多于他们；只有些须损失，而不使生利，欧美便是前例。但在此我们希望应有极大觉悟，就是我们中国在此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与压迫之下，想照欧美资本家那样发达，是不可能的。所以不但是劳工之苦，实亦中国资本家之苦。故中国资产阶级，亟应觉悟非与本国劳动阶级携手，即不能使中国产业发达，因非如此不能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否则便是自杀政策，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要求，在各方面来看，都是应该的。诸君七八年来，为国奔走，饱经忧患，我们希望诸君不愧为人民代表，把中国绝对多数人民的幸福，切实制定一下。我们的请愿书，想早已在洞鉴之中，我们要求的要点是：第一要求工人集会言论的自由，因各界都有会社，而独于工会禁止，实为不平。第二要有同盟罢工权，这也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年来国务院、参谋部、教职员——均有罢工，而独于工人罢工，视为骚扰罪，殊非合理。第三要有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因工人个人与资本家结的契约多吃亏。第四要求国际联合权，资本家可以有国际联盟，我们就不可以吗？第五要求八小时工作，此在欧美已通行，且有六小时者，我们此举，并不过分。第六要求增加工资，因为物价贵了，不如此不能维持生活了。第七要改良待遇，如卫生法、工厂法均须规定。第八要有参加工厂管理事务之权。第九工厂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大体如此，我们希望并相信议员先生，肯本良心的主张，达到我们的期望，并乞赐教。

最末主席希望议员先生们真诚的援助我们，不要欺骗我们。我们已觉醒了，知道何好何坏了。赞助的我们知道，当感谢；不赞助我们或欺骗我们的，我们也知道，当有相当方法对待，而且还有一层；劳动法即能成立，可否实行，实不敢言，约法便是前例。为其阻碍的，便是军阀，我们打倒军阀，我们费千辛万苦幸而成功的劳动法，必为军阀不费气力的推倒，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做外资的奴隶，军阀，依为护符，以致内乱迭次延长，至无已时，所以国际的资本主义不打倒，军阀也难打倒，而我们劳动立法上的幸福，也实难享受。最后主席请大家起来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劳动万岁”！

李大钊

## 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

——1923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的演讲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行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到一种冒险的美趣。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也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 孙中山

### 什么是革命军？

——1924年3月在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路将士出征前的演说

东路将领兵士诸君：

诸君是许总司令和张旅长的部下，许崇智同张民达都是革命党很热心的同志。你们各将领大多数也是革命党，所以东路讨贼军的长官都是革命党。大家当兵士的今天到这地来听本大元帅讲话，试问诸君是不是革命军呢？许总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党，诸君当然可以叫做革命军。但是本大元帅今天来同诸君讲话，还不放心把革命军的名号，加在诸君身上；就是诸君将来可不可以说是革命军，还要看以后的成绩。

此刻在广东的军队，有滇军、湘军、豫军、粤军、桂军、赣军、山陕军，总共有六七省的军队，都来为革命党出力。但是依我看起来，没有哪一种军队，可以居革命军的地位。本大元帅有一天对湘军讲，希望湘军变为革命军。今天来同很好革命党的部下讲话，也是希望变成革命军。以前为革命奋斗，虽然不能叫革命军，但希望从今天听过这番话之后，便要变成革命军。要怎么样才可以成革命军呢？什么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是用一个能打得十个，一百个能打得一千个，一千个打一万，一万打十万，像这样用一倍去打十倍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你们东路讨贼军打的仗本来很多，但是过细考察起来，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万人呢？打败仗的时候，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东路讨贼军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两千人，但是总没有用一千人去打一万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党的领袖，很想造成一种革命军。现在的军队都不是革命军，只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起义的军队，才可以说是革命军。当他们起义的时候，在广州的清兵，在满州的驻防军，有李准的水师，有张鸣岐的陆师，总计算起来，不下五六万人。革命军的人数不过两三百人，那里有今日这样多的军队呢？当时的武器不过是手枪炸弹，哪里有今日这样多的军队呢？当时的武器不过是手枪炸弹，那里有今日这样好的长枪、大炮呢？那样少的人数，只用手枪、炸弹，一经发动，便打进水师行台和总督衙门。后来因为约定的外援没有赶到，便完全失败。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岗。所以黄花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军，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称为革命军！假若当时我们的革命军有三千人，或者敌人只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当时广州的清兵不止三千人，有了五六万人。我们的革命军，又没有三千人，只有两三百人。众寡悬殊，所以结果归于失败。至于以战论战，当时城内之战，可算是成功。那次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便用一个人去打两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军，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他。我现在所希望的，不能说是用一个人去打两百人的军队，总要希望革命党的部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小的程度，要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如果不能，便不能当革命军的名义。我在战场上常常教兵向前进，官长总是说：“前面的敌人有好几百啊！我们的队伍只有一二百人，怎么能够前进呢？”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拿一点奋斗的精神出来，教兵士开枪冲锋，把敌人打死他一些，他们就要寒胆。到了敌人寒胆，就是他们的人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长官又说：“难道敌人没有枪吗？难道敌人的枪不打人吗？”因为他们都不是革命军，所以我不责备。诸君今天知道了什么是叫做革命军之后，就要常思想：到底有没有这种道理？如果是有这种道理，便要用一个人打十个人，你们就是被敌人打死了，也可以陪葬黄花岗，留名千古，如果不然，你们将来死了之后，不但是不能陪葬黄花岗，万古留名，就是现在活在世上，也没有人知道。

诸君在通常打仗的时候，挑敢死队做先锋，就是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但是这样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必要用多钱，悬大赏。军队打仗要多钱，便不能算是革命军；要有多钱去打仗，那便是为钱去拼命，不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变成革命军，便是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为什么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呢？因为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所谓仁义之师。这种死法，是为主义而死，不是为金钱而死。像从前沈鸿英造反，打到瘦狗岭来，死了很多的兵士，但是那些兵士是为金钱而死的，至今谁去纪念他？如果是为主义而死的，像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就是千载之下，都要来纪念。大家以后去拼命，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必须为主义去牺牲，不要为金钱去牺牲，才叫革命军。

关于革命成功和自己有什么利益？如果大家能够答复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革命，便能够成功。若是大家都明白这个问题，变成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的革命军，你们东路讨贼军现在有一万人，便可以打十万敌人。现在霸占中国的有多少敌人呢？此刻反对民国的，只有曹锟、吴佩孚。他们的亲部下，不过二三万人。其余都是势利结合的。譬如在广东就利用陈炯明，在广西就利用陆荣廷。敌人不过二三万，要消灭他不必要东路军的全部，只要诸君的这二三千人。把他们那些反对民国的敌人消灭了，中国便可以太平，子子孙孙便可以享幸福。在诸君看起来或者以为这是后来的事，和自己有什么利益呢？本来世界上的事，都是利益的问题，有利益的事，才人人愿做，没有利益，自然不情愿做。我们今天做革命党，和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本来是一个难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以为难明白，便不讲清楚。因为不讲清楚，便不能做革命军。诸君现在当兵士，有什么希望呢？普通当兵士的人，都是想升官发财。如果另外有方法可以发财，连官也不情愿做，所以大多数本是想升官发财，若是把升官发财两件事，比较起来，尤其以发财为最要紧。如果诸君问我：“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便要反问诸君：“发财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诸君一定可以答复我的。我也可以答复诸君：革命成功胜过一千万元的财，一千万元的财，是很难得到的。革命成功，便好过于发一千万元的财。诸君想发一千万元的财，不过是图安乐，想好衣食，想传到子孙；若是革命没有成功，国家便要亡，到国家亡了之后，像缅甸、安南（按：指越南）、高丽（指朝鲜）的亡国奴，哪一个能够保存他们的钱财，去图安乐谋好衣食传到后代子孙呢？如果革命成功，国家自然强盛，外国的经济压迫，自然无从侵入，本国生出来的财富，又好好的分配。那么，凡是中国的人民，都得安乐，有好衣食，可以永传子孙，这岂不是革命成功还要好过发一千万的财吗？

说到我们的革命，对外要用民族主义，挽回每年十二万万万的损失。对内要用民权主义，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去开矿，好像南洋矿商，把各种矿产开出来之后，大家都可以发财一样。此外，还有开辟交通，振兴工业，发展商业，提倡农

业，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黄金世界。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子子孙孙便不怕穷。我们的革命成功，把中国变成了黄金世界，不但是一个人的子孙可以享幸福，就是众人的子子孙孙，都是永远的享幸福。像用这样两种情形比较起来，诸君想想，是发财好呢？还是革命成功好吗？依我看起来，革命成功是好得多。说到此地，如果诸君问我，革命成功有没有利呢？我便要说，革命成功有大利，比较发财的利益要大得多。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便应该做敢死队，去拼死命。从前温生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够打死孚琦；诸君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便能够推翻曹锟、吴佩孚。所以我今天来和大家讲话，劝诸君不要做难事，去想发财；要做容易的事，把想发财的力量拿来革命，革命成功，便是为自己造幸福。你们的长官都是革命党，从前或者也听过了这种讲话。这次在东江打仗，虽然一时失败，但是从此以后，大家都变成革命军，去做敢死队，同心协力推翻曹锟、吴佩孚。我们的革命永远成功，中国便可以造成黄金世界，诸君的子子孙孙在这个世界之内，便永远可以享幸福。

廖仲恺

## 农民解放的方法

——1924年8月在香山县农民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各位耕田兄弟：

我是广东省长。现在是广东最多事之秋。并且正在战事中。我本来事情非常之多，每每要经早晨八点钟起来办事直到晚间一点钟才得休息的。现在抽身来此，到底为什么呢？如果为游游香山，则今非其时。我是有很大目的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看看我们的耕田兄弟痛苦成怎么样，艰难成怎么样，受什么压迫，要怎么样救济。

东海十六沙佃户多是香山人，耕田的也多是香山人，但是收税的都是顺德绅士。这劣绅压迫农民，大家于是以为非归还香山自治不行。这种事实，我以前早已听见了，并且在民国元年我做财政司时曾经切实调查过好几次。所以到去年我做省长，便决定了拨为香山人民自治，以免你们大家受顺德绅士压迫。在当时我以为这样便可以解除你们的痛苦了，岂知最近还常常听见你们依然很痛苦。但你们到底痛苦成怎么样呢？除了水灾一件之外，其他我多不大知道，所以特亲自到此间走走。政府有军队在香山来保护你们，但是地多人少，照顾恐不周到，所以要完全依靠政府来解救你们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要知道，要人家来帮助你，你先要自己帮助自己。好象一个人跌了落水一样，跌落水一定要人来救了，但救得生与否完全要看那跌落水的能够明白“怎样才可以被救得起的方法”与否。如果不明白呢，人家伸手来救，你却连身连脚都紧抱住他，那就一定大家都同归于尽了。所以现在要解救你们的痛苦，也要你们自己起来一齐自救，你们并且要明白解救的方法才行。东海十六沙，我本来已经交还给你们了。治得妥当不妥当，还是要你们也来负责的，我也很愿意负责的。现在我亲自落水来救你们了，准备替你们打不平了，替你们奋斗了。但是你们第一要晓得怎样被人家救，一拖你就上来，那么，我当带齐许多救生圈来解救你们。

我虽然做省长，但是手上带兵不多，广东虽是兵多，不过只是兵多也无用的，命令不行的，一定要有人民做后盾，才能使兵听人民的命令，才能解救你们。然则你们要怎样才可以自救呢？怎样才可以免除痛苦呢，什么才是自救的方法呢？我告诉你们“要免除痛苦，就先要自己预备力量、储蓄力量；好象要自卫，先要有刀枪一样。这力量是经那里来的呢？怎样去预备呢？他是从有组织、有团结来的。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好象一支小竹，一手便可打断了。如果把他捆成一大把组织起来，那就任你用刀来斩也难斩断啊！所以组织就是力量。力量是从团结得来的。现在，商人的组织有了，力量大了，政府也不能不帮助他，要取消什么捐税便可以取消了，这就是因为他有了商会。工人，近来也有了组织了，力量大了，政府也不能不乐于帮助他，要什么就可以办到什么了，这就是因为他有工会，因为有了组织才有力量。你们自己有了力量，政府来帮助你们才可以易于成功。现在还没有组织的，只是你们农民，所以你们最没有力量，最痛苦，最受人家压迫，人们应该从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预备好你们的力量。旧农会本来是有的，但这是同你们农民无关的，是一班绅士学者组织的。你们要自己起来组织一个真

正的农民协会。这个农民协会，就是我拿来救你们的救生圈。我现在抛出来救你们了，你们要从速起来接受！农民协会是怎样组织呢？他有很完善的章程，由国民党决定了办法，已经由省长颁布了。县长也有助长农民协会之责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自己起来组织，不能依靠他人！如果农民协会能够今天组织成了，我明天便可以解救你们出来。否则，虽有贤者也无可如何了！这个农民协会绝不是为我的，不是为政府的，也不是为国民党的，完全是为你们农民自身利益的！有了这个农协，那就你们一切痛苦都可以拿团体的力量直接去同县长、省长、大元帅交涉了，解决了，不必间接几十重，受人家欺骗愚弄了。

现在我已经把救生圈抛给你们了。你们接得到和接不到完全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完全在乎你们手急眼快了！

今天晚上我听听你们痛苦的报告，我早知道不只你们东海十六沙的农民是这样痛苦，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也是一样的痛苦。要解除这痛苦，你们通通都要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好象水灾、虫害几件事，如果有了农民协会就可以设法统一救济，全盘计划过，由总会和政府合力来治河捉虫了。一劳永逸，那才可以永远无水灾，无虫害，你们有许多人以为虫害是你们命运不好，这是不对的。虫害并不是命运所定，这完全是看你们晓不晓得怎样去扑灭他的问题。行运不行运，这是全在看你们晓不晓得。如果你们是晓得，大家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来扑灭他，那就虫害不是为害的。譬如现在有虫害发生了，如果你们没有联合，只是一个人自己去捉自己那块田的，固然未必能捉得完；就是只捉大黄埔这一条沙也是不能捉得完的。因为那虫子当他还没有成虫之前，他是许多飞蛾到外去飞，到处去产卵地下的。这些卵子都是你们所不见不觉的。到成熟，便通通长出来变成害虫了。到处都有，捉了这处，他处又走到来，捉他处，那处又长起来。捉来捉去，都是捉不完的。如果你们是有团结的呢，那就不同了。你们尽可在总农民协会里请出晓农业学识的学者来设法捉他了。你们有了法子，就可以限一个时日，全农民一齐动手来捉他了。能够全县一齐动手，那他就飞也飞不去了。这样，一年便可以灭绝他三分之二，到次年便可以把他永远灭绝了。如果你们没有团结呢，实无法可以动手一齐来捉的，那是不能把他灭绝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组织农民协会！有了农民协会，那就政府和国民党便可以设法和你们一齐合作起来解救你们。今天我来此间，完全是为这几个问题来的。一来看看你们痛苦成怎么样，二来给你们一个救生圈，要你们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救苦救难的，能够救苦救难的并不是观世音，就是农民协会！你们大家努力去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去罢！



## 孙中山

### 北伐的原因

——1924年9月在革命军北伐时的演讲

各界诸君，今日诸君在这里开赞助北伐大会，我们今日为甚么有北伐之举？大家知道，革命党自十三年前打倒满清专制政体；改立民国。在辛亥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都到各处宣传，由有知识学者，到各处宣传革命。各界亦都起来帮助。革命未起以前，满清把中国利益送给外人，如南方接近之安南缅甸被英法占了，高丽、台湾被日本占了，香港九龙被英国占了，上海被各国占了；内地之汉口亦被各国占了。革命党怕中国陷于双重奴隶，故出来宣传革命。而人民人人都欢迎革命。满洲人宁愿以国土送给外国人，不愿送给汉人。革命党怕中国沦亡，便提倡革命。

当时大家提倡革命，赞成革命，希望享共和幸福。民国十三年来，人民究竟享了几多幸福呢？不过是四分五裂、盗贼兵灾吧。有些知识薄弱的人以为这些痛苦是革命造成的：十三年前虽做满清奴隶，还得安居乐业，现在还比不上。其实革命事实，像拆去旧屋建筑新屋一样，这十三年便是旧屋已拆，新屋未成的时期。在此时期，倘遇狂风大雨，其景象当如何？有人以为旧屋虽然有倾倒之虞，尚可抵御风雨于一时，而以为不应当拆屋。这是何等错误！十三年来大家遇着大雨大风的生活，所以不能安居。但新屋建筑未成者，因为满清遗下之官僚军阀为障碍。当此之时，人民有的不忍舍去一片旧瓦，有的不忍舍去一块旧砖，不能彻底廓清，让一般官僚武人存在。这便是不能够建设之原因。满清皇帝虽推倒，而数十个小皇帝代兴，敌人民不能得安乐，反觉痛苦。尚有一个原因，国民自来做惯专制之奴隶生活，不问政府，故武人官僚敢这么放肆。

诸位应知道，民国成立而后，大家都是主人，而主人不能自己努力建设国家，故大家这样痛苦。大家以后应当觉悟努力。革命党为国民之先觉，奔走呼号，而国民甚少应之者，故民国不能成功。国民实不能辞其责。诸位应知道，中国好像一个大公司，国民是股东，股东不维持，公司便危险。国家建设而后，人民都享福，便和公司赢利、股东分息一样。

中国自通商后，工业失败，没有制造品出口。并且连自用之货都要用洋货，每年入口货多过出口货五万万。大家试想我们每年要送五万万给外国，我们焉得不危险！尚有外国在中国境内之工业、矿业、航业、陆运业、银行、租借地、割让地等等，每年约损失十几万万。再加以条约之损失，赔款及其利息之损失，实不止数十万万。大家都想自己发财，但极其量都不能挽回这么大的损失。国家既如大公司，则要大家都努力，将这每年数十万万的损失。完全恢复，中国自然会家富人足了，诸君总要努力，即建筑一间小屋，都要三数月才成功。一个大国家，当然不是十三年便可完成成功的。但现在离成功不远了，大家应当齐起努力。这次革命政府提师北伐，便是要将西南军队联络奉浙军队，扫除旧屋砖瓦渣滓垃圾之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这个责任，是要全国国民负责，大家要有毅力，来完成这第二层的建设工夫。

邵力子

时代潮流

——1924年6月的讲演

欲顺应时代潮流者，必须有历尽艰苦备受疑谤而不辞的精神。

我这句话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既已顺应时代潮流，那便应如顺水推舟，无往不利，功成名遂，众论咸归，还有什么艰苦和疑谤呢。不知就顺应时代潮流最后的结果而讲，固然应当如此；但在正进行的程途中，尤其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便必然遇着种种艰苦，而且疑谤之来，也决无从避免。明明是一条进化的轨道，但前进尚有许多荆棘。你要举步前进，爱你的必牵裾曳袂，说这条路是很危险的，走不得的，还是走旧路的好；仇你的更要说你别有野心，率众人而共入歧途。由专制而立宪，由君主而共和，在今日看来，是最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件事了；然而无论在那一国里，首倡这种运动的人，多是与牢狱为缘，甚至牺牲生命，暴徒乱党的头衔更是推辞不掉。时代潮流是永远前进的，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总有预察潮流所趋的人，而以反抗此因袭的社会为顺应潮流的手段，“乱党”之后，又有“激党”，理正在此。

宋庆龄

东西方妇女联合起来，为改造世界而奋斗

——1924年11月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的演讲

今天到这里来，我感到很愉快。衷心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我想趁此机会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题目——妇女运动，讲几分钟。我深深地钦佩日本妇女的许多突出的性格：通情达理，质朴，忍耐力，以及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这点尤为重要。这些品质，使日本妇女足可担当亚洲妇女运动的领袖。

日本妇女在日本历史上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库尔特斯坦山区的广阔版图上，有一位妇女当了总统；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不论是种族和信仰，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

最后，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邓中夏

## 工商联合万岁

——1925年10月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兄弟乘此盛会，亦拟说几句话。此次反对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无论是谁，都已知道。即才来省之港商代表，亦都知道。兄弟今日以同胞的资格，与港代表说几句话。我们很欢迎港商同胞到这里来和我们联络一齐救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得的。其中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同是中国人，应该同爱中国，方可以恢复国家自由平等的地位。在此时期，我们的势力，已非常发展。现在我们有三个大目的：第一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二是解决上海、沙基等处的惨杀案；第三是解除我们目前的痛苦。现在我们已有了办法，对于第一、第二两项，已交托北上代表团联络全国人民共同做去，这当然可在北京提出解决。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省港罢工的条件，罢工以后非独工人受尽痛苦，即商人亦然，但是有什么方法使省港罢工工人解除痛苦呢，那就要得到这个条件的胜利，今日到此，已可见得各界同胞之切实拥护这个条件，我们又很希望香港代表能够召集大会一致来拥护这个条件，如今日之情形一样，我以为这就是港商代表之第一的任务。其次我希望港商代表回去之后，应该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此条件，

如果香港政府不承认，则我们另有对付的方法。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最惧怕的就是我们的大团结，所以港商代表回去后，要很好的团结商界同胞。一致进行，开一示威大会，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或者有些人觉得在香港政府势力压迫之下，不易做到这地步，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同胞能团结一致，便可以做到。香港罢工的工友，亦是如此。我们已经有了绝大的决心，所以便不恐怕他，而有此次的大罢工，弄得他们无法可以压迫我们，港代表明白了上述的意思，则可大着胆放心做去。我们知道，工人有很大的势力，即商人亦有与工人同等的势力，在此反帝国的罢工中，已表现的很明了，所以很希望港代表回去之后，亦设法表现出这种势力来。香港政府的内容，我们已经很明白，我们无庸去重视他。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以前英国商人曾请其政府派兵来压迫我们，但到了现在仍不能做到，那么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他们的本身，如各处殖民地，亦迭起革命了，所以这个纸老虎，并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商人联合的力量很大，若工商联合起来，则其力量更大，将所向而无敌。所以很希望港商同胞：能联合以压迫香港政府，如果香港政府复敢压迫我们的港商同胞，我工人全体当出死力以为帮助。我们知道港商同胞以前所受的痛苦太多了，这些痛苦，不敢向纸老虎诉说，只有自己暗中忍受。现在应该改变方针了，即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港商本有很大的力量，务须利用这个力量以压迫香港政府，此即是兄弟小小的意见，敢贡献于我很亲爱的旅港同胞。我们高呼：

工商联合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恽代英

## 严整纪律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今天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我本无话可讲，因为所有的好话，都给各位同志说完了。但是由今天的情形回想到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时候，我想不但我们同志承认，而且凡中国国民也都承认，我们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永远纪念价值的一个大会。因为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发达，已比前不同了，全国革命的运动，比前进步得多了，这都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都是因为第一次大会以后同志们受总理的指导，决定了种种方策而能够努力工作的成绩。现在在这里的同志，应该想到要这回第二次大会象第一次大会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永远纪念的价值。

要想使第二次大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纪念的价值，我们就要怎样呢？要说的话很多，现在单说两件事：

（一）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党。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虽然是好，但仍有许多缺点。最易见的还是缺乏森严的纪律。两年以来党中发现不少明白违背党的纪律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毫无办法去制裁他们。这就表明我们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在太没有力量，表明我们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太没有力量。大家都知道我们议决了很多的议案，不是要说空话，是要实行的。怎么样才能够实行呢？就要靠大家同志回到各地以后，把这种议案，告诉给一切党员知道，训练他们，使他们每人都能够为这种决议案去奋斗。现在本党的内面、外面，都有许多人想妨害我们的决议案，我们同志应当加倍努力，要使第二次大会以后，本党比以往的两年更有力量，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一实现出来，不许什么人能妨害我们。已往的我们不谈了，因为虽不很好也不很坏。我们只是要本党以后更好。因为中国革命是很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党，很需要一个真实能够有严整的纪律、而能实践各种决议案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

（二）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同志要更加认清楚本党的主义。两年以来最妨害本党的进展的就是什么主义之争。比方有些人常说那班人是共产党员，那班人是纯粹国民党员。这处分门别户的办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只有使党员之间生出很大的隔阂。有那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但究竟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那里懂得。很简单的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是反对军阀，一定是要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必如此乃可以言国民党，不如此者决不配称做国民党。也有许多人见我说这话，又说我这宣传共产主义了。不错，共产主义者或者亦要宣传这种道理，但我要反问三民主义者就是要反对这种道理吗？

在这几天开会时，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党，不特不因孙先生的死而涣散，反转而更加团结，不特不因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反动而分散，反转更有精神

更有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一定会见着本党一天一天的更加进步，三民主义也一天一天的更加明白，为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所了解所信仰。最可怜也可笑的，是许多现在或者已经脱党的人，他们不知自己的主义是什么，天天说这个共产党那个共产党。稍有一点意见和他不同，他马上就要说你共产党，一般老同志，常常说国民党如此下去，快就要亡党了，党给人家夺去了，如西山会议这班人，就是此种思想之代表。他们对于这回第二次大会的心理，就是说：“在广东开会的党员通通都是赤化的。国民党在这一回一定给共产党拿去了。”但我问问各位同志，你们都是已经赤化了么？究竟党有给共产党拿去了没有？实实在在的讲，本党虽创立十多年，一直到现在才真实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才真实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们说亡党，不错，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确实是已经亡了！至于孙总理的党，不但未亡，而且到现在为全国人民所了解所信仰。什么是孙总理之党，就是信仰而且实行三民主义的党。这个党是没有亡的。亡了冯自由之党，这有什么可惜呢？我们正在剧烈反对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我们要每个同志都能够明了要真正为总理的主义而奋斗，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至于有相信冯自由、谢持、邹鲁的主义的人，我们请他走开，我们希望第二次大会以后再没有这等人。各位请看，冯自由跑了，广东便好了，我们要冯自由这等人做什么呢？他们不是真正忠心于总理、忠心于三民主义、忠心于本党的。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些人开除了许多，亦只是为这个原因。那末，或者在第三次大会时亦许要把我开除掉。如果我到那时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打倒军阀、反对为被压迫的农工而奋斗的，我承认我是应当被开除的。不过这一次我在上海是已给他们（西山会议派）开除过了的，他们这种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开除，我却不能承认，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开除我的理由，只说我是共产派，但姑无论我是不是共产派，我要请问共产派是违背了民族主义或民权主义或民生主义吗？如果没有违背三民主义，便是一个共产派亦没有被开除的理由。我相信我始终是站在总理的三民主义这一边的（不过绝对不是站在冯自由的甚么主义一边）。如果各位同志发现我真正有违背三民主义的行为，当然可以马上开除我象开除冯自由等一样。

那么我当真是永远忠心于本党的事吗？也不一定。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

## 向警予

### 全世界劳动妇女互相声援万岁

——1926年3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接受献旗时的讲话

同志们！我以上海和全中国女工的名义向伏罗涅史州工农妇女表示热烈的感谢！

上海纺织女工是最早起来与中国工人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中国工农妇女身受三重压迫：军阀、帝国主义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封建残余。然而这些压迫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女工将加入中国无产阶级的行列，消灭外国和中国刽子手的压迫和剥削。苏联工农劳动妇女的光辉斗争是我们的榜样，它鼓舞我们奋斗。

同志们！这面红旗是中国和自由苏联两国劳动妇女团结一致的象征，它鼓舞中国妇女进行斗争。

苏联工农妇女万岁！

全世界劳动妇女互相声援万岁！

世界革命的领袖共产国际万岁！（掌声）

宋庆龄

团结一致，努力实现三民主义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演说

各位同志：我觉得很抱歉，因为种种的环境，不能早日来此参与盛会。现在承诸位的好意，推为主席，私心自问，非常惭愧，也非常感谢！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是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所以，我觉得前途是非常乐观非常有希望。但是，我还要希望诸位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因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的。所以，我竭诚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



## 冯玉祥

### 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大会上的讲演

玉样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的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的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有人开辟了道路，我们只是照着他的法子作，便有出路。中山先生说的好，易行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我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政，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遇害，我和张、李、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抗兵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力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国）七（年）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师。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的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義，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之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心。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三一八”的屠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作的，他人不知，乃斥我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为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

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要革，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他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的我，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有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恶卖国军阀与外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条约都自动地取消了，哪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作这种鬼祟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作不出这种事来的。他又明白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赤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又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的强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界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下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价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所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去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银钱又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困穷，而且穷到现在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使团是何等的强狠，稍微明白中国的政局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

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的死，其原因都出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决这深切的苦痛，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筑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的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决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由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同集合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

鲁迅

## 无声的中国

——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发表的演说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展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象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象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兴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 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不是谁也不作声。反击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拭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象，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拭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

---

指英语“张”或“章”的发音。

指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

即辛亥革命。

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象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

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无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要不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习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 张学良

### 立于抗日第一线

1936年12月在西安革命公园民众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请愿的同学们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的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的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

做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



杨虎城

## 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1936年12月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

国难日亟，自十二月十二日张主任委员和我应西北各界救亡团体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的意义，已于十二日的通电及昨日张主任委员的广播词中很诚恳的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再郑重向大家报告一下。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热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就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救国的方针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外，实在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怎么样呢？他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什么“攘外”呢？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主任委员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采纳，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学生群众请愿出兵抗日中竟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光中华民族。他这样的错误政策，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来。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中华民国的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主任委员广播中已经说明了。现在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团结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取最后的生存。南京政府对我们这次的举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主任委员昨天说，我们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必须用在抗日疆场上。我同样具此决心，只要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加以指导，使我们在抗日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那是十二分感谢的。

## 杨虎城

### 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1936年12月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

全体同胞们：

今天开市民大会，兄弟受着各位同胞热烈的欢迎，觉得是非常之惭愧。我们应该知道十二日的举动，是一个伟大革命的义举。所有经过，方才张主任委员已报告得很清楚了，现在不必再来重述。兄弟现在所要说的约有几点，希望全体同胞们加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点，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下面群众一致答：革命公园）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现在我们既然在这个富有革命性的地方开市民大会，我们唯一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今天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扩大了向我们的武装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就不应忘记先烈伟大的革命精神，大家都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努力抗日，才不负今天这个地方开会的意义了！

第二点，兄弟看到今天会场的热烈情形，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记得，过去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群众受到环境的压迫，丝毫没有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在这样口号下，几乎要把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实地表示我们的救国意见，毫无虚伪地提出我们的主攻，这才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民众大会。第一次的民族得到自由的大会。这是今天兄弟觉得非常高兴的。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了这次谏诤了。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在过去国家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国防，担负起西北的责任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以保全国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会场群众高呼：不怕牺牲）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与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地表明了他的爱国赤诚，并了解西北民众革命的伟大精神，极力帮助我们。我们要拥护我们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在他的领导下收复东北失地。我们更应知道，双十二义举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更应当扩大一步团结全国同胞，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

张学良

## 抗日复土是我们的光荣责任

——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

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二十五年，已如逝如水般地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二十六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的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今后的任务？再看看国防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巩固我们的战线，来为民族国家及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历一九三六年，谁也知道是世界和平的最后关头，谁也知道是中国存亡的重要关键。列强海军条约在这一年里时效届满，日本作俑于前，其他国家，便也暗渡陈仓，卒至明目张胆地实行扩军于后，届时加以清算，结果便是战争。所以世界人士对于一九三六年，总是谈虎变色，我们中国是国际的一环，自然也不能独为例外。现在，这一个年度，已经是勉强地渡过，但世界的危机，却因此而益见其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才能换取人类的真正和平；也只有战争才能争得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我亲爱的将士们！在今年具有重大意义的元旦，请你们首先认清这一点。

我们还要认清：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所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战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

……

自从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恭送领袖入都后，不到几天，便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元旦了，无疑地，她已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光明，同时也给我们加重了无限责任！抗战复土的责任。我们当然不要怕，但也不能忽视这种光荣责任的异常艰巨，因为这样的热血，企求我们的责任能够顺利地完，争得民族复兴的最后胜利。大家要知道：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然后这种事件才有了真实的意义，这在我们军人方面，便是立刻加紧我们的抗日训练——精神的、技术的、体力的，三者有一种不够便不能算是好军队，能够担起杀敌复土任务的好军队。

我亲爱的将士们！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们能否担起这种任务？马上就是实验的最后关头，光荣可以属之我们，羞辱也可以属之我们，其中的最后选择，只看我们能否马上就加紧训练起来。

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都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真干！就干！在我个人，自然也有我本份内所应做到的种种任务，我绝不丝毫忽略稍稍放松，关于这一点。你们务须放心，努力去干，不要有任何的踌躇和疑虑。

我亲爱的将士们！民国二十六年已从今天开始了！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

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以往，我们也曾为急于“回家”与不甘容忍而怨恶政府，但现在已迥非从前的情形了，我们当此新年开始之日，过去的，只如听其过去，不要再去怨望；现在的，我们必要把握得住，也不必再去讴歌，怨望不足济事，讴歌便有情心，现在是我们的主张就要见诸行动的时候了。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 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 现在还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请你们随着这次的元旦一致努力，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

宋庆龄

## 实行孙中山遗嘱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的演说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日本的挑衅已使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继续发展中。日本企图占领华北的种种努力是显然失败了，日寇进攻绥远的企图也已经失败，它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条件也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论为赤贫的黠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

如果认为在远东的一般情势如此不利于日本的时候，日本仍能派遣十五至二十师兵力到中国来作战，那就未免荒谬了。日本以这样区区的兵力，永远没有希望达到它的目的，而事实上日本的工业与后备兵力都不容许它派遣更多的兵力。这小量的兵力分散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不难被数量上占优势、并为自己的生命与国家而作战的中国士兵所粉碎。中国的士兵已经从侵略者手中拯救了绥远，他们一定也会拯救全中国。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几年来，铁道和公路建设虽然有一些进展，但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进。

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刮，以及苛捐杂税的痛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我们中国的青年虽然受了中等或大学教育，仍不免踟蹰街头，得不到运用他们的知识的出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为要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遵循先总理遗教。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只有这样，民主主义才能实现。我们决不能忘记，先总理常常教训我们，发动群众运动是一切工作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只有依照孙中山的遗嘱与遗训，国家建设和农村改进工作才能以高速度向前迈进。

实际上，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

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会议能否完成它的任务，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

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而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

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虽然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但是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全世界都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政府的任务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利用这种同情。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已经去世的总理给我们的指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冯玉祥

## 知彼知己与抗战胜利

——1937年6月对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首都参观团的演讲

诸位官长，诸位同学：

这次武汉分校同学远道来到首都，有机会能够得到许多实地的经验及书本上操场上和野外所得不到的知识，希望各位最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研究，敏锐地观察，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进步。

诸位这次来参观的时候，正碰着我们民族国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作极力的压迫的时候。所谓汕头事件、青岛税警问题，都是曲在彼而不在我。而敌人却大派军舰，在报纸上故作煽动的记载。但是这种威胁对于我们并不能发生什么作用，我们对于敌人无理取闹的行动，已经予以严正的应付。不过这种威胁的手段，就敌人内部说起来，对他们是有用处的。我们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上是穷凶极恶，可是他们的国内却是危机重重，经济的破产，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孤立，军阀派别的纷歧，足以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死命。最近，危机更加严重，所以日本政府就极力对中国制造事件，以转移国内民众的目光。

先从经济方面来说，日本的农村非常地穷困，成年壮丁抢着吃客人扔下的西瓜皮，青森一县一年中年青妇女被卖到都市里作娼妓的有七千多人。今年日本举行征兵检查，一千人当中有四百五十人因营养不良而不能合格（一九一六年只有二百五十人不合格），这一点也可以反证日本农民生活的困苦，因为日本的士兵大多数是从农村里面征来的。都市里面物价天天高涨，工人生活也日益困苦，所以罢工事件也自然增加得很多。就据日本官方内务省发表的统计，今年一月到三月，罢工的事件一共有七百多件，四万八千多人，即件数增多一倍，人数增多两倍有余。今年第一季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异常悲观，共计入超三万万二千万元，比去年第一季增加三分之一。这样，当然只有使得整个日本更加贫困，国内秩序日益不安。

日本的政治可以说完全是恐怖的政治，自“九一八”以来，首相被刺身死的，就已经有滨口、犬养毅、冈田；去年底本年初广田内阁的下台，林陆相的组阁，也完全是适应军部的需要。同在林内阁执政不过五个月，成为日本内阁史上的第二短命内阁而让位于近卫文麿，近卫与法西斯军人最为接近，今后日本的政治更将完全唯军阀之马首是瞻。日本的政治操纵在军阀千里，就如同一只船操在一些喝醉了酒的舵师的手里，早晚一定会翻船，这是我们可以预断的。

日本外交的孤立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大难题。自从去年冬天日德同盟、日意协定缔结以来，全世界上除了德意这两个侵略的弟兄以外，日本没有一个朋友。所以这一次当我们孔院长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礼的时候，日本便低声下气地请求英国合作了。但是各国对于日本侵略的野心都看得很清楚，聪明的国家是不会再和日本作朋友的。

日本军阀这样地蛮横，但是他们的内部仍然是意见不一致，各自矛盾着。最先，陆军和海军就不能一致。陆军主张北进政策，海军就主张南进政策。而陆军和海军又各自分成许多的派系，譬如单就陆军来说，就有以荒木、真

崎乃至桥本等为首领的少壮派，有以宇垣一成为首的稳健派，又有以林陆相为首的中立派。这些派别各不相让，互相倾轧，演出种种暗杀的事件，最有名的前永田军务局长的被刺，不过其一端而已。

我之所以这样比较详细地说明日本的缺陷和劣点，第一在指出日本国内危机重重，威胁我们虽然是想达到进一步侵略我们的目的，而一方面也是为的转移国内的目标，维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敌人自然是迟早要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来压迫我们，但是“一二八”长城各口、察北和去年冬绥远的抗战，都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教训。敌人对于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虽然极力准备，却不能不有相当的顾忌。我们看清了这一点，对于敌人的威胁，自更能有适当的应付，而使敌人的威胁政策归于无效。第二、由于对敌人缺点的认识，可以加强我们的自信心，可以坚强我们抗敌图存的信念。敌人若是进一步地压迫我们，我们就毫无问题地予以猛烈的抵抗；而在我们收复失地的整个军事计划上，最先我们就要收复察北和冀东。我们每个中国人不仅肩膀上担负着责任，要拯救三千五百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我们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即敌人缺点很多，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以上，算作了一点知彼的工作。现在，我们再返回来看看我们自己。五六年来，由于国难的日益严重，全国上上下下都有很深刻的觉悟，知道只有精诚团结，抗敌御侮八个字才能救民族救国家。虽然说，几年来我们的进步未免太慢了，但是我们总算一天一天地在进步着。前年十一月四日所实行的法币政策，是一种历史上空前的举动，只要我们保持一年多来的成绩，则抗敌的财政金融准备，就已经算是打下最初的基础了。其他如铁道公路的建设，内河航行的整顿，与军事有关的硫酸铯厂的创办等等，都不能不说是与国防有关的经济建设。在政治方面，从去年夏天的“两广事变”起，经过去年冬天的“西安事变”，一直到最近四川军政的改革方案，都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地使国内自相抵消力量的行动不至于发生，而精诚团结的形势终能前进一步。至于今年十一月即将举行的国民大会，则是集思广益，使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一种组织。外交方面，从不承认广田三原则起，去年川越在成都汉口等等事件之后，向我们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我们就提出五条反要求。最近，广田再作外长，我们的外交政策当然只有拿比应付佐藤更严正的态度来和敌人折冲樽俎。至于其它的国际关系，各国均同情于我。法、苏不用说，即英、美也愿意帮忙我们，这和敌人的孤立形势迥然不同。至于军事方面，诸位原来就知道得很多，这次到首都来又看到许多国防的建设。关于此点，不必多讲。最后，年来普遍全国的新生活，讲究简单、严肃、纪律、清洁，使全国同胞都能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精神，这对于动员全国民众共同抗敌是很重要的。

诸位既然知道了敌人的缺陷，又知道了我们自己年来的进步，那么，诸位应该怎样作呢，第一、诸位要为抗敌而继续努力学。总理说：“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离开学校以后，仍要不断从事于军事和与抗战有关的学术的研究，准备时时针对着敌人的缺陷，利用我们的进步，整个推翻敌人对我们的压迫。第二、诸位将来到各部队服务，实际领导弟兄，一方面要与士卒同甘苦，一方面要努力爱国教育。总理说：“舟在大洋，触石将沉，乘舟者若不协力救助，犹自点检行李，试问舟果沉，行李尚能独存乎？吾人对于国家，亦即如是，坐视其亡，将无立身之地，救亡之责，端赖军人。”诸位一定要把这种意思灌输到每位弟兄的脑筋里面去，使每个军人都能在抗敌战争中，勇敢前进，视死如归，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



武汉是中国的核心，诸位负的责任很重大，希望诸位努力。

陈独秀

## 抗日战争之意义

——1937年10月在武昌华中大学的讲演

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疾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来，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在东方发达较晚，因之产业、生活、文化遂比较落后，大部分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供他们的奴役。在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强弱遂至不同。现在单就中国和日本两国说：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可是他们幸运得很，在守旧攘夷运动中，社会上有力分子，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地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地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之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对日本失败的后果。

因战败的刺激，产生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其动力是出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其理想是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一时震动了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这一运动若一直顺利的发展到现在，即令只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工业与科学之发达，国力之强盛，是不会在日本之下的。不幸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

庚子战败后，中国更加陷入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中，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这样大的数目，在现在还足惊人，在那时的国计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击。这还是小事，最致中国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又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辛丑条约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条约。此后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较庚子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国计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无能而又横暴，很明白的摆在人民面前，排满革命论逐渐抬头，君主立宪逐渐失势，于是乃有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气，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满

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失败了，因此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甘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欧战中有了一点发展，又加以俄国革命之刺激，革命党之努力及工农之奋起，于是乃有轰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运动。以此次运动的朝气，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因此酿成了“九一八”的后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戊戌维新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经过袁世凯反动时代梁启超的渲染，至今犹支配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至今还有人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够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事实的根据。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必须力争关税自主，采用保护政策，本国的幼稚工业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在工业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有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且农产品不足，才能适用。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人造丝、火柴、肥皂、面粉、纸烟、水泥等，正因为处于半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对于上举各项工业品施行关税保护政策（现时海关增税的，仅仅是少数的奢侈品，虽然增多一点政府财政的收入，而于保护上举各项工业无所裨益。）抵制倾销，而且各国还有在中国境内设厂，航行的特权。此种状况不改变，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的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助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

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方面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各自反对其本国的侵略战争，使之失败，因为这种战争只有牺牲人民，而没

有进步的意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此种胜利，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侵略国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因此，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经过对外战胜，循外交途径，收回了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脱离了半独立国的地位。在中国，德、俄两国的特权已经放弃，法、美、意、比等国与我关系较小，惟英国在华势力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来持重，近年对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非以前的英国可比，聪明的美国人，比较日本更懂得中国国民要求解放运动的意义与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蛮干而失败的前辙。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有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至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中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对于各种傀儡的组织，也利于他们分立，更易于由他摆布，并不容许他们统一和力量强大起来。近日谣传溥仪将迁北平，余不信会有此事。因为日本的政策不愿以一个傀儡的组织统治中国。

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他们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对中国战争；他们更不懂得中国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能仅仅拿两方政府手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估计最后的胜负。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两种力量之补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词，即主张派将来也会动摇。所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

陶行知

##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1938年9月在香港发表的抗战演讲

各位同胞，幸喜回到香港来，兄弟觉得非常高兴。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了。二年前，此地唱歌也受到压迫，现在则可以听到救亡歌声了。兄弟所讲的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对于国际形势有两种看法。第一派以为中国跟日本打，那么第三国也会跟日本打，中国就得救了，这一派人可说是抱了买发财票的一种心理的。第二派则以为国际形势，如看天气，照客观形势推测一下，那就跟买发财票那种心理不同了，天气这个东西，风向哪里吹，雨从哪里来，都有一定的道理。各国的形势不能详说，先把几个重要的足以影响世界潮流的说一说。现在先讲美国。美国对欧洲的事情向来不大理，但在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说是为民主而奋斗而参加进去了，不过还受了些损失，好比小孩子玩火弄痛了手指头，好啦，顶好不要打，要打就你们打好了。一年前，我们感觉到美国所抱的是“孤立政策”。美国在美国大战时，为口号标语所麻醉，说是什么为民主，为世界正义而战，美国人在战后知道了上了军火商人的当。于是乎美国人对远东情形也就很冷淡。可是，自从我国抗战以来就把它转变了，这是因为：（一）日本的侵略决没有停止；（二）日本的行为是惨无人道的，如巴纳号的被炸沉，南京的大屠杀等等，把美国的孤立政策渐渐转变了。广州的空袭一天几次，是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大原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斯福的演说“侵略国如同虎烈拉”，必须隔离开来。这个演说引起了许多反对的反响。不过那是跟日本有来往的商人于的。可是，日本的残暴行为一天天增加，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损失日益巨大，便慢慢地觉醒了。……在轰炸广州的时候，国务卿赫尔发一通知书说：“不能卖军械给侵略人家的国家”。后来罗斯福及赫尔在加拿大的演讲，更加具体的说明“孤立政策”定要放弃，必须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美国便由“孤立政策”而变到“集体安全政策”了。这是放火的人联合起来，教会了救火的人也应联合起来啊。不仅演说言论是在变化，其行动也在变了。

现在我们看看英国的政策吧，它的政策是很聪明很巧妙的。东三省给日本人拿掉，国际联盟没什么反响，便是守旧派在那里玩的把戏，原来英日有盟约的关系，其条约虽失效，但守旧派在精神上还觉得恋恋不舍。

但日本的侵略由华北而华南……毫无止境。这给予英国的利益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当它的利益受到危害时，便的确对中国有点帮忙了。去年看英国《泰晤士报》实在太不行，现在则对中国积极了一点，今年登载关于中国的新闻则更多了。中山先生的政策是“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希望英国也会走上集体安全这条路。

说到法国呢，有许多人说法国是跟英国走，好像英国握了法国的辫子，英国要她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英法两国爱情本来就很好，如情女情郎。对西班牙问题，法国跟着英国跑。但对捷克问题，则英国跟着法国走，好比妻与丈夫，见翁姑，则妻跟夫行，归宁，则丈夫依从妻子。对于远东问题，英法的态度则差不多。

苏联的态度对世界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又是世界和平的巨大柱石。

是反对侵略政策的首倡者及集体安全制度的发起人。张鼓峰事件，苏联把日本一师团军队完全毁灭了，有一派人很快活，好似中了发财票。但张鼓峰是苏联的领土，日本的军队侵占进来，当然要把它打退，打退了日本军队当然也就不打了，但它不能代中国打，这是对苏联及中国都有害的。要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制裁侵略者，苏联当然会加入。国联的会员国应尽量援助中国的议决案，苏联是遵守的。

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很有影响。

英、美、法、苏，都向集体安全的路上走，虽然尚未达到其成熟的程度，这好比几个强盗联合起来，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应联合起来打击强盗。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国际形势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而走到集体安全的道路。真能达到集体安全，则于我国极为有利，我们应促成之。这是我所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由看不起中国至看得起中国，由各个帮助中国而互相帮助中国。我们更应促其具体的有效的帮助中国。从前各国人民的舆论，多半轻视中国人。但自从“八一二”事变以来，我们有被几千日军包围而孤军奋斗的“八百壮士”，有台儿庄的大胜，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敬佩这个光荣的中国了。

八路军由锄头镰刀拜日人之赐，而变成机械化军队，这消息外国人知道，大为震惊。

在国外，中国人演讲上台下台，外国人都站起来致敬。这是对中国的恭敬。各国人民（跟日本人做买卖的除外）可说是都同情我国。

第三点是日本的战争材料从哪里来？他自己是一个穷光蛋，哪里来这么多飞机大炮？此问题不能不追究。

英美人士也常常问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应如何帮助你们呢？”则可答复：“日本所买的军火当中，美国运往日本的，一百块钱占了五十四块半钱，要是我们死掉一百万人，有五十四万五千给美国人的军火杀掉了。”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洛杉矶听了我说，便站起来对听众说道：“应如何处置？”群众大呼：“切不可再卖军火给日本！”其次，我们要是死掉一百万人，有十七万五千为英国的军火所杀掉。我们要使他们不要帮助侵略者。

第四点，日本打中国的钱从哪里来？一天要用一千多万，从哪里来？很简单，卖日本货赚了钱，那就买军火杀中国人。如各国不买日本货，则日本不能买军火，也就不能打仗，便要回家去了。可是日本货卖到哪里去？（一）中国；（二）美国；（三）印度。如果三个地方都抵制日货，日本便要回老家去了。不过香港的日本货也很多。美国的学生很多把日本货领带扯下，小姐把日本丝袜脱下来，都让火烧掉了。美国的杯葛日货运动很有效。印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效力。

第五点说到“中日的宣传战”。日本的宣传好比一个很丑怪的女人，但涂脂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了很好看的衣裳，但骨子里是很坏很坏的。印的宣传品也很漂亮。可是，中国的宣传，好比穿了粗布衣服的西施；不打扮，但人人欢迎。中国对于国外的天主教、基督教、工人团体、女人团体、书呆子——大学教授的地方，都有人去宣传了。但日本也去。结果呢？“宣传战”中国是打了胜仗的。这是因为中国说老实话，“理直气壮”的缘故。

.....

还有一位自称日本工人代表去见美国码头工人会的总书记：“请你们不

要抵抗日货，给日本工人一碗饭吧！”

“阁下代表日本工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

“代表工人，但政府也知道的。”

“日本侵略中国，阁下同意吗？”

“却不能反对。”

“你们反对政府的侵略政策，反对军阀买军火，你们便有饭吃了。”

这位日本人给美国人开会开不成功，便召集日本人来开会了，说他无脸回国，要求切腹自杀了。而且他不是工人，是工贼。日本工人是不赞成他来的。中国的宣传费很少，而且都是尽义务的。可是却没有中国人替日本宣传，但有替中国宣传的日本人。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日本女子说：“我爱日本；所以我不喜欢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没有出路，日本便没有出路，日本之侵华为日本之自杀，我始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大为美国人士所赞同，这是因为我们为真理而战。

可是不能等待国际的转变，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日本人的政策是分开进攻，我们的政策是联合抵抗！日本还是在挑拨、离间，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夏天很热，夏思春，春天更好。春风袅娜，鸟儿唱歌，花在跳舞，各人喜欢春天，我也愿意每天过春天。“春”字可知中国的命运。春字从三人日，三人者，上中下，左中右，老中少，苟联合起来，必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想实现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唯一的方法便是三种人联合起来抗战！

毛泽东

## 论持久战

——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演讲（节选）

“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势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



定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乔冠华

## 一个世纪的胜利

——1945年5月

万人期待的大消息终于揭晓了，五月二日（苏联）红军完全占领柏林！法西斯的老巢捣毁了，魔鬼们的慧星摘下了！光荣啊，伟大不朽的红军！全世界的人民感谢你们，全人类的后代感谢你们，你们旋转了乾坤，你们创造了历史。十二年来人类的历史就安排下这一个问题：是这一个世界毁灭柏林哟，还是柏林毁灭这一个世界？回头看去，我们所经历过的道路是多么艰险啊！从柏林流出去的首先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反民主反共反人民的狂潮，其次是柏林——罗马——东京的三脚轴心，其次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第五纵队和特务制度；柏林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了西班牙共和国、奥地利和捷克，奴役整个欧洲，威胁着全部世界。试一回想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当希特勒在非洲威胁着亚历山大港，在苏联陈兵斯大林城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反动分子是怎样把柏林看成他们朝山进香的三跪九叩的圣地啊！但如今这二十世纪反动的巴比伦是被伟大的红军捣毁了！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的攻克柏林，是具有怎样巨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了。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一种战役，它是以决定其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红军在柏林的伟大胜利，就是属于这一种具有历史决定的意义。在柏林胜利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军队，在柏林胜利的是一个世纪；那是人民世纪的胜利，假如柏林不能阻止这一个世纪的凯旋，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前进？

远在四月中旬，西线盟军到达易北河边的时候，希特勒“西让东拚”的卑鄙策略就已经非常显著了；好，让你拼吧，东线的攻势好像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大山洪一样发动了。

四月十六日奥得河和尼西河西岸的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所统率的大军向前移动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苏军虽然由于攻势发动前对于德寇空军的惨重打击而掌握了全部的制空权，但敌人在地上长期构筑起来的纵深防御的力量，却是不可轻侮的；但是正如同德军在战争初期中的坦克优势一样，在战争末期苏军的炮兵优势，在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于是像蜘蛛一样的防御工事纷纷倒下了。但防御工事的破坏并不等于纳粹的投降，他们在临死之前还是搏斗的，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战争史中最惨烈的近接战，这是人对人的搏斗，谁胜利了呢？红军！红军的英雄主义应该是看做苏军胜利的最大泉源。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和盟军在西线相反，在战斗初期，苏军在东线所俘虏的德寇非常之少，因为这是真面目的战斗。

苏军的攻势一发动，立即对柏林展开了包围态势：二十三日苏军正式打进柏林，二十五日朱可夫元帅的大军就同科涅夫元帅的大军在柏林西南波次坦姆的西北会师，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从二十三日起柏林的市街战开始。如所周知，这是在所有市街战中最艰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那是言如其实的从这一条街打到另一条街，从这一幢屋打到那一幢屋，从楼顶打到楼下，从平地打到地窖，从地窖的进日打到出口；只要想一想苏军在白天作战不能不用手电行路，就可以了解红军的作战是怎样的壮烈，德寇的抵抗是怎样疯狂。

然而尽管德寇的抵抗顽强，从二十三日至五月二日止，经过了整整十日，苏军终于把柏林打下了。在柏林和柏林以南的包围圈中，红军俘获了德寇十九万名。

胜利的旗帜飘扬在柏林城头，笼罩在欧洲的漫漫长夜，就要破晓了。

毛泽东

愚公移山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共七大上的闭幕词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成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布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

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个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 彭德怀

### 保卫延安、保卫边区

——1947年3月对延安军民所作的战前动员

同志们！我到延安四年了，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抱歉。

今天我们开一个动员大会。胡宗南已调了十七个旅、三十五个团来进攻边区，进攻延安。

敌人侵犯合水、庆阳，已被我们打出去了。

洛川、宜川这方面，敌人集中了十三个旅，要准备进攻延安，我们也要把它打出去！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我们农民要分土地，土地没有分好的地方还要继续分，敌人来了也要分，因为地分了，敌人虽然来了，也抬不走。要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成家立业，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种地。我们农民不种地就没有饭吃。胡宗南的进攻就是来破坏我们分地，使我们农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他是保护大地主，保护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把它打出去！

蒋介石要实行独裁，我们要民主，把中国变成大家的。为着民主，也要打垮他的进攻，不取消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

国民党蒋介石要卖国，第一个卖国贼是汪精卫，把中国卖给日本，现在又出了一个卖国贼蒋介石，他要把中国卖给美国帝国主义。我们要中华民族独立，我们就要取消蒋介石的卖国专政。要和平，就要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要分地，就要粉碎他的进攻！要民主，也要取消他的独裁！中国民族要独立，也要取消他的卖国专政。不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这四样事情都得不到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

我看能消灭它。有人要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这自然是有证据的。

一九三五年的事情就是证据。当时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可是，那时候的敌人有多少呢？

据我记得的，那时敌人有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今天胡宗南却只有三十五个团。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可就大不同了，边区那时只有三四十万人，五个县，现在我们是大的多了。大家想一想，看我是不是扯谎。没有扯谎，这是事实。当时红军却总共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今天他只有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我们比那时的一万五千人就多的多了。我们能打胜吗？是的，是一定能够打胜的。

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胆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

现在，已过了十一年了。恐怕不能这样来比，现在我们已消灭了他六十多个旅，捉了他一百一十几个将官。我们所有的解放区，华北、东北、苏北，早都起来，消灭敌人的进攻。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消灭他六十个旅，再捉他

一百一十多个将官，把进攻者一起捉来，这样子就会实现和平民主，中华民族就会独立，农民就会有土地。

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消灭他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消灭了他三十五个团，他西安就没有兵了，我们还不到西安去吗？这可能不可能？

（群众：能！）是的，我看很可能。这要看大家努力，努力大，早一点，努力小，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是可能的。

## 刘少奇

### 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总体素质

——148年12月在河北省平山县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同志们：

学校开学已经很久，我还没有来过。以后想和同志们多谈一谈，不知能不能做到。我们学校要办下去，大家可以安心学习。学习时间定为一年半，课程也规定了，大致分为三个学期。有的同志担心，怕中途调走，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让你们尽可能学完，中途不调动。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绝对的，个别的人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能调走。一般他说是不动调，让大家学完。

有些同志要求讲讲形势。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政治形势的中心点，即战争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北平很快就可解放。去接收的干部，正准备赶往北平。南边还包围着蒋军的主力，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黄维等四个主力兵团可能被消灭。把在北平、天津及徐州的两股主力解决之后，蒋介石就没有主力了，中国局势就算“天下大定”了，长江以北军事上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了。此外就是过长江了。胡宗南、白崇禧不是主力，明年过长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不可能。例如，美国会不会开兵来干涉？大量开兵，开一二十万来干涉中国革命，美国是不敢的。因为开来军队，不但不可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会使中国革命更要大大发展。它很怕和我们打一仗。如果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俘虏它一些人，或消灭它几千、一万，它怎么办？不打下，帝国主义面子上不好看，打下，它受不了。所以现在国际形势很好。不久，平津解放和徐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将休整一下，明年再过长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地准备。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现在你们只有一百多个人。虽然工作上需要干部，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但不大。这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

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学行不行？少不行不行？不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个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吗？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



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做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例如，一下子农业社会主义，一下子又是地主富农思想，一下子又是资本主义思想。做了一些工作，有成绩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即犯过些错误。只要真正多少做过具有群众性的、在革命中起过些作用的工作的人，都懂得自己有盲目性，犯过错误。经济工作中犯过错误，土改工作中犯过错误，组织工作中犯过错误，就是因为有盲目性，缺少知识。很多同志现在也许还不了解，到毕业时就会知道，过去犯的那些错误，是马克思、列宁早就在原则上说过的了。

有些同志希望多听报告。这不是坏事，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象是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我就可以不读了。这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也讲过，我们不能希望马克思在几十年前就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做完，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们总要留一点事情给后人做。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很多，你要做起来，就不太容易，就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

很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党中央、毛主席都研究过，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读这些书，了解这些知识。至于很多具体问题，是不是马克思都给我们解决了？例如接收北平这类具体问题，是不是都给我们解决了呢？如果这样要求，就是教条主义，接收北平的具体方法、具体组织、具体形式，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后悔的事多得很，土改中又发生后悔，后悔一九三三年划分阶级的文件为什么不早看。我们现在要做到不是事后生悔，而是事前有准备、有研究。

你们做过很多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现在也许不懂得，到毕业时就会知道，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

过去办过马列学院，有毛病，有教条主义，已经批评过了。现在又办起来了，要办好，办下去，一班完了，二班、三班还要来。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面临的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更复杂，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不久即将发出指示。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你们不仅要学习，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比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

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教员、学生也都有此责任。马列学院是高级党校，将来还打算在东北办一个分校，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法，例如在职工部学习、写文章、办报纸等，都是提高理论水平的方法。但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特殊任务。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使他们懂得马列主义知识，把工作做好。

有人会说：“我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不行吗？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但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业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方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有的同志担心，过去马列学院有教条主义，将来恐怕又搞教条。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任何时候都有的，今天有，以后还会有。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够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了，不讲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呢？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险。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而且已经犯了，就是那些怕教条主义的人，他就有经验主义的偏向，因为他怕犯教条主义，便不学习了。自己已经处在经验主义偏向的危险中，还不觉得，这就不好了。事情有些为难：不学是经验主义，学了又是教条主义，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可贵就在这里。土改不能左，不能右，是不容易的。既要走群众路线，又要不犯尾巴主义，是不容易的。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学习，要努力。各种问题都是一样。现在经济上右的、左的问题又来了。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为难，要克服这个困难。不怕这些为难，才是布尔什维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很多事，不读书，怕犯事务主义；读了书，又怕犯教条主义。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

有的同志说：“要联系实际，就要到村子里去工作。”联系实际有很多

方法。到村子里去，是一个方法，但还有更多的方法。马列学院也能联系实际，是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

读马恩列斯的书，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认识中国革命经验与世界革命经验的关系问题，必须都学，废弃一面是不对的。废弃中国革命经验，就是“言必称希腊”，就是教条主义。也有些人认为凡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五四运动以来，不但党内，就是党外，也是如此。整风以后，党内在这方面纠正了。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就是学不学马恩列斯理论的问题。

中国是个大国，将近五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和人口，有人说：“欧洲是出马恩列斯的地方，但欧洲还有一部分地方革命没有胜利。中国没有出马恩列斯，革命却胜利了。”是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胜利，对其他地方影响甚大，是一件大事。但是，只有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吸取世界革命的经验，就不但不能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而且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请你们看看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三条，他告诉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来指导各国自己的革命，但是这一条中的最后一句话，必须参照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这一句很容易被忘掉。没有这一句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删掉呢？不能删掉。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

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不学行不行？不学不行。因为学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又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破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破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

有同志又问：“没有外国经验，土改、军事我们也搞了些，而且有成绩，为什么不行？”是的，以前你没有这种知识，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中却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们还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中央写错了，你们也看不出来，照着错的做。人家写错了，你看不出，你只能照样做，那是不够做领导工作资格的。你们凭个人的一点经验去做革命工作，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也是不够的，那就好比是只能在地上爬行一样。当然，你们曾做了好多事，也有的做得好，但还是不大称职的干部。你们在正确领导下就能做对，没有正确的领导就做不对，不能独立决定方向。季米特洛夫讲干部四个条件中，就有一条，要能独立地决定方向，你们不能如此，就不是称职的

干部。如果要算个好干部，够资格做领导工作的话，那就要能独立决定方向。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假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否则，就有一种危险，就是要后退一步，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情况更加复杂，不能前进，就要后退。

外国经验怎样运用呢？毛主席讲不能“言必称希腊”，斯大林说是参照，所以不能拿外国经验硬套。不是套，而是参照。例如关于合作社问题，要根据中国情况，参照外国经验，作具体分析。要这样去运用。

学习国际经验，现在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无比丰富，解决了世界上许多大的原则性问题，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要认真学，学得好就站起来了，不爬行了；过去未想通的，现在可以想通了，眼界宽阔了，天地大了。

有的人说：“地理、历史以前学过，又来学，不必要。”我们考虑过，还是学一下好，过去学过，现在再学，也没有什么坏处。过去在北平学习历史、地理，和我们这里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分析。有的同志未学过史、地，学一下更好。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你说你的历史知识够了，就考试一下，结果证明，还是要学。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

有的同志认为规定的书太多了，读不完。我以为最好还是把它读完，紧张一点。

我看了你们的卷子，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够。要学习理论，文化不够是一个缺陷。因此，为了学马列主义，学习文化是必要的。以你们现在的文化水平看来，要真正学好理论，有许多同志是不够的。有些同志大学毕业，但写的文章就是不通。写文章，字也要写正当。你们写的很多字，我就不认得。写字也要搞点“纪律性”，否则是无政府状态，主观主义，乱七八糟。这叫做不尊重民族语言的传统。毛主席曾挖苦过写“工人”二字弯两弯、加三撇的人，说他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不管别人懂不懂，叫做主观支义。这些现象要批评一下。最近各地写来的报告，审查之后，大错没有，小错一篇中可以找出一百个。语言不通，名词的解释不同，一件事就各有各的解释，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和农民不同。怎样才能使语言共同起来呢？就是要学习写文章，否则你们出去工作难以动笔。多写文章也能帮助读书。不但要学习写理论的文章，而且要注意写现实性的文章。写文章也是你们学习好坏的标准之一。学校要用正规办法，要考试，将来毕业要准备这一着。初级、中级的党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办下去，将来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陈云

##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内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地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了，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

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那么，我们翻来复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1945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头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头。这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我并不是说犯错误好，而是说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头。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头的候补者。

邵力子

## 在中山先生爱国精神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

——1956年10月底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说

台湾的国民党员们：我们中国同胞共同敬仰的一代伟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九十周年诞辰就要来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奋斗的一生，是宣扬爱国的一生，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世界大同的一生。现在不但全国同胞正以热烈的心情，来追怀感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爱国奋斗精神；就是世界各国人士也都对我国的这位非凡杰出的人物，表示深切的崇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已经组成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决定在首都和全国各大城市举行隆重的纪念，邀请国外孙中山先生生前好友和亚非欧美国家的外宾，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们都来参加；并且欢迎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员回来一道举行纪念。

我现在代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正式向你们约请，热望你们在感怀孙中山先生遗教所垂示的爱国思想下，能够回来同我们一道举行隆重热烈的纪念大会，尤其是同我们一道举行参谒南京中山陵的隆重仪式。

为了消除不必要的顾虑，纪念筹备委员会特别提出保证，我们请你们回来，是因为我们都同样崇仰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品德、渊博思想和不朽功业。我们同是中国人，应当同在今天获得自由平等的强盛祖国，一齐团结起来，告慰于一代的革命导师。你们来既自由，去更自由。你们可以假道香港或其他各地直到广州，在香港可到香港中国旅行社接洽旅行手续，到广州后可到广州解放北路二十二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所设的接待处，那里负责招待。你们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竭诚相迎；走的时候，也要负责相送。

这里，我告诉你们：

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纪念堂，早在五年前重加修缮；以后年年刷新，现在真是庄严壮丽，金碧辉煌。铁狮子胡同中山先生的临终寝室，也是照旧庄严地陈设着。

南京中山陵墓年年修缮，所有甬道、平台、灵寝石顶、陵东南的水坝、水榭都早已修整一新；陵园的景色更加幽静，陵园的花木更加美丽。

上海的中山故居，年年整修和粉刷；客厅、餐厅、书室、寝室都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和风格。遗像前堆满着瞻仰人们所献的鲜花。

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故乡的翠亨村同样随时布置，随时整修，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图片和遗物。

在这些地方，经常不断地有中外人士前来参谒和瞻仰。尤其是中山陵墓，七年来在此瞻仰的，已有几百万人次。想必你们也念念不忘吧。今年中山先生诞辰前夕和当天，更要分别在这些城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和参谒仪式，并且放映纪念电影，发行孙中山选集和纪念专册、画刊、邮票、纪念章以及举办大规模的展览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们回来可以自由到这些城市或者其他各地，自由参加纪念和自由参谒。

我想：你们勾留海外，岁月稽迟，当此秋高气爽，是谁都要怀念祖国亲友、故乡田园的。王摩诘的有名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你们今天也更会有这种心情吧。我们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九十周年诞辰，是国民党人最大的佳节，也是全国同胞最大的佳节。这一代四、五十岁以上曾经亲聆中山先生训示的和一向自信是中山先生信徒的人们，能逢几次这样隆重盛大的佳节呢？面临即将到来的这个佳节，是更会引起游子思亲，怀乡怀国之感的。归来吧，及时归来参加盛典，一叙契阔吧！祖国人民的洋溢热情，故乡田园的秀丽景色，社会建设的崭新面貌，以及你们白发倚闾的双亲、望穿秋水的妻室儿女、兄弟朋友们都在向你们招手！我们应在中山先生伟大爱国精神的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



郭沫若

## 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时的讲话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看到今天这种喜人的情景，真是无比感慨的兴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敬爱的叶副主席的光辉诗篇，完全表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

科学是讲究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我祝愿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在新的长征中为我国科学事业建立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效率。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福全国的青少年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 华罗庚

### 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

——1981年为勉励中学生发愤读书发表的演讲

今天，我就给在座的好多先后同学谈谈我的经历，也就是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或者说我的学历，讲起来也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就是三个字：靠自学。说不简单，就是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劫难”。

现在，我们大家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如果从“劫”字谈起，那么我这一辈子碰到过三“劫”，我准备讲一讲我怎么度过这三场“劫数”的。这样，同学们也可以对比一下，把现在的环境，同我从前的那个环境对比，看哪个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如果今天的环境确实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好，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这就是我讲话的目的，我不是要在这儿宣扬自己，而是把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作借鉴。

先说第一“劫”。这一“劫”就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开始的。你们现在叫金坛县中了，我们当时叫金坛初中，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级。在国外有时人家问我什么学历，我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三，金坛县初中毕业。人家问我有什么文凭，我说，我有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的文凭，除此之外，没有了。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法国给我荣誉博士证书，现在总算有头衔了，以往都没有。我初中毕业是多少岁呢？我只有十五岁。后来，又到上海进了一年职业学校。尽管那个学校给了我免交学费，不过还是交不起饭费，后来只好回家呆着。我的家，就在大桥那边，现在叫南新桥，从前叫大桥。我就住在桥东。在家怎么办呢？要是现在的话，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也许有许多其他求学的机会，像电视大学啊，函授大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方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图书馆，我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还有一本很薄的五十页的微积分，我就啃这么几本书。那时候，这当然也不知道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感觉我们应该为国家出一点力，争一点光。我就这样开始钻研学问了。也许有人要说这是笑话，念了几年书就谈钻研了。那不是笑话！钻研并不是迷信，并不一定大学毕业才能钻研，也不是非有齐全的条件不可。实际上，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这是大约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事情。我记得，后来大约在十八、九的时候，我又有机会回到这个学校里来了。到这个学校做什么呢？当会计兼事务。那时我的老师王维克，预备提拔我一下，预备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让我去教书。但刚有一个计划，不幸我的母亲在那年死了，我也生了重病，我病在床上六个月，腿就坏了。要是在今天，我的腿是不该坏的。现在都知道，如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不翻身会发生组织坏死，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几个身，那个时候我们既请不起医生，也没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常识，所以病后起来，就不会走路了。本来嘛，不生病，身体好，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挣碗饭吃，要是我的腿坏了。我们家里原不宽裕，我一生病，那就更穷了。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还是让我参加工作，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但结果有人告了一状，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做初中校长，未免委屈，他一听有人告状，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几乎没有办法

了。继任的校长叫韩大受，他说，旁人上任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干，不过书万万不能教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了你任课而被告了一状的。这样，我总算当了一个会计。有了一点办法，我就继续钻研下去。不久，清华大学找我去任职，那大约是1931年。到了清华，他们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安排我的工作？这是个麻烦，因为要在清华大学当个助教，应当有大学毕业的资格，否则又是不合格的教员，后来，清华大学安排我当数学系助理。所谓助理，就是管管图书，管管公文，打打字，办点杂事。助理已经很不错了，我继续抓紧学习，过了一年半，他们让我教微积分。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没资格啊！清华大学的教授为此特别开会通过，让我教微积分。这等于说，清华大学承认我了，我可以抵得上大学毕业了。从初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我前后大约用了六年半时间，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八年。从这一点同学们可以看到，学习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

到一九三六年，我就到英国去了。一九三八年我从英国回来，因为那时候抗战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来后，清华大学就让我直接当教授了。从助教到教授，前后又是七年。现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机关，自己是大学毕业生，环境很好，又有书，又有杂志，又有导师，更重要的还有党的领导，但就是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信心。要知道，到二〇二〇年还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赶得上呢？从我人生经历里面，同学们可以算一笔帐，只要有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旧社会，又没有书，又没有钱，又没有老师，甚至没有灯光，电灯黄黄的，一点儿光，看不清。今天，在党的关怀之下，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现在很多人没有信心，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从我的体会讲，我觉得有信心，赶得上。不过做个懒人可不行，要加强的努力，才赶得上。

现在，再讲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国外的资料，甚至杂志之类都看不到，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还被迫做买卖了，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我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到了矩阵几何。

抗战胜利后，我到美国去了，当上了“洋教授”。我当“洋教授”也比较困难。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又有大学毕业证书，我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艰苦环境里，由于坚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臭老九”，当然不能幸免。一九八〇年，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有的朋友很关心，也有点担忧，他们

说，这次华罗庚出国，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还能不落后吗？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各处跑，搞统筹优选，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后还要防“四人帮”的冷箭，虽然时刻提防，我还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被射倒过。所以，有些朋友的关心、担忧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国”。什么叫外通里国？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这样，我不通过图书馆，也可以知道一些国际行情。而且，他们不了解，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那时候，我身体还很好，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尽管这样，紧张，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我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说不定晚上一点钟、二点钟被叫醒，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过那个时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等一会就要说：你看这个华罗庚，用统筹优选作幌子，他实际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论研究。这种人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他又改一个手法，说华罗庚就只搞统筹优选，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种人理论不多，实际也不高，但他有一种本领。手里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论他就打你的理论，你搞实际他就打你的实际。那时期我们的帽子当然不少啰，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戴过了，以目乱纲的帽子也戴过了。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统筹优选对人民有利，我要搞；我只知道，没有理论就搞不出优选来，所以理论也要搞。

不过，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十几年来中虽然是搞了一些理论研究，但毕竟遭到了损失，许多手稿也梦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或者只写了一点草稿，在脑子里像散沙一样，像乱麻一样。如果出国以后，立刻叫我上台讲演的话，我还真有点担心，亏得去了之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单子提了十个方面。一般讲演，提出几个专题就够了，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可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界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学问广、精、深，数学十个方面都可以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个地方去，与其讲自己所长的，不如讲自己所短的。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跟同学们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们会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华罗庚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有学问的。可我自己有收获没有？我自己没有，得不到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个方面来，好让人家自由选择。让他们选，他们一般都是选他们最好的东西，最拿手的東西。好，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東西。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那儿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说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下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所以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这一次，我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做了好多次报告。反映怎么

样呢？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说：你们向上面汇报，第一，大家给我讲的好话，你少吹点，如果说一点的话，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不瞎吹瞎捧别人，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你又是借了新中国的威信，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人家捧一两句会不会呀？我想是会的。所以，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整个加起来呐，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不是说我们有个个别的人，他的数学很好，或者他的某一门科学很好，我们中国的科学就很好了。我们是一个面上的差距，是整个的差距。所以领导上再三强调，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际真正的水平是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当然也不排斥我们有若干个特殊的人先搞好，搞得好。这次我在国外，也同国内一样，“人民来信”多得很。我只想给大家念一封信，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在荷兰听了我的报告，他是这样写的：“您在安纳本的演讲，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您向大家证明了，好的学者即使在最恶劣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只能感到羞愧。”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他给我写了这封信。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不能把我国人民压倒。由于我们能够坚持工作，结果还是做出了成果，这个成果还得到世界上学者的承认。而现在是“四害”除掉了，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同学们想一想，现在环境这样好，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信心呐？我想，你们是会作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困难肯定有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困难，也决不会比从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更严酷。就是再有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对我个人讲，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当然是会有困难的。除了其他困难，眼前就面对着：自己有成果了，满足于现在的成果，甚至骄傲自满；国外有名声了，国内也有了，我可以歇口气了，可以不要学习了，而且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就指导指导人家搞研究，自己少吃点苦呢。如果这样想，那就是一个危险，这是自己造成的困难。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以老同学的资格给大家谈自己的经历，就很容易产生满足的思想。所以我要警惕。满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因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是精益求精的。科学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更加大的劳动。我顺便在这儿给同学们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讲了之后，对我自己可能有好处的。

我为了经常提醒自己，给自己写了几句话，叫“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从严以终。”像我这样的年龄，是很容易“松”下来的。当然，并不是说年纪轻的人就不会松呀！年轻人如果要松起来，对不起，我就要以老学长的资格打他的手心啦！总之，搞科学，做学问，要“不空不松，从严以终。”要很严格地搞一辈子工作，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常常对自己说：以前三次浩劫，都没有把我打垮，说不定很可能最后从我自己的思想上，在已经有收获的时候，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一定要警惕。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比我从前碰到的情况好多了。我走的是自学的道路。自学嘛，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有的同志要我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很系统的一下子讲不出，我想：一、自学最起码的一条要踏实，从自己水平出

发，不要好高骛远；二、自学要有周密的计划，要经常检查；三、在自学过程中要多想多练；四、要以长期性、艰苦性克服自学中遇到的困难。要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我曾定过这样四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 张闻大

### 团结一致，争取前进

——1935年6月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

第一：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如果用另外一个方针，那就可能发生敌人把口子守了，我们只好准备过草原，这是退却的，不适合用的。

第二：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这样，困难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们应想办法来克服，而不是转弯放弃这个方针，那样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这方面我们与四方面军均有很多经验。

第三：创造川甘陕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有些同志马上想起减员等等，我说没有必要，我力量增加了就能更多地消灭敌人。而目前我们处的这个地区太狭窄，不能进行大的运动战来消灭敌人，故不好留下来。

第四：我们的方针只能是争取前进，因为前面有广大的地区，建立苏区的意义也要比其他区域大。

第五：保持后面的退路也是一个条件。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区尽量开展游击战争，使之成为游击区，以便安插伤病员与笨重的东西。只要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做得好，这个地方是能很好开展游击战争的。我们应在决定从什么地区退出、转移的同时，就要注意安放游击队。

最后：

（一）组织上应统一。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

（二）要依靠战斗部队组织这个战役。

（三）关于缩小政治部和大的机关于部的调剂，以及其他人员的调剂须有具体的商量。



冯玉祥

## 从奋斗中去求生路

——1937年1月在抵御日寇进攻时的讲话

诸位官长，诸位同学：

在今天和诸位见面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光荣的抗日的“一·二八”淞沪战争。

参加“一·二八”的英勇战士们，用他们的血肉和敌人作了三十三天的拼命斗争。他们打碎了敌人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美梦，使敌人不得不四易主将，损失了上万的所谓“帝国的皇军”；他们证明了中华民国有充分的自卫力量，抗日战争是应该得到光荣的胜利的。

但是“一·二八”的战争，终于因为受到中途的挫折而失败了。五年来，热河的丧失，“塘沽协定”的签字，冀东伪自治政府的成立，察北六县的变相沦陷……我们的国难又深重了不知多少倍！现在民族国家已经临到最后的关头，若再不能从抗战的路途中去找寻解放民族国家的道路，那么就只有灭亡了。

幸好五年来惨痛的经验，使得全国上下都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国内任何一种意见的不同，都可以讨论，商量，调解，一切可能的一点一滴的抗日力量，都要精诚地互相团结起来，不给敌人半点可乘的机会。这种教训的影响，在去年夏天的两广事件中，去年年尾的西安事变中，和全国对绥远战争之热烈的援助中，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五年来列强对中国的认识比以前是日加正确，对中国的同情也比以前更加具体。譬如，在五年以前美国只能空喊着对中国同情，而不能有实际的援助；英国时时想牺牲中国和日本妥协，来保持它在中国所既得的利益；法国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动装作不闻不问，把解放远东问题的责任推到国联身上去。就是苏联，也因为忙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无暇援助受压迫的中国。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来，由于敌人进攻的毫无止境，由于我们对敌人的进攻已开始加以抵抗，列强对于我们也才渐有善意的评论和实际的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胜兰顿得以连任之后，就召集“泛美和平会议”，企图团结南北美洲，准备对远东日本的疯狂举动加以实力的制裁。英国则自前年冬天以来，便对中国实行经济的援助；对于日本在华的许多阴谋不惜逐一加以破坏。法国虽然到现在在远东也还不能有什么实际的行动，但是在舆论上也已经把日本当作一个侵略的国家而加以非难。至于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次第完成，西伯利亚军备已经完全充实的现在，对于中国的统一抗日战争，也已经不仅只在舆论上加以同情，而是能给我们以实际的援助了。

所以在民国二十六年的开头，我们看见国内之日趋于团结抗日，国际对我之日趋于同情与援助，我们在今天就要立下决心，这关系重要的民国二十六年，我们千万不要让它空过。要知道，敌人是在天天找机会挑拨离间，要使我们国内自己发生战争，它好收渔人之利。我们若不能在民国二十六年给敌人一个重大打击，那么，我们国内的团结将不会稳固，必定会因为对敌缓进急进的分别，而使国内发生纠纷，错过了复兴民族的机会。而在国际上，假若我们今年不能把对敌强硬的态度发展下去，那么，列强对我们的同情和援

助，也会中止，而恢复鄙视我们看不起我们的旧态度。从前，我有个朋友曹亚伯先生从欧洲回来，被人误认为日本人，他很不高高兴地说：“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你们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那个外国人回答他说：“你们人多有什么用呢？夏天把一块肉放在院里，一两天就可以生长出几千几万蛆来，只要科学家倒上一杯杀虫药水，便通通死绝了。”所以，假若我们不能自己努力，错过这个自救的机会，那么，列强也无法帮助我们，又要把我们看成那些无用的蛆了。

那么，我们在今年开始有计划地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们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么？我可以确定地说一句，只要我们和敌人斗争，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不仅“一·二八”，长城战争，察哈尔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战争，东北义勇军继续不断的战争，和最近绥东绥北剿灭敌伪的战争都证明了他们的必然胜利；就是一年来日本内政外交的种种失策与矛盾，也说明了日本的必然失败。

去年日本爆发了“二·二六”事变，杀死了高桥财长、斋藤前首相等的事，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了。这个事变不仅暴露了日本国内秩序的纷乱，和日本国家的无组织；而且自此事变以后，军阀对政治的干涉更加彻底；而一般国民对政府的不满意，也更加表现得明显。军阀木偶的广田内阁完全执行军部的意见，一方面通过了“万万日金的军费预算，给日本国民增加了三万万元的租税的负担（过去三十年日本增加了租税四万万元，而“二·二六事变”以后的马场财相，却一年增加了三万万元的租税）；一方面限制国民言论出版的自由，否定议会政府对政府的弹劾权。所以现在日本社会很是不安，国内的矛盾非常的厉害。

而在外交方面，广田内阁标榜着只要枪杆的自主积极的外交，结果是等于没有外交，引起全国的非难。最初发生“南进乎？北进乎？”的争论；继而发生要求政府树立外交国策的运动；最终因中国退还川越的备忘录与日德协定的缔结，使全国国民攻击政府的秘密外交。具体地说，在对华外交上，八次谈判没有什么结果，在华北压迫恐吓的政策，也不能奏效。对苏联的关系，年初有苏满、满蒙边境纠纷的交涉，年终又因日德同盟而将谈判就绪的渔业协定中止签字。对英关系，最初是伦敦海军会议日本的退出；继而是李滋罗斯到东京遭受日本官方人士的白眼，结果英日关系恶化，去年六、七月英国与苏联缔结商业借款协定与海军协定。至于对美国的外交，去年二月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毕德门发表演说，攻击日本，同情中国。五月，美国购买中国白银五千万盎司，稳定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此外并增加日本棉织品输入美国的关税。只有在对德、意外交上，算缔结了日、德同盟和日、意协定。而德国在中国的贸易，仅次于美，居第二位，日本反降至第三位，所以引起日本一般人对政府外交的攻击。至于日、意协定，日本承认了意并阿比西尼亚（按：指埃塞俄比亚），只换来了在阿比西尼亚经济利益的保持，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看起来，连承认满洲国的条件都没有实现，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失败。总之，日本除与德、意比较接近，但仍各怀鬼胎，不能亲密合作外，对其他国家，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孤立的地位的。

在日本内政外交都陷于失败的时候，我们和敌人战争，焉有不胜利的道理？而且我们和敌人的战争支持越久，敌人内部的危机也就越加厉害，越加深刻。只要看我们去年对日外交稍表强硬，绥远战争才初步胜利，而日本政府已大受攻击。这几天诸位都在报纸上看见，说日本议会最近重开，因为各议员对广田的质问，致使广田的施政演说未能终场而宣告延会，开日本议会

史上未有之先例，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我们对敌人的侵略决不能忍耐，忍耐就是自找灭亡。我们只有用战争来回答敌人的侵略，只有战争可以促使日本自己的崩溃，而带给我们伟大的胜利。在民国二十六年的开头，是我们复兴民族，复兴国家的好机会。我们全体官长，全体同学，都要把这个意思深刻地认识。

那么，在民国二十六年，我们军人应该尽些什么任务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尽我们救国的责任呢？我现在简单地提出三点来，请大家注意研究、讨论。

第一，我们今年要把收复失地的计划建立起来，至少要完成收复冀东和察北六县的工作。

第二，我们今年要继续去年对内和平的良好办法。只要不是汉奸，只要不是阻碍我们抗敌的力量，便都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任何挑拨自己战争的主张和计划，我们都要认为这是于敌人有利的而加以反对。

第三，对于日、德联合起来对我们的压迫，我们军人誓以武力作政府的后盾，作外交的后援。

国家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要从奋斗中去求生路，不能忍耐，不能苟且偷生，去等待着死亡。我们大家起来，共同努力吧！

## 刘少奇

### 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

——1945年4月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

对于妇女工作，我是外行，过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无话可谈，但从一般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妇女运动）的做法来看，过去是否有不妥之处，因此影响工作成效呢？从这方面我可以谈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

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过去有些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和指示，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只是一般地说二万万妇女。但是二万万妇女中，有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中，又有各阶层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因此必须具体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只有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替她们解决困难，为她们服务。

整个来说，目前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农村环境里，农村的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村是文化落后的、不卫生的。我们在农村中工作，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很可惜，我们在农村里搞了十几年妇女工作，还有不少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吃了农民的饭，穿了农民的衣，住在农村里，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农村的实事中去“求是”；而是从外国妇女运动历史类比中去“求是”；我们不去倾听农村妇女的要求和呼声，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据我们看，在妇女工作中，过去经验不多，经验主义比较少，但还是有的。例如只凭大革命时期的经验、“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救国会的经验等，拿这些局部的经验，而且还是教条式地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是从了解对象出发。由于这样，所以始终没有解决好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对于农村妇女运动，我们现在还不很懂得。过去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求是”的工作做得很少，我们一些“有学问”的“妇女运动专家”，始终没有求得农村妇女关于纺织、文化、卫生等的“学问”。教条主义把什么聪明才智都闭塞了。其实农村妇女运动不是神秘的，只要你接近农村妇女，就能了解她们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如何去了解呢？可以做农村调查，找农民和农妇谈话。只要我们真正为他们服务，他们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小陶刚到杨家湾去工作的时候，帮助老百姓修纺车，有一个老百姓拒她于门外。当她真正替许多老百姓修好纺车以后，老百姓便把纺车送给她修，逐渐地就把什么话都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把这种经验普遍推行，就可能形成一个运动，使整个运动提高一步。这就

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种工作非常实际，在开始时，要埋头苦干，要切实解决问题，不能浮夸，不能出风头。但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后，你又能在全局上来指导这个运动，使群众得到一定的利益，群众就会把你当做她们的好朋友和领袖的。不实干，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来。

过去的工作，有些不实际，没有能突破一点，没有能解决问题。有些工作是赶时髦的，例如过去从延安拍发给各地的妇女工作调查提纲，是党八股式的，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之，在过去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知道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是一个缺点。

自然，在突破一点以后，即在少数地方取得具体经验以后，就必须善于使这种经验普遍化，使之推动全局，形成运动，解决问题，不能老是去“突破一点”。

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这是大家口头上一致承认的，但到实际工作中就模糊了。在敌战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在国民党区，我们同国民党是合作抗日，但对它的一党专政与反人民政策是要破坏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

在我们根据地，也有一部分要破坏的东西，例如减租减息以破坏一部分封建残余势力。当你们妇委派工作团去绥德的时候，封建势力还维持着，对这些东西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就是在延安，也有要破坏的东西，例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但总的方针是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例如，减租减息是为了提高生产，反迷信宣传是为了建设新文化等等。有些文化工作者，认为延安还是“杂文时代”，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以为只要做破坏工作，而没有明确的建设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区，也有一些建设，例如建设革命党、建设革命群众团体等，但是一切这些建设是为了破坏敌人，破坏一党专政。

方针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思想上是否已明确认识呢？以后是否能保证不再犯错误呢？那就不一定。我们延安和解放区，也有缺点，但这是次要的，是胜利中的缺点，可以克服的。我们这里，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小米、草鞋……虽然不好，但这些都是人民的。敌人那里也许有些好东西，但是可惜不是人民的。我们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以及敌占区的一切黑暗，大家听到那里的人民起来斗争很高兴，这是革命感情。你到底爱什么？爱人民，还是爱反革命？有些同志过去在工作中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方针上有错误。

第三，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妇女工作者为妇女群众服务，但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民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装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像，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现在各根据地，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干部有几十万，做了许多的

工作——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但还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群众观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还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因此，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就是因为群众自己没有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每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在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就是没有群众路线。

我们对群众要强调其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骤，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行动。

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

要有革命精神，必须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自己有坏东西，还有什么面子呢？要保持面子，就必然会使自己趋于保守。有些同志，自己没有知识，为了维持“指导者”的面子，硬要拿出一套东西到群众中去，结果祸国殃民。所以改造思想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破坏，一方面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

如果我们真能根据上述四点精神办事，又去掉“爱面子”、“逞英雄”等坏东西，那么事情一定可以办好。群众随时欢迎实事求是的人去指导他们。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上层领导机关就要善于学习这样的经验，善于总结与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并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要善于做伯乐，认出许多群众中的“千里马”来，并继续加以培养。

## 毛泽东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帐，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

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处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



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而易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

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方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

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用，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

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 朱德

### 分析战争形势，确保全国解放

——1948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 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汉楚相争刘邦与项羽的决战即在中原。韩信将兵所以能“多多益善”就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二）今年（解放战争第三年）战争的第一个月（七月）已取得大胜利。八月快要完了，还剩下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将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

（三）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这点，美蒋对我们都估计不足。太原、济南是可以打下来的。

（四）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五）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就要着重解决“把生产提高一寸”的问题。这点每一个人都有份，都要努力去做，争取成功。

#### 十月一日的讲话

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长春敌人可能逃跑，但我们有八个机动师能够消灭他们。

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还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

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比我西北野战军大，一时消灭不了他，时间要放

慢些。

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当然吴化文即使不起义，我们同样可以打下济南。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因为中原粮食富足，地势平坦，便于大兵团的作战。在该区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他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这次打下济南缴获炸药很多，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冀中每年可产一千多万斤硝，可做炸药。炸药，敌人不敢使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浪费，现在仍然组织得不够理想。这在内线作战时还没有多大关系，而在外线作战时则关系很大。所以今后要把我们的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现在是六个人抬一副担架，如果组织得好，两个人即可，可以节省运输力。

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都是那样坚决，所以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当然，除了靠我们的机动部队外，还是需要各地方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另外，解放战士占我军的比例很大，以后对解放战士要加强教育，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订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

### 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关于东北问题，美国人曾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不要孤守待毙，蒋介石虽然也看到了这个形势，但反动统治阶级临死也还要作最后挣扎，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有二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长春敌人也想趁这时撤退，但锦州我们很快就打下来了，力量即可以抽出，因此敌人不容易撤退。蒋介石的战略现在有所改变，他放弃若干孤立据点，这是在我们攻下济南以后才改变的。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傅作义主要还是靠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六军等，而他自己的则不行。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

以切成几节。他最怕的是我们搞他的张家口。绥远也是他重要的后方，而北宁线则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现在他的力量放在西面。但蒋介石的战略是要保住北平、天津，不愿傅作义的主力继续往西进。

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即使一下打不开，长期围困，饿也把敌人饿死。我们打太原的部队，除了太岳军区的八纵队以外，其他都是刚编成的新部队，所以在战术上、攻坚技术上不那么熟练。但这样的部队，能打这么大的城市也不简单。

彭总那里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对他那边目前不能多增兵，因为多了也没有饭吃。如果太原打下，彭绍辉纵队可以调过去。

山东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青岛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所注意的战略要点。我们现在不去打它，因为有美国军队在那里，等到将来再集中力量去打它。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谭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

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如果他照办，将二百万部队放在一块，对我们也比较麻烦。

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好好学习，把书本上的与实际的对照一下，看一看对不对。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今年补充的人员经过训练，比过去强。打下一些城市后，也补充了一些人员。现在有十万俘虏补充到我们的部队，所以这几个月的工作要着力把俘虏教育好。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再一方面是加强政治工作，反对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各自为政等现象。

过去对接收城市无经验，现在则不同了，能掌握政策，有经验了。过去石家庄解放了两个月，商店还不敢开门，而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即开业。敌人现在丢一处地方即无法恢复。我们要加紧准备工作，迎接突变——敌人垮台。

###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

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现在我集中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纵队，加上两广、特种兵、鲁中南、渤海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共十七个纵队，再加中原刘邓的六个纵队，在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八个基数。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刘峙的指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白崇禧那样狡猾会逃跑。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四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所以冯部起义正适合时机，

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在消灭黄伯韬兵团的同时，原想能把邱清泉兵团引出徐州来，所以我阻援部队有意后撤了一点。刘峙以为我们要跑，叫下面追，但下面不敢追。中央社也吹。但邱部的后尾始终不离徐州，尽管眼看着黄兵团被歼。不过邱、李兵团在我预定的阻击下损失也不小。现徐州集中了邱、李、孙三个兵团不易打。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资格老，但指挥并不怎样高明。比较高明的是白崇禧，他看到要打败仗不肯来。黄维兵团来路远，走得急，过河多，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路上，汽车没有油，机械化反成大害。他情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刘邓部队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群众基础。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坚固阵地依托（黄伯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他原来的前进方向是徐州，我们从侧翼打他，他向东与李延年、刘汝明靠不上，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李延年、刘汝明是否北上？我们希望他们来，不过他们的劲头不大，其中从东北撤回来的部队情绪不高。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如果逃跑，塘沽是个冻港，海上的路走不通；如从陆上顺平汉、津浦铁路南撤，那样时间既长，而且我解放区的群众都是有组织的，虽然不能全部消灭他的部队，至少也要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失。到那时我东北大军势必跟踪猛追，我南面的部队还可以截击。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傅作义过去守涿州出过名，东北军没有把它打开。他又看到阎锡山暂时守住了太原，于是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消灭了徐州的敌人及傅作义、阎锡山部后，留下的还有马鸿逵、马步芳和胡宗南部。我西北野战力量较小，今后西北方面再增加一点兵力，求得把胡宗南部消灭在陕西，如他退到四川就比较费事。我大军入川必须有良好的供应线。不去不行，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不掉。另外，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缩回广西也比较麻烦。至于蒋介石的部队倒无须顾虑，顶多只能再到广东去重建家务。

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



刘少奇

## 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

——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同志们：

很久以前，就想和你们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谈一次话，我过去只和新华社同志谈过，和多数同志没谈过。谈到办报，我是外行，没办过报，没写过通讯，只是看过报，因此，你们工作中的甘苦我了解得不真切。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处罚。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联共党史》说了党报的重要性，说明它组织和团结了群众，起了指导革命的作用，而且说它是“中心”。俄国在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认为，要首先搞清思想界限，宣传党应该如何建设，方针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然后再来建党。原则问题没搞清楚，建党建不好。如何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办报，办全国性的报纸，使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我们所说的和人民群众联系，主要是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这是讲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那么，怎样联系群众呢？怎样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呢？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

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有的同志说，做新闻工作没有兴趣，没有味道，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很明白，这是不懂得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自己轻视自己。当然，除了新闻工作，还有别的重要工作，打仗、生产都是重要工作。不能这样讲，“只有我重要”。要了解，除开前方有军队打仗，后方有人办工厂，有人做党的工作等，还需要你们，这是必要的社会分工。

党是依靠你们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纸和通讯社。现在我们铁路不大通，邮政也不大通，和广大群众通点消息，就靠新华社、广播台了。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

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你们记者是要到各地去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

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全国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作用。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和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不相关的人看看也许就算了，相关的人就会好好注意，就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们要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不经过人代会，不经过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危险得很。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因此，这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要对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家一顿骂，也不要怕。只要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党的路线、方向上，即便一时

不得彩，也不要怕，要能坚持，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要象鲁迅那样有骨头，没有骨头，在硬不起来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你们不受多次波折，怎么能锻炼出来！

你们就要出去了，要到群众中去了。听说你们在这里学习后，把握增大了，信心提高了，这很好。又听说你们感到知道的东西很少，担心下去会碰到困难，把握还不够，信心还不高。你们还年轻、幼稚，还不成熟，还不能自立，这些党是看到了的。怎么办呢？要不断学习。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看国民党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如果你们的工作完全建立在这三个星期的学习上，那是不够的。你们要看一看，做新闻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需要些什么知识，自己必须独立学习，努力学习。这样，你们就有了主动性。

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我的估计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工作还有些像豆芽，还在生长的阶段，但是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那时你们对工作就会是熟练的、顺手的了。党老早就办报了，办报的人还没有上路，这不是估计过低了呢？如果估计过低，那就对不起了，如果估计得对，你们就警惕。

为什么说你们还没有上路呢？这是有理由的。共产党办一件事情，要重新创造，要积累经验，一时办不好，并不奇怪。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比资产阶级落后。资产阶级办报是经过好多年才上路的，把办了十几年的《申报》和刚办的《人民日报》比较一下，我们进步并不慢。说我们进步不慢是不是就要骄傲呢？不是的。你们是给人民办报，是人民的记者、通讯员，人民给你们的任务，是否都已办好了？还没有，还没有上路。我是就这个标准来估计的。

你们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这三个星期的学习，当作一个开始。你们要根据这个方向努力学习，创造条件，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好。

你们过去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曾经犯过错误，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没有责备办报的同志，更没有责备你们，因为这怪不得你们。依照你们现有的条件，还不可避免地犯些错误。这怪我们没有把新华社、报纸掌握好，我们是批评自己的。但是应当向你们讲清楚，你们过去做错了许多事。过去的责任不追究，要追究的话，我们负责。

我们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成熟起来，我作为一个读者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

为了把工作做好，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采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采”，就是漂亮，挂点“采”，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采”，人家不愿意看。所以要拣重要的写，重要的就是“精”的。

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你们写东西要考虑对象。这就是说每写一篇稿子，就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要区别全国与地方。你写给新华社的稿子，是面向全国，包括蒋管区，而且还有外国人。你们就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各解放区都适用的经验，哪怕只是一个村的，他们也要看的。有的经验并没有一般性，只适合太行用，那就不要详细介绍，人家不看，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说到全面、深刻，应该说，不深刻不会全面，提不到理论高度，是不会全面的，那只能是零碎的、现象的、无系统的。全面，就要综合，要总结，要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

要全面，就不要笼统地讲，得分析。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考察不清楚，就没完成任务，你的通讯人家就不会相信，因为没有材料，没有分析。问题不在于人家是不是相信，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清楚。你们应敢于说：“相信我的通讯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们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新闻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很少有人对他们讲真话。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所遇到的不会这样了。但即使如此，如你问群众，今年的公粮怎么样，所得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的是表面的话。你们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群众就会拥护你们，你一到那里，群众就会找你反映

情况。那时，记者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低的，影响大的、小的，就看出来了，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光靠在这里学习三个星期，下去还不能把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方说，有时从群众中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个判断并不容易。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有的同志说，过去走了“干部路线”，现在要走群众路线，只提倡群众当家，反对干部当家。哪里会有不要干部的群众路线？那只能变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群众怎样当家？总要选派代表吧，不能几百万人一齐当家吧，干部还不就是他们的代表。许多同志认不清这一点，把群众当家和干部当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在分析之后加以正确的判断。

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

有的同志在北平时写得很多，很有人看，可是一到我们这里，写不出来了。他们说没有“自由”，一篇稿子改来改去，把“创造性”给限制了。不是的，如果你写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当然要限制，必须限制的。比方，你写一篇文章，倒是生动活泼，但内容却是只要群众当家，否定干部的作用，这种“创造性”是要限制的。问题在于你当了党报的记者，不是在北平墙报上、不是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这一点要搞清楚。在蒋管区写东西，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列主义，群众就欢迎，呱呱叫；在我们的报上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非马列主义，就得挨骂。

你们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不是马列主义观点，而是别的观点，比方小资产阶级观点等，这样，写东西的盲目性就很大。

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不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自己不懂的问题，应当勤问，可以写信问你们的上级。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你们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办报。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是基本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否定左和右的谬误，就没法肯定真理，要确定真理，就得否定谬误。

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出你们的创造性了。你能了解群众的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写得真实、精采，他就不能；你能发现党的政策的缺点，他就不能。你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党不是限制而是鼓励这种创造性。但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写这些东西的人说是发展他的个性，其实是发展他那个阶级的党性。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如果你讨厌群众，有喜欢反映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之个性，那是不行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工作就可以做好。但是，你们现在还不够，还要学习。当然，如果感情还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那里，那就不只是学习问题了，不过学习也会好些。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有点地、富、资产阶级观点，也是不自觉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学习接近劳动人民的本事，加强马列主义的修养，熟悉党的路线政策，不怕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把人民的新闻工作做好。

# 毛泽东

## 革命和建设问题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

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 三

从 1927 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



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过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控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

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元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

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和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张澜

## 团结起来，建设祖国

——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民觉悟了，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到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发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对今天开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象得知，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

领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愿更坦白地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力是三位一体，是狼狈为奸的。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余，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要做困兽犹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正确，他说：“谁要放轻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同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产阶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 周恩来

###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

——1950年10月在政协一届十八次会议上的报告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用品的生产。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进北。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和，嚷到七七事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面，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

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该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 张闻天

###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 一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 二缺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 三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

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品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接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

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三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像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

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食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

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 四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 五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 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

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好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是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

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 七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上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



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并不是“算帐派”。主席说，经济工作要做越细。就是说，要精打细算，要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变面貌的条件，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反对满不在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

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

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像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 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

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

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

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像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要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来说，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

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 十一 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来说，这一点更不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的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待事实来

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 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 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

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 周恩来

###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1962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像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

看出来。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成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



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须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

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是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口，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口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口，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像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 邓小平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加强了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也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

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请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

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

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须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



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 邓小平

###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讲三点：一、讲这次会议；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这次全会很重要，开得非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全会，都是开得好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这次全会，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欲言，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发扬下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都解决得很好。

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上，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想多说几句。

我们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反映，党章修改草案是有特色的，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也许还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完善。修改草案中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还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比如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受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眼界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人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

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已经实际上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是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如果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对那些拒绝接受教育、不愿改变立场的分子手软，仍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因此，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变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 陈独秀

###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1917年5月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

今日本会开讲演会，适遇国会纪念日，鄙人不觉发动一种感想，所以选择此题。鄙人感想非他，即现今之国会非君主国的国会，乃共和国的国会。方才李石曾先生演说《学术之进化》有云：“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鄙人以为李先生的理论，固然不错，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实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歿，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

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

袁世凯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现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就是这种现象：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的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

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数。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中国，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若是一旦帝制恢复，蔡子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傅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贵学会还有什么学问可讲呢？



蔡元培

## 国文之将来

——1917年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

今日是贵校长与国文部陈主任代表国文部诸君要我演说，我愿意把国文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尤愿意把高等师范学校应当注意哪一种国文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所以预拟了《国文之将来》的题目。

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

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的信，都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么。

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像。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哪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写的读的都是拉丁文。后来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摹仿古人的话，渐渐的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来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希腊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见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抗的，我们怎么能抵抗他呢？

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

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中国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来帮助他，哪里会分裂呢？要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摒斥在统一以外么？

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经历给别人看。后的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是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不是最有名的著作么？他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余改的字很多，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难道记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么？又如六朝人喜作骈体文，但是译佛经的人，别创一种近似白话的文体，不过直译印度文与普通话不同罢了。后来禅宗的语录，就全用白话。宋儒也是如此。可见记载与说明，应用白话，古人已经见到，将来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美术，有兼重内容的，如图画，照像等。也有专重形式的，如音乐、舞蹈、图画等。专重形式的美术，在乎支配均齐，节奏调适，旧式的五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譬如我们现在通行的，是楷书，行书，但是写八分的，写小篆的，写石鼓文，或钟鼎文的，也未尝没有。将来文言的位置，也是这个样子。

至于高等师范的学生，是预备毕业后，作师范学校与中学校的教习的。中学校的学生，虽然也许读几篇美术文，但练习的文，不外记载与说明两种。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小学校教习的预备，小学校当然用白话文。照这样看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

蔡元培

## 科学之修养

——1919年4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养会上的演说

鄙人前承贵校德育部之召，曾来校演讲；今又蒙修养会见召，敢述修养与科学之关系。

查修养之目的，在使人平日有一种操练，俾临事不致措置失宜。盖吾人平日遇事，常有计较之余暇，故能反复审虑，权其利害是非之轻重而定取舍。然若至仓卒之间，事变横来，不容有审虑之余地，此时而欲使诱惑、困难不能隳其操守，非凭修养有素不可，此修养之所以不可缓也。

修养之道，在平日必有种种信条：无论其为宗教的或社会的，要不外使服膺者储蓄一种抵抗之力，遇事即可凭之以定抉择。如心所欲作而禁其不作，或心所不欲而强其必行，皆依于信条之力。此种信条，无论文明、野蛮民族均有之。然信条之起，乃由数千万年习惯所养成；及行之既久，必有不适之处，则怀疑之念渐兴，而信条之效力遂失。此犹就其天然者言也。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易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由是观之，则吾人之于修养，不可不研究其方法。在昔吾国哲人，如孔、孟、老、庄之属，均曾致力于修养，而宋、明儒者尤专力于此。然学者提倡虽力，卒不能使天下之人尽变为良善之士，可知修养亦无一定之必可恃者也。至于吾人居今日而言修养，则尤不能如往古道家之蛰影深山，不闻世事。盖今日社会愈进，世务愈繁。已入社会者，固不能舍此而他从；即未入社会之学校青年，亦必从事于种种学问，为将来人世之准备。其责任之繁重如是，故往往易为外务所缚，无精神休假之余地，常易使人生观陷于悲观厌世之域，而不得志之人为尤甚。其故即在现今社会与从前不同。欲补救此弊，须使人之精神有张有弛。如作事之后，必继之以睡眠，而精神之疲劳，亦必使有机会得以修养。此种团体之结合，尤为可喜之事。但鄙人以为修养之致力，不必专限于集会之时，即在平时课业中亦可利用其修养。故特标此题曰：“科学的修养”。

今即就贵会之修养法逐条说明，以证科学的修养法之可行。如贵会简章有“力行校训”一条。贵校校训为“诚勤勇爱”四字。此均可于科学中之行。如“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盖受人之欺而不自知，转以此说复詔他人，其害与欺人者等也。是故吾人读古人之书，其中所言苟非亲身实验证明者，不可轻信；乃至极简单之事实，如一加二为三之数，亦必以实验证明之。夫实验之用最大者，莫如科学。譬如报纸纪事，臧否不一，每使人茫无适从。科学则不然。真是真非，丝毫不能移易。盖一能实验，而一不能实验故也。由此观之，科学之价值即在实验。是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的方法不可。

其次“勤”：凡实验之事，非一次所可了。盖吾人读古人之书而不惮于心，乃出之实验。然一次实验之结果，不能即断其必是，故必继之以再以三，使有数次实验之结果。如不误，则可以证古人之是否；如与古人之说相刺谬，则尤必详考其所以致误之因，而后可以下断案。凡此者反复推寻，不惮周详，

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故“勤”之力行亦必依赖夫科学。

再次“勇”：勇敢之意义，固不仅限于为国捐躯、慷慨赴义之士，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试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如南北极及海底探险之类。又如新发明之学理，有与旧传之说不相容者，往往遭社会之迫害，如哥白尼、贾利来之惨祸。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可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一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学所养成。

再次“爱”：爱之范围有大小。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己最接近者，如家族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珍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博。又人类嫉妒之心最盛，入主出奴，互为门户。然此亦仅限于文学耳；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变易一切。是故嫉妒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

以上所述，仅就力行校训一条引申其义。再阅简章，有静坐一项。此法本自道家传来。佛氏之坐禅，亦属此类。然历年既久，卒未普及社会；至今日日本之提倡此道者，纯以科学之理解释之。吾国如蒋竹庄先生亦然，所以信从者多，不移时而遍于各地。此亦修养之有赖于科学者也。

又如不饮酒、不吸烟二项，亦非得科学之助力不易使人服行。盖烟酒之嗜好，本由人无正当之娱乐，不得已用之以为消遣之具，积久遂成痼疾。至今日科学发达，娱乐之具日多，自不事此无益之消遣。如科学之问题，往往使人兴味加增，故不感疲劳而烟酒自无用矣。

今日所述，仅感想所及，约略陈之。惟宜注意者，鄙人非谓学生于正课科学之外，不必有特别之修养，不过正课之中，亦不妨兼事修养，俾修养之功，随时随地均能用力，久久纯熟，则遇事自不致措置失宜矣。

蔡元培

## 洪水与猛兽

——1920年4月的讲演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鲛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不了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得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

##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1920年12月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说

兄弟已经几次到过新加坡了，今天得有机会，和诸位共话一堂，实在荣幸得很！只是今天没有什么预备，所以不能有多少贡献，还望诸君原谅。

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象一所房屋，内分教室、寝室等，有各自的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故职业教育所注重的，是专门的技能或知识，有时研究到极精微处，也许有和日常生活绝不相关的情形。例如研究卫生的，查考起微生物来，分门别类，精益求精，有一切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态度。这是从事专门学问的特异点。

可是我们要起盖房子时，必得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屋将成，才发见地基不稳，才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刚才讲过普通教育好象房屋的地基一样，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别注意才是。现今欧美各大学中的课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识，差不多不很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中小学的时代，早已受了很重的训练，把高深学术的基础筑固了，入大学时自然不觉得困难。若在中小学内，并没有建筑好基础，等到自悟不够时，再要补习起来，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而且只鹜虚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争赛的结果，可使学生的虚荣心旺盛起来；出去服务社会，一切举动，便也脱不了虚荣心的气味，这是贻害社会不浅的。不过开运动会和竞技等，在平时操练有些呆板乏味时，偶然举行一下，倒很可以调剂机械作用。因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的，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要使他们望正鹄去做。

次讲智育，案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

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至于常用口头的讲授，或恐有失落系统的毛病，故定出些书本来，而定书本也要看学生的程度，高下适宜才对。做学生的，也不是天天到校把教科书熟读了，就算完事。要知道书本不过是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上学得菊花，看见梅花时，便知也是一种植物；从书上学得道南学校，看见端蒙学校，便也知道是什么处所；若果能象这样的应用，就是不能读熟书本，也可说书上的东西都学得了。

再现在各学校内，每把学生分为班次，要知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缘学生的个性不同：有的近文学，有的喜算术等；所以各人于各科进步的快慢，也不能一致，但因经济方面，或其他的关系，一时竟没法子想。然亦总须活用为妙。就是遇有特别的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别的教练。在学生方面，也要自省，我于那几科觉得很困难的，须格外用功些，那几科觉得特别喜欢的，也不妨多学些。总之，教授求学，两不可呆板便了。

至于德育，并不是照前人预定的格言做去就算数。有些人心目中，以为孔子或孟子所讲的总是不差，照他们圣人的话实行去，便是有道德了其实这种见解，是不对的。什么叫道德，并不是由前人已造成的路走去的意义，乃是在不论何时何地照此做法，大家都能适宜的一种举措标准。是以万事的条件不同，原理则一。譬如人不可只爱自己，于是有些人讲要爱家，这便偏于家庭，或有些人提倡爱群，又偏于群的方面了；可是他的原理，只是爱人一语罢了。故我们要一方考察现时的风俗情形，一方推求出旧道德所以酿成的缘故，拿来比较一下。若是某种旧道德成立的缘故，现在已经没有了，也不妨把他改去，不必去死守他。我在中学校看见办有图书馆、童子军等，这些事物，于许多人很适宜，于四周办事人亦无妨害，这便不是不道德。总之，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要重在实行。随时随地，抱着试验的态度。因为天下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若说今天这样，便可永远这样，这是大误。要随时随地，看事势的情形，而改变举措的标准。去批评人家时，也要考察他人所处的环境怎样而下断语才是。

第四美育，从前将美育包在德育里的。为什么审查教育会，要把他分出来呢？因为新近人士，太把美育忽略了。按我国古时的礼乐二艺，有严肃优美的好处。西洋教育，亦很注重美感的。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

美育之在普通学校内，为图工音乐等课。可是亦须活用，不可成为机械的作用。从前写字的，往往描摹古人的法帖，一点一划，依样葫芦，还要说这是赵字哪，这是柳字哪，其实已经失却生气，和机器差不多，美在哪里？

图画也是如此，从前学子，往往临摹范本，圆的圆，三角的三角，丝毫不变，这亦不可算美。现在新加坡的天气很好，故到处有自然的美，要找美育的材料，很容易。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不然，学生喜欢的不教，不喜欢的硬叫他去做，要求进步，很难说的。象儿童本喜自由游戏，有些人却去教他们很繁难的舞蹈，儿童本喜自由嬉唱，现在的学校内，却多照日本式用 1234567 等，填了谱，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完全和儿童的天真天籁相反。还有看见西洋教音乐，要用风琴的，于是也就买起风琴来，叫小孩子和着唱。实则我们中国，也有萧笛等简单的乐器，何尝不可用？必要事事模仿人家，终不免带着机械性质，于美育上，就不可算是真美。

以上四育，都宜时时试验演进，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

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不过看各人的个性，去帮助他们作业罢了。但寻常一级的学生，总有二十人左右。一位教员，断不能知道个个学生的个性；所以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自助才好。大概受毕普通教育，至少要获得地平线以上的人格，使四育平均发展。

又我们人类，本是进化的动物，对于现状常觉不满足的。故这里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了。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大多数从工事入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洋，的确很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然若进一步去研究，商业的发达，必借原料的充裕。那原料，又怎样能充裕呢？不消说，全在农业的精进了。农业更须种种的农具；要求器械的供给，又宜先开矿才行，这又侧重到工艺上头。按我国制造的幼稚，实在不容不从速补救。开了铁矿自己不会炼钢，却将原料卖给别国，岂不可惜？若精了制造术，便不怕原料的一时跌价，因为我们能自己制造应用品出售，也可不吃大亏啦。

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象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农商工的应用，我们都知道了。但在西洋，这三项都极猛进。而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工业一途，亦发达极早。何以到了今日都远不如他们呢？这便因他们有科学的缘故。一个小孩子知识未足时，往往不知事物的源本。所以若去问小孩子，饭是从哪里来的？他便说“从饭桶里来的”。聪明些的，或能说“从锅子里来的。”都不能说从田里来的。我国的农夫，不能使用新法，且连一亩田能出多少米，养活多少人，都不能计算出来，这岂不是和小孩子差不多么？故现在的学生，对于某种科学有特别的兴味的，大可去专门研究。即如性喜音乐的，将来执业于社会，能调养他人的精神，提高社会的文化，也尽有价值，尽早自立。做教师的，不妨去鼓舞他们，使有成功。总之，受毕普通教育，还要力图上进，不可苟安现状。若愁新洲没有专门学校，那可设法回国，或出洋去。

我最后还有几句关于女学校的话要说：这里的学校，固已不少，但可惜还没有女子中学。刚才在中学时，涂先生也曾提及这一层。我想男女都可教育的，况照现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的界限素严，今年内地各校要试办男女合校时，有许多人反对。若果真大众都以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也行。若经济问题上，不能另办时，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在美国的学校，大都男女兼收，虽有几校例外，也是历来习惯所致。在欧洲还有把一校划分男女二部的，这也是一种方法。总之，天下无一定不变的程式，只有原理是不差的。我们且把胆子放大了，试试男女合校也好。若家庭中父兄有所怀疑时，就可另办一所女子中学，或



把男子中学划分二部，或把讲堂上男女座位分开，便极易办到了。这女子中学一事，只要父兄与学生两方面，多数要求起来，我想一定可以实现的。我今日所说的，就是这些了。

陈独秀

## 教育与社会

——19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

今日讲题为《教育与社会》。故向来我国社会与教育，是别而为二的，致结果多不良。余前在高师讲演《社会与教育》时，曾言其概略，兹再反复言之，以尽本题之意义。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诚以人类精力，本应经济。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盖社会支配个人，其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其力量小，理至明也。或者疑社会力量未必优于个人，每以孔、佛、耶之学说，能支配地球上一部分人之精神，至历数千年之久为喻。不知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中华之孔子，印度之释迦牟尼，欧洲之耶稣，其个人力量之大，似足以支配社会矣。然从实际上观察，其个人之力量，实由社会而产生。试推论之，世人徒知孔子支配人之学说为家族思想，亦即人伦之道。然亦知夫中国之为世界最大农业国，其人皆为土著之民乎。既为土著之民，则重迁徙，鲜往来，其种种风气，皆足以养成人之家庭思想。是孔子之学说，为社会所养成，世人不察，倒因为果，误矣。释迦牟尼亦然，其学说由印度社会养成，非印度社会为释氏学说所制造。……征之耶教，亦何莫不然，耶教重自由与进取……亦以欧洲多岛，交通便利，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且其地属北温带，气候温和，故无厌世悲观思想。是其学说亦由四围环境养成，非由耶稣建此以改造欧洲人类者也。由斯而谈，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设使耶稣生于中国，亦必主张家族主义；孔子生于印度，亦必尚厌世悲观；释迦牟尼生于欧洲，亦必主张自由进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张则互变也。从可知社会支配个人之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之力量小矣。此既证明，则教育若离社会而独立，则教育之力量自减，詎得不谓之减少教育之力量耶。

教育与社会分离，足以减少教育之效力，前已言之矣。然实际如何减少，可条析言之：

（一）教育的效力。普通之力消失，只可及于部分或个人。

（二）学生训练的效力。社会与教育分离，则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故假使学校训练好，而社会不好，其得益仍寡。吾年来从教育经验上，观察此说，最足征信。预见小学生，往往在学校受训练时，极为活泼，极守秩序，极为奋发，极能合群，极不倚赖。惟一入家庭，则此种佳处，即觉消灭。或少壮大学生，在学校时，无不品行纯洁，志趣高超，为一有希望之青年。殆一人社会，则渐染渐深，愈久愈甚，终成为一无希望之恶人。此其证明也。

（三）学术上应用之效力。教育与社会分离，则学生社会，自有一种特别阶级。其所学何事，社会无从知之，故社会上不甚注重，不甚相信。此种弊病，在社会固应负一半之责任，而教育家亦应负一半之责任。何以言之？日本兴学之初，其社会亦不相信教育。复由教育家致全力医学、农学两种与社会密切关系之科学，使社会知其利益，其后遂得社会之相信。故欲求学术之应用，必须使教育与社会密接。至我国社会之不相信教育，固由社会与教育隔膜。然农业学生，其所学得之学问，反不如老农。工业学生亦然，一经

实用，其成绩反不如一小匠。故欲求社会之相信教育，非教育家注意于上述事情而改良之不可。

鄙意以为以后办学，务使社会明了教育内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会上之实益。欲做到此层工夫，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为教员者，又宜认真训练学生，作育人才。今社会上感觉旧学者不如新学者，则教育自然得社会之相用。又广州以丝业著名，应办蚕业学校。潮州富于水产，应办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办农业学校。若在潮州办农校，在北江办蚕业学校，在广州办水产学校，则其所学非应所在地社会之要求，其学术之应用颇易自减，而教育力因以不大。前者言欲，用学术之应用效力大，而令社会了解内容，后者言欲学术应用力大，不可不适应社会之要求。推而言之，而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处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裨实用也。又如动、植物学，其分配种数，虽甚清晰，而对于我国地方种类，多付阙如，亦有何大用之处。故学术与社会分离，是死学术，学术与社会合，方是活学术。……

（四）文化普及的效力。我国教育与社会分离，教育对于社会，亦取闭关主义，而广东尤甚。故学校门首，多有挂“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等牌，不准外人窥看，人以为内中有不可告人之处。不知凡学校图书馆等，宜令人人皆可入内参观，使人人皆得增进知识，社会得渐渐改善。故外国图书馆，通俗演讲，均取开放主义，无论何人均可入内观听。我国宜采取此法，使教育与社会合。否则教一千学生只一千学生受益耳，讵能希望文化普及乎！以上种种不好之处，皆就教育与社会分离而言。今后希望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则幸甚，幸甚！

陈独秀

##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

——1921年1月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的演讲

现在我所讲题目，是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女子问题，近来研究的人很多，但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所以我今日提出来讲讲，想于没有系统之中，找出一个系统。

今日所谓伦理，大概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一种是牺牲弱者抵抗强者。现在军国主义，都是牺牲弱者的一种，是牺牲弱者帮助强者；与此相反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主义帮助弱者抵抗强者。社会主义中最要紧的是劳动问题，然而劳动与女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中最没有能力的，劳工受资本家压迫，妇女受男子压迫，我们今日固要帮助劳工抵抗资本家压迫，尤要帮助妇女抵抗男子压迫。但今日我们专讨论的是女子问题，关于劳工问题，暂且不说。我虽单讲女子问题，然与劳工问题也有关系，因劳动不单是男子的事，女子也与劳动很有关系的。

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因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的事情，因社会造成个人的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方有社会主义发生。讨论这点，妇女问题，自然是连带发生了，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

中国妇女，伦理上的信条，是三从主义，所谓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因在家从父，女子一切活动，都要受父亲的干涉，而做父亲的干涉女儿，差不多当女子是桌上一个瓶，摆在一块地方，什么用也没有；做父亲的，可以将女儿卖给人，送给人，并且他父亲要恭维人巴结人，可随便把伊送人做妻做妾，女子若不肯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是不行的。现在中国女子婚姻问题当中，百人中想自由的不过一、二人，其余的多是父母作主。父母也不是单为子女设想，不过为自己联络有权势的人，便送给他人做妻，拿女儿作他一己攀援富贵的敲门砖罢了。女子在家从父，可以谓之全然没有人格。至于出嫁从夫，男子叫女子做事，女子不能抵抗，若是抵抗，社会断不相容，做夫的不但可以命令女子，并且也可以卖，也可以送。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男子，因吃鸦片烟，把他妻卖去的，也有强迫他妻去卖淫的。有人告诉我，广东有一处地方——我不知是不是——可以将女子租给别人，在古代社会，这种事很多。我固然不信广东还有这种野蛮行为，但或者形式上没有，而精神上也许有的。

现在女子结婚，差不多都是父母贪图富贵，不但父母把自己人格取消，而许多女子也把自己的人格取消了。广东情形，我知得不十分清楚，至于上海情形，很是可悲。有一个上海很著名的学校，多数学生没有独立的思想，伊们知识虽好，而思想仅得一个，就是穿着要阔，要时髦，假使有一个不甚时髦，大家都看伊不起，而自己也觉得不像样。伊们最后的思想，就是要嫁一个留学生，回国之后，要做大官。但伊们的衣饰从哪里来呢？伊们既不劳动，当然得不到，所以伊们的希望，只有望男子送来，这样的思想，自然把

自己的人格丧失了。现在许多女子不想独立，只想穿阔衣服，也是把自己的人格同时丧失的。

中国社会上的女子，无论从父从夫，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靠父养的，固没有人格，靠夫养的，也没有人格，所以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

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为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

现在尚有另一问题，许多人可以说：不必社会主义，女子也可独立；不在社会主义之下，也可不受父母男子的压迫。这句话初看来，很有道理，但是错了，因离了父母家庭去谋独立生活，是不行的。何以见得呢？因女子离了家庭的奴隶生活，自然去谋独立生活，但社会是不许的。我们想想：女子离家庭而独立生活，去什么地方生活呢？在什么地方能谋生活呢？无论什么地方，都在资本制度之上，一部分雇人做事，一部分帮人做事。女子若离了家庭，雇人做事呢？还是被雇于人。如果要雇人，真是笑话，不会有的。伊们既不能雇人，一定要受人雇，一定附于资本家，那么，就会变成资本家的奴隶了。从前女子是家庭的奴隶，而离了家庭，便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女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社会主义之下，不是这样。工人资本家没有分别，大家都要作工，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才能根本解决。女子在家庭，固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也有独立的人格。

我今天所讲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因为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伦理，不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就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女子与劳动者全是弱者，所以我们要帮助弱者抵抗强者，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我以为不论男女，都要研究社会主义，而女子比男子更要奋斗才好。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这不单是女子的事，而男子也是这样。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就是我今日讲社会主义的意思。

## 茅盾

### 文学与人生

——1922年在宁波“四明夏期讲习会”上的演讲

今天讲的是文学与人生。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因此，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没有清楚的界限。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辞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更没有说起。所以要讲本题，在中国向来的书里，差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参考。现在只能先讲些西洋人对于文学的议论，再来讲中国向来的文学，与人生有没有关系。

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可以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背景”就是所从发的地方。譬如有一篇小说，讲一家人家先富后衰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要问讲的是哪一朝。如说是清朝乾隆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他讲的话，究竟像乾隆时候的样子不像？要是像的，才算不错。上面的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从这两句话上，大概可以知道文学是什么。固然，文学也有超乎人生的，也有讲理想世界的，那种文学，有的确也很好，不过都不是社会的。现在我们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单是说明“社会的”，还是不够，可以分下列的四项来说一说。

（一）人种。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哪一种人，有哪一种的文学，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头发、眼睛等一样。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条顿人刻苦耐劳，并且在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说到苦痛的结果，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烈。法国作家描写人物，写他们的感情，非常热烈。假如一个人心里烦闷，要喝些酒，在英人只稍饮一些啤酒，法人却必须饮烈性的白兰地。这英法两国人的譬喻，恰可以拿来当作比较。文学上这种不同之点是显然的。

（二）环境。我们住在这里，四面是什么。假设我们是松江人，松江的社会就是我的环境。我有怎样的家庭，有怎样的几个朋友……都是我的环境。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在上海的人，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从事革命的人，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生在富贵人家的，虽热心于平民主义，有时不期然而然的有种公子气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

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他的作品里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就是并不提起他的环境，但是他的作品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即使是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仍旧是有关系。因为他的“反”，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激，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至于正面的例子，在文学史上简直不胜枚举。例如法国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申特虽为了他的革命思想，逃到外国，可是他的作品，总离不掉法国那时代的色彩。举眼前的例：我们在上海，见的是电车、汽车，接触的可算大都是知识阶级，如写小说，断不能离了环境，去写山里或乡间的生活。英国诗人勃恩斯（Burns）的田园风景诗，现在人说他怎样好，怎样美丽，平静；十九世纪末，作家都写都会状况，有人说他们堕落；这都是环境使然。又如十九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厌了城市生活，去描写田园，但是他们的望乡心，一看便知。这就是反面的例。可见环境和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有人说，中国近来的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事，他怎样能写别的？

（三）时代。这字或是译得不好。英文叫 epoch，连时代的思潮，社会情形等都包括在内。或者说时势，比较近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时代精神”这一句话。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之与形。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自然也有例外，但大体总是如此的。我们常听人说，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这是近世时代精神表现于文艺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学里，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大文学家的作品，哪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法国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文学作品，严格他说，都是作家的自传。……”就是这个意思了。

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也拿这四项做根据。第一，中国文学，都表示中国人的性情：不喜现实，谈玄，凡事折中。中国的小说，无论好的坏的，末后必有个大团圆：这是不走极端的证据。关于人种一条，可以说没有违背。第二，环境更当然。中国文学的环境，自然都是中国的家庭社会。第三，时代的关系在中国似乎不很分明。但仔细看，也有的。讲旧文学的人说：同是赋，两汉的与魏晋的不同；同是诗，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李义山的无论哪一首诗，必不能放在初唐四

杰的诗中。他们的诗，同是几个字缀成，同讲格律，只因时代不同，作品就迥然两样。《世说新语》的文字，在句法与文气上都与他书不同，《宋人语录》亦如此，与《水浒》不同，与《宣和遗事》又不同。这都可以说因为时代空气不同。非但思想不同，文气、格律也有不同。可见时代的影响，也很厉害。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盗名的，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在中国也不是例外了。

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不过如此。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凡要研究文学，至少要有入种学的常识，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且要懂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 梁启超

### 学问之趣味

——1922年8月在南京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的讲演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象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之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搁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时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人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替你晒不来。

## 梁启超

### 人权与女权

——1922年11月为介绍两方社会学启迪国人思想所作的演讲

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女人也是人，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在里头，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哈哈！不通诚然是不通，但这个不通题目，并非我梁某人杜撰出来，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通，我不过照实说，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罢了。

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什么叫做人？”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梁某只怕疯了，这问题有什么难解？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这个答案错了。这个答案只能解释自然界“人”字的意义，并不能解释历史上“人”字的意义。历史上的人，其初范围是很窄的，一百个“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之中，顶多有三几个够得上做“人”，其余都够不上！换一句话说，从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历史慢慢开展，“人格人”才渐渐多起来。

诸君听这番话，只怕越听越糊涂了。别着急，等我逐层解剖出来。同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权，我也该享有。是不是呢？着啊，果然应该如此。但是从历史上看来，却大大不然。无论何国历史，最初总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隶”。奴隶岂不也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吗！然而那些非奴隶的人，只认他们是货物，不认他们是人。诸君读过西洋历史，谅来都知道古代希腊和雅典，号称“全民政治”，说是个人人都平等都自由。又应该知道有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是主张共和政体的老祖宗。不错，柏拉图说，凡人都应该参与政治。但奴隶却不许。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并不是人！雅典城里几万人，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参与政治。为什么说是全民政治呢？因为他们公认是“人”的都已参与了，剩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隶，本来认做货物不认做人。

不但奴隶如此，就是贵族和平民比较，只有贵族算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平民顶多不过够得上做半个人。许多教育，只准贵族受，不准平民受；许多职业，只准贵族当，不准平民当；许多财产，只准贵族有，不准平民有。这种现象，我们中国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时候便是如此；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到十八世纪都是如此。

在奴隶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隶的人把奴隶不当人看，连那些奴隶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在贵族制度底下，不但贵族把平民当半个人看，连那些平民也自己觉得我这个人和他那个人不同。如是者浑浑沌沌过了几千年。

人是有聪明的，有志气的，他们慢慢的从梦中觉醒起来了！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我也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为什么你便该如彼我便该如此？他们心问口、口问心，经过多少年烦闷悲哀，忽然石破天惊，发明一件怪事：“啊，啊！原来我是一个人！”这件怪事，中国人发明到什么程度我且不说，欧洲人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大约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一旦发明了自己是个人，不知不觉的便齐心合力下一个决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条件预备充实，一面要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第一步，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不能让贵族和教会把学问垄断。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

能就相当的职业，不许说某项职业该被某种阶级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为保障前两事起见，一国政治，凡属人都要有权过问。总说一句：他们有了“人的自觉”，便发生出入权运动。教育上平等权，职业上平等权，政治上平等权，便是人权运动的三大阶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齐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十九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

万岁声中，还有一大部分“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在那边悄悄地滴眼泪。这一部分动物，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这一部分是谁，就是女子！人权运动，运动的是人权。他们是 Women 不是 Men，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却不关她们的事！

眼泪是最神圣不过的东西，眼泪是从自觉的心苗中才滴得出来。男子固然一样的两只眼睛一鼻子，没有什么贵族、平民、奴隶的分别，难道女子又只有一只眼睛半个鼻子吗？当人权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又发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有了这种发明，于是女权运动开始起来。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广义的人权运动。

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平民运动正是一样，要有两种主要条件：第一要自动，第二要有阶段。

什么叫自动呢？例如美国放奴运动，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爱心的白人要解放他们，这便是他动不是自动。不由自动得来的解放，虽解放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不惟如此，凡运动是多数人协作的事，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所以要多数共同的自动，例如中国建设共和政体，仅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动，其余大多数不管事，这仍算是他动不是自动。像欧洲十九世纪的平民运动，的确是出于全部或大多数的平民自觉自动，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彻底的理由，全在乎此。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

什么是阶段呢？前头说过，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这三件事虽然一贯，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说：我们贵族所有的学问知识，你们平民没有；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你们平民办不下来。这话对不对呢？对呀，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情状，的确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我敢保《人权宣言》一定发不出来，即发出来也是空话。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这种机会陆续到手，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纪时，平民的知识能力，比贵族只有加高，绝无低下，于是乎一鼓作气，把平民运动成功了。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

他们的女权运动，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女权运动，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为什么不振呢？因为女子知识能力的确

赶不上男子。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打破之后，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现在欧美这种运动，渐渐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们怎么样呢？哎，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连大部分男子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何论女子！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所以有些人主张“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这种话对吗？不对。欧洲造铁路，先有了狭轨，才渐渐改成广轨；我们造铁路，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有什么客气！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我们并做一回，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却是断断乎不行的。我说一句不怕诸君呕气的话：中国现在男子的知识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的，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讲女权吗？头一个条件，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换一句话说，是要有职业。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谁争赢谁？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十位女子和十男子竞争，又谁争赢谁？再进一步，假使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到选举场中公开进演自由竞争，又谁争赢谁？以现在情形论，我斗胆敢说：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子的知识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吗？不然不然，不过因为学力不够。为什么学力不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没有均等机会。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然而学力不够，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诸君在英文读本里头谅来都读过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 一知识即权力。不从知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老实说一句：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说没有吗？《约法》上明明规定；说有呢？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看见哪一位男子曾参加过政来？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供那班“政棍”买票卖票的工具！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就让你争得女子参政权，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赵兰、钱惠、孙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几票生意！我真不愿意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平心而论，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愤激之谈，我也不愿多说了。归根结底一句：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知识能力上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诸君啊！现在全国中女子知识的制造场，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除却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外，别无捷径。我盼望诸君和全国姊妹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真可以欢呼人权万岁了！

## 梁启超

### 为学与做人

——1922年12月在苏州就读书与做人问题作的演讲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聚在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别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

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起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耦”。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元二元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本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而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阴。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下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

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件。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枲。子曰：“枲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刚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绝不会有藏头缩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二点把握都没有，噁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办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主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好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郭沫若

## 生活的艺术化

——1925年5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演讲

今夜的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提到这个题目，各位一定会联想到英国的十九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运动上来。他们的主张就是要用艺术来使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美化的。那很有名的王尔德（Oscar Wilde），他便是这项运动中一位健将。他曾经穿着很奇怪的服装，在伦敦街市上游行，逗得当时的人们注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不过是偏于外部生活去了。我今晚所说的与此稍微不同。我的意思是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

那么，艺术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先从艺术讲起吧。各位都是知道的，艺术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两大类。譬如，绘画所含者有平面，有长有阔（2Dimensions）；雕刻、建筑所占者为立体，有长有深远有深度（3Dimensions）；这都是属于空间的。其次如舞蹈、音乐、诗文，是时间上的表现，故属于时间艺术。古时的人多趋重时间艺术，而轻视空间艺术；如希腊的司美的女神有九个，但所管者仅舞蹈、音乐、诗文三种。至于建筑、雕刻、绘画则元神司其事。就是后来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他把艺术分为几种等级。他以所含观念的多寡定它们等级的高下。他的等级是：建筑、雕刻、绘画、舞蹈、音乐、诗文（依次升级，诗文最高）。本来照现代的时空论上说来，时间和空间原是相互关系而存在的，绝对不能划然分开。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这样分别，乃至要勉强的定出高下的等级来，只算得是历史上一件有趣的事罢了。近代艺术已把这种无谓的分别打破了。如英国的裴德（Walter Pater）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上有句话说得好：“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的”。这便是说一切空间艺术打破了静的空间的界限，趋向于动的方面。譬如现代绘画中的后期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在努力表现动的精神。未来派画马不画四只脚要画二十只脚，画运动不画成直线要画成三角形，这都是动的精神的表现。看来，西洋的绘画是由静而动，动的精神便是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实在比他们先进了。那很有名的南齐的谢赫，他所创的画的六法，第一法便是“气韵生动”。这便与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不谋而同，动就是动的精神，生就是有生命，气韵就是有节奏。唐朝的王维，这是谁也知道，他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人们称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我觉得诗中无画，还不十分要紧，因为诗最重节奏，就是要“气韵生动”。如果画中无诗，那就不成其为真的艺术了。我们说画中有诗，并不是说画中有什么五言诗、七言诗或四言诗，乃是指画中含有诗意。这诗意便是“气韵生动”。凡是“气韵生动”的画；才是一张真的画，因为艺术要有动的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艺术要有“节奏”，可以说是艺术的生命。何以我们不重视照片而重视绘画？又何以我们不重视报纸上的新闻而重视诗词和

---

Dimensions，英文，意思是度数或维数，二度或二维，指平面；三度或三维，指立体。

小说？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古到今的诗人画家，很多很多，而不朽的大诗人，大画家，却又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呢？那便是艺术的生命不容易把捉的原故。艺术的生命究竟怎样才可以把捉？这实是一件很难说明的事。一般人因其难以说明，便把他归于“天才”。批判哲学的开山始祖康德（Kant）也说：“艺术即天才之作品。”但是天对”又是什么呢？是天上落下来的吗？是生来便与人不同吗？近代精神分析学家龙布罗索（Lombroso）说，天才就是疯子！这也和说天才就是“天才”一样，同一莫名其妙。其实天才并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什么疯子，仍旧和常人没有两样，不过我们不曾探求得它的秘密罢了。《庄子》上有段很有趣的故事，我可以抄引下来：

梓庆削木为鐻，见者惊若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来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

（《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为笋虞”，虜字就是这个鐻字。梓人即雕刻师。笋虞是钟磬之架，横柱曰笋，竖柱为虞。上面刻有虎、豹、飞禽、龙蛇等形象。

这一段文字，我以为可以道尽一切艺术的精神，而尤其重要的，便是其中的“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这几句话。这便是天才的秘密，便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是能够置功名、富贵、成败、利害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自然会成为伟大的艺术，他的自身自然会成为一位天才。所以我说天才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疯子，他并没有什么秘密。他的秘密就在前面说过的这几句话里面。德国哲学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天才即纯粹的客观性（Reine Objektivität），所谓纯粹的客观性，便是把小我忘掉，溶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

艺术的精神就是这无我，我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时常体验着这种精神！我们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先，总要先成为一个人，要把我们这个自己先做成一个艺术！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发而为画，发而为诗，自然会有成就；即使不画画，不做诗，他的为人已经是艺术化了。无论政治家、军人或其他，倘若他们的生活都具有艺术的真精神，都以无私无我为一切生活的基本，那么这个世界便成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了。至于艺术上的技巧，如诗之音韵、画法之远近，音乐声调之高低，人人都可以学习得到，但也当以无我的态度进行学习。

上面唱了一大篇的高调，各位听得很吃力吧。现在我要再唱一点低调了。德国大诗人歌德（Goethe）有篇诗叫做《歌者》（Der Sanger）。这是一篇小型叙事诗。那诗里是叙述一个国王一天坐在堂上，听见外面有个歌者，唱得非常动听。于是便把他招至堂上。王的堂上非常的壮丽，好像今天在此地一样，有雄纠纠、气昂昂的男士们，有美貌的女士们。歌者见了，赞颂了一番，于是闭着眼睛不敢仰望那堂上的众明星，便调好声音高唱。他唱完之后，堂上的听者皆被感动，王便赠他一只金杯作为报酬，他却辞谢不受。他说：“你把这杯赠与武士吧，他们能在疆场上为王杀敌；你把这杯赠与财政大臣吧，他能为王生息再赚几个金杯；至于我呢？”他说出了下边的几句诗。我觉得

很好，我今天晚上所讲的魂髓便在这儿。我把它念出来，同时作为我今天晚上的讲话的结尾。

Ich ' sinde , wiedervogelsingt ,  
DerindenZweigenwohnet ;  
DasLide , dasausderKehledringt ,  
IstLohn , derreichlichlohnet。  
我站立在这儿清讴，  
好像只小鸟儿唱在枝头；  
歌声进出自我的歌喉，  
这便是我无上的报酬。

恽代英

##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

——1926年5月22日在岭南大学的演说

今天承岭南大学欢迎之便，使我与岭南大学各位教员先生与各位同学有一个谈话的机会，这是很荣幸的事情。我对于岭南大学虽然以前并不知道学校中间一切详细情形，但是我可以说我实在很久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我并不知道史坚如烈士便是岭南大学的学生，我脑筋中有一个岭南大学是从五卅运动时候起。亦许有人疑惑岭南大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有帝国主义关系的，但我却很注意岭南大学，我相信在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间，一定有很多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就我所知道的，在这个学校不但有一个教员、一个同学为反抗帝国主义在沙基牺牲了性命，并且有许多外国教员先生为了与我们打抱不平，在香港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许多恶劣待遇，这表明岭南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绝对不同。不但一般中国的教员和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中国教员和学生不同，便是外国教员先生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在中国中部北方一般教会学校中做事的人，怕我们如怕蛇蝎一样，他们要用种种手段妨害我们，使我们进不了他们的学校，永远没有和他们学校中的同学相互谈话的机会。但岭南大学因为与他们绝对不同，所以不但怕我们，并且欢迎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宣传的机会。我今天能在这样一个表同情于反帝国主义的岭南大学讲话，自然是再高兴没有的事情了。

人们彼此没有见过面谈过话，彼此之间常常不免有一些隔阂或误解。譬如我来到岭南大学的时候，我未曾听见岭南大学教职员先生们为我解释学校内部情形，我终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我总怀疑岭南大学仍旧不免有许多普通教会学校的弊病。但自从我听见他们为我们解释的话，我便更明白你们学校的真正情形了。我们亦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便以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稣，不尊敬基督教徒与他们所办的教育慈善事业。其实这许多是误会。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今天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不妨把我的真正态度说与诸位听听，以免除大家的误会，并且可以提出我的意见，请诸位加一个批评。

我的意见，决不轻看耶稣的为人，我相信耶稣是古犹太的一个“圣人”，像孔子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圣人”一样，而且我相信耶稣实在有许多超过孔子的地方。至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我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思。

为什么说耶稣是超过于孔子的圣人呢？我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满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类的圣人。他生在春秋的时候，看见各国诸侯不讲道理压制人民，各国之间又时常发生战争，伤害许多性命，扰乱得全世界都不安宁。他因为学了一些古圣先王的道理，知道天下之乱都由于为人君的不存仁心、不行仁政之所致；于是他便奔走列国，向那些人宣传，今天见齐景公，明天见卫灵公，一个地方没有将席坐暖，便又爬起来跑到别一个地方，可怜他一直跑到胡子头发白的时候，除了每到一个地方混得几餐饮食，临行时混得几个盘费以外，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他老人

家又跑了回来，删诗订礼，还希望在他未死以前，做几部好书，以便后之人君或有能采取其学说以行仁政于天下的。像孔子这样诚恳勤劳，为人类做事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不推尊他为圣人呢？不过孔子有一种很大的缺点，便是他看见这些不仁之君，不知道到人民中间去宣传组织人民，只知道去找那些人君，须知那些人君没有民众的势力在背后监督督促，专想靠讲什么道理以劝化他们，是不会有什功效的。孔子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生只是钻烟囱。不过他老人家精神很好，刚刚从上个烟囱里钻了出来，又钻进别个烟囱里面去，周游列国，钻遍了列国的烟囱，眼了七十岁左右跑回鲁国仍旧删订了许多书，要后世他的门徒继续他的钻烟囱的事业。这一方是他的愚笨可怜的地方，然而亦是他的精神不可及的地方。到了后世他的门徒，便更糟糕了。他的门徒读了他所删订的书，却比他聪明狡猾，知道像他那样钻烟囱，是划算不来的事情；同时他的门徒多半亦没有他的名望资格，可以随便到各国谒访人君，因此他们学了孔子的书，完全不去钻烟囱，只知道拿那书中的话做文章，考秀才、举人，成为他们进身之阶，同时又拿这去说与农夫、工人听，表示他们的博学多闻，于是帮助一般君主压迫这些农夫、工人，这些农夫、工人还认为这是孔圣人的道理，不敢反对他们。所以孔子还只是钻烟囱，他的门徒却成为一般人君的走狗了。

耶稣的仁慈想救世界人类，与孔子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却不像孔子那样钻烟囱。孔子对于压迫人民的人只知讲劝化，所以他总是跑去见那些国君，时常与他们讲话；耶稣则不然，他并不跑去见什么人君，他有些像我们现在的革命党一样，好接近宣传民众。他对于压迫人的人，不只是用劝化的方法，他并且骂他们。照《圣经》所说，他到神庙中间去的时候，看见有些商人在庙中做生意，他便骂他们，将他们摆的摊子丢到庙门外面去了。在《圣经》中又常常看见他骂那些犹太的祭司与收税吏，这都是直接压迫犹太人民的人。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很有些革命精神。他这种勇敢的行为，所以使他后来遭杀身之祸。然而这便是孔子所万万不能及他的地方了。不过耶稣亦是与孔子一样，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两千年收了许多门徒，但是他们通通没有能够救世界。耶稣仍旧与孔子一般，不能够救世界。为什么我说耶稣是超过孔子的“圣人”呢？这中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耶稣自身仍旧有一种缺点，他虽能够骂那些压迫人的人，然而那些压迫人的人是不会因为怕他骂便改悔过来的，你越是骂他们，他们越是恨你，想谋害你。我们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将一切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来打倒他们。换一句话说，要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孔子的“劝”的法子是不中用的，耶稣的“骂”的法子亦是不中用的，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我们革命党“打”的法子。我们革命党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天天干打倒这些东西的工作，我们与孔子、耶稣不同的地方，便是不靠“劝”，亦不靠“骂”，对于这些反动的势力直截了当的“打”倒他。孔子、耶稣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圣人”的法子是都失败了的，所以这便是他们都不如革命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耶稣的门徒亦与孔子的门徒犯一样的弊病。他们看见耶稣爱骂人以后遭了杀身之祸，所以他们便不肯随便骂人了。他们学了耶稣的道理，既不去劝化那些压迫人的人，亦不敢骂那些压迫人的人，他们亦学孔子的门徒一样，只知拿这些道理去对一般农夫、工人讲，去愚弄恐吓这些可怜的人。譬如现在基督教徒对于帝国主义、军阀乃至一般土豪劣绅，谁能有耶稣那个勇敢的精神，当众骂他们呢？岂但不敢骂他们，并

且无论什么事情还要请萧耀南、孙传芳等贼酋提倡捐助，以为荣耀。耶稣的道理，遇着这种门徒，自然亦便糟糕了。

我见到基督教徒中虽然确实有若干好人，然而这些好人对于中国做不出什么切实的事情。教会里正在布道祈祷的时间，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在拘捕杀戮，或者在压迫苛待中国平民。这些教会中的好人，既不能劝止帝国主义、军阀的残暴行为，他们又怕得罪帝国主义、军阀，不敢提倡而且不愿赞助中国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行动。他们明明看见中国平民被帝国主义、军阀踏在脚下，但他们老守着和平忍让的教训，向践踏在帝国主义、军阀脚下的中国平民宣传和平忍让的道理。这样子下去，中国平民倘若完全相信了他们的宣传，不是永远被帝国主义、军阀践踏一世，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么？我为不忍见我们中国同胞这样被人践踏，所以反对基督教。但是我要申明，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中间没有许多好人，不过这些好人因为相信了基督教，自己不革命，而且亦劝人家不要闹革命的事情，天天教人家礼拜祷告，引诱许多人脱离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战线。这是我觉得可惜，亦是我所以不得不反对基督教的原故。

外国先生在中国办学校，有的人要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些办学校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所以主张取缔外人设立学校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外国先生是爱他们本国的，他们为中国人办学校，一方固要为我们中国人谋幸福，然而一方亦决不愿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所以英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善。这决不是外国先生主观上对于我们有什么恶意，故意欺骗我们；而且他们所鼓吹的国际亲善，亦不能说是不应当的道理。为什么中国民众与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不应当亲善呢？不过有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对于英国民众、美国民众虽绝对应当讲亲善，然而对于英国、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加于我们的压迫，我们却必须要毫不迟疑的打倒他。外国先生劝我们中英亲善，中美亲善，是很对的。不过可惜在他们劝我们讲亲善的时候，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者同时却正在侵略压迫我们。这些外国先生因为爱国，不愿反对自己国里的人，所以亦不反对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的政府；并且他们亦知道若反对了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的政府，不但似乎非爱国之道，并且恐将来自己回不了本国去，至少以后再不容易在本国那般大人先生们面前募捐盖造学校、教会。因为这些外国先生爱国，因为他们还想有回国的一天，因为他们还想募捐盖造学校、教会，于是他们不但要我们对他们的民众亲善，而且要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政府亲善，而且不愿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政府不亲善。他们在中国办了学校，在学校内对于学生，只讲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政府对于我们怎样“好”，把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政府如何黑暗、惨酷压迫我们的行为隐瞒到一字不提。若是学生在别的地方知道了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要起来反抗，他们还要帮着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政府来压迫我们的学生，或是开除，或是解散学校。我以为在我们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虽然根本并不是坏人，然而我们中国青年多一个人进英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多一个人进美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有人说外国先生在他们外国捐来了许多钱，盖造了许多洋房子，亦有许多难得之处。这些话自然是很对的。不过这些钱从外国送到

中国来的越多，我们中国民族精神消磨了的亦便越多，帝国主义的捐款，好比是购买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代价。我并不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都不是好人，无论他的本意是怎样的好，这种学校对于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总是有绝大妨害的。

今天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在岭南大学发表了我这一篇意见。我对于岭南大学，只是还有几个希望：第一个希望，便是还要在学校内提高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办理岭南大学的虽然亦有几位美国先生，我就沙基惨案时的事实看来，我相信这几位美国先生一定是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同志。至于中国先生与全体同学，自然更是反帝国主义的同志，无待言了。我愿意勉励岭南大学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的便是，我们应当有更高的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我们不但要预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亦应当预备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相信美国的人民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犹如日本的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手段压迫我们，亦正与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岭南大学一定要与别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不同。无论什么帝国主义者，一定都要反对我们。虽然受了美国先生的教育，然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旧必须加以极严厉的反对，这并不是对不住美国先生，只有能够这样，方可以证明美国先生来办学校，完全是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为要欺骗软化中国人，使大家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而且我还要说，不但受美国先生教育的同学应当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并且诚心诚意欢迎美国先生们，下一个勇敢的决心，把耶稣痛恶恶人的精神拿出来，与我们一块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令我们中国人放心，知道外国先生来办学校，亦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帮助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者。

……我们中国今天的青年，要去革命，要学习革命的知识技术，要学习革命的生活，所以我很痛心有许多与外国先生有关系的学校，强迫许多不愿意的青年，要他们做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情。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亦希望岭南大学的先生们想一想。

话说得太长了！总结起来，我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很感谢岭南大学今天的欢迎会，我们希望岭南大学的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要永远做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 鲁迅

###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1927年就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发表的演说

我本来不常出来讲演的，现在因为这里同学说过好几次，所以今天跑来随便谈谈，却不能算是讲演。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题目，——就谈谈文艺和革命的冲突吧。

文艺和革命本来没有冲突，但文艺和政治是常常根本冲突的。政治要保持现状。革命要破坏现状，文艺也是想破坏现状。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新文艺，大概都带着破坏性的。政治家只要别人服从，不许别人反抗，他们所做的是，最好没有人开口，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反抗，像猴子的头目似的，猴子的全体就该听他的号令，要你死就死，要你走就走。原始时代的酋长，也是这样，他的命令就是天命，就没有人反抗，也没有人怀疑。那时所有的文艺，不过一些赞美歌，问或有几首恋爱歌，决没有反抗的思想和文艺产生。后来人类社会进化了，由小部落变为大部落，又进步而为国家。但并合而成的大部落或国家，是没有不分裂的。因为并合了许多国家，集合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就会生出种种不同的思想和文艺。政治想把国家团结拢来，文艺思想却要把国家分裂。所以文艺思想的发达，一方面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一方面却使国家破裂，其实破裂倒是催促向上的，进步的，文学家希望破裂，政治家希望不破裂，结果是文学家受排挤。当革命者不曾成功的时候，他们和文学家是合作的，他们要利用文学家做宣传革命的工具。一到革命成功，革命者变为政治家，他们只许别人服从，他们是一言一行不容他人有怀疑的余地。但文学家有自己的理想，不肯附合别人的意旨，就不能不受排挤。西洋有许多文学家都不能在本国安居，俄国革命的时候，有许多文学家很出力叫喊，等到革命成功，他们便又逃走，或自杀了。

有些人将文艺和人生离开，譬如做“春天的花开呀，秋天的花谢呀”的白话诗，与人生似乎没有关系。中国的道家反对这种嘲花弄月的文艺。外国人却不禁止，由你们躲在象牙塔里说话、说花、说爱、说梦、说理想。躲在象牙之塔里说话，固然比较十字街头安稳。但象牙之塔也筑在地上，也得受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战争的时候，没有人从窗口送面包给他们吃，他们也就没有功夫谈花月，不能做美文，也不能有美的思想了。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人和人力车夫做材料。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是雅。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方来了，因为北京的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吃，不能不跑了。照这样看来，这种文学家在平时固然没有什么危险，但在国家不太平社会不安宁的时候，也要出来找面包当教员。为人生的文艺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很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人困苦。照我个人的意见说起来，文艺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富家子弟大半不知道社会的苦况。挪威有一位文学家，专写一个人肚皮饿，写成一大本书。不曾饿过的人，大概不会知道饿时的况味。诸位且试一试，饿两天或两餐，必定



可以发现饭的异香，走过饭馆，也曾闻出异样的香味来。有钱的时候，看见钱并不感到稀奇，元钱的时候，一文钱也觉得很宝贵。穷人看见阔人，觉得不舒服；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看见穿粗布大衫的人也会不舒服，说他不应该穿那么值钱的大衫。我的小说里面，曾经描写过一个穷人，他的精神起了变化，他明知道抽屉里，是空的，但他却抽开来寻了又寻，看看里面究竟有钱没有。这种心理，是我当学生时经验过来的。

有些元钱的人常常要想世界的好坏。有些无钱的人，尝过种种困苦，觉得钱是最好的东西，就变成个人主义者，有一文守一文，不给别人。中国是个人主义者居多数。有些人想：“无钱是很，昔的，世界上苦人很多，我应该设法救助他们。”这种人就成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对于现状不满意，要反抗政治家，反抗政府；所以政府总是讨厌人道主义者。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却反对贵族，反对威权。他自己打过仗，写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描写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时候，大军官躲在一个铁板的后面，托氏是小军官，没有铁板保护，所以他说，不看见那铁板，倒还不怕，看见那铁板，就更觉得可怕了。托氏眼见战争的惨状，眼见朋友的死伤，所以讨厌战争。大凡战争的结果，一部分人变成英雄，做了大官，忘了战时的恐怖，不反对战争。一部分的人忘不了战时的恐怖，变成非战论者。托氏主张不听皇帝的号令，也不主张杀皇帝，他主张元抵抗主义，法官不替皇帝判决罪人，警察不替皇帝捉人，皇帝也就不能为恶人。他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仍然和政府冲突，所以俄国政府还是厌恶他。

文学家和艺术家都被政治家厌恶，似乎是命定的。政治家爱杀艺术家，割了他们的头，他们便不能说话了。但杀也无用，文家学往往是替社会说话，不是替个人说话，他们的感觉比较灵敏，虽然在替社会说话，但社会不曾感到的，他们先感到了，所以社会也厌恶他们说得太早，太急进。譬如你们学兵操，教员喊“举——枪”，倘若“枪”字还不曾喊出来，你便把枪托上，一定要挨骂的。政治家也是一样，骂艺术家说话太早大快，非杀不可。但社会的不安，并不是艺术家所能煽动的，杀掉艺术家，不安仍旧存在。艺术家说话时，社会已经不安，已经有着造反和捣乱的潜伏思想了。艺术家死后四五十年，社会起了革命，所闹的问题时常和艺术家四五十年前说过的相同。于是政治家更讨厌文艺。但他们不懂文艺的作用，不明白文艺的原理，只知道禁止开会，禁止演说，到死都不会觉悟。所以文艺和政治永远不能调和，永远闹不清楚，譬如做官的人，今天听了我的话，一定要说：你做文章怕杀头，所以归过于社会，永远弄不明。

我在广东曾说文学不能鼓动革命，一位少年英雄便痛驳一通我的话，说一定可以帮助革命，革命文学是如何紧要。其实是有文学也会革命，没有文学也会革命的。文学家只要写出社会的痛苦便完事，不一定要“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才算是革命文学。革命以前，做了许多革命文学，是无效的；革命的时候，你忙的是革命，哪有工夫做文章。一面拉车一面作诗是不方便的。据说古时有人一面做诗一面耕田，我却不信。我从前有一位学生在军队里面服务半年，写信给我，把许多中国字忘掉了，可见干革命事业的人，是没有工夫“之乎者也”的，所以我说“革命期中元文学”。像俄国革命的时候，大家拿着票，排着队伍领面包吃，不管你是文学家，艺术家，X家，都该携着票去领面包，没票就不给，哪里还有工夫“之乎者也”呢？革命以后，生活比较空闲，于是人们又起来“之乎者也”了。在革命后颂扬革命，

不能说是革命文学。中国的革命已经革到徐州了，我们都在后方，在后方颂扬革命，就是颂扬已经成功的权威，可以不必。

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后来是杀，这是毫无理由的。文学家不过是一多数人的预言罢了。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半是革命的预言。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给太太小姐们消遣的，姑且不管它，但我们读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作品，便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写的是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世界的痛苦。但文艺有一个魔力，人们看了不舒服也要看。像我个人就极喜欢看不舒服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把世界写在里面，刚也把我写在里面。在作品里发见了自我，所以觉得很亲切。有些专写快活一面的作品，我却不喜欢看；如同看别人作寿，看别人娶亲，自己却感到寂寞。从前的作品是可以向壁虚构的；现在的作品，要多方面的观察，才写得出。

其实，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所以写的都是预言，一般人所不能察觉的。所以徐州未下前，革命文学家站不住脚；徐州既下台，革命文学家也还是站不住脚。总之，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家是活不下去的，因为革命文学家不是革命家。孙传芳是革命家用枪炮打倒的。不是文学家写了一首诗：“孙传芳呀，你得走了呀，你滚吧，滚吧”才赶走的。他们不是同类。

文学家是要理想革命，时时和现实冲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后都不能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永无好日，这是命运。俄国有两位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之前是赞助革命的；在革命期中，也很出力，在革命之后，却自杀了。因为文学家不能取一段落的合于他的理想，就认为满足。

梁启超

## 知命与努力

——1927年5月在华北大学的演讲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知命与努力”。知命同努力这两件事，骤看似乎不易合并在一起，《列子·力命》篇中曾经说明力与命不能相容，我从前作的诗也有“百年力与命相持”之句，都是把知命同努力分开，而且以为两者不能并存。可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现在便要研究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欧洲演说中国文化，狠攻击知命之说，以为知命是一种懒惰哲学，这种主张，能养成懒惰根性。这话若不错，那么，我们这个懒惰人族，将来除了自然淘汰之一途外，真没有别条路可走了。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现在还当讨论。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思是说：凡人非有知命的工夫不能作君子。君子二字在儒家的意义常是代表高尚人格的。可以知道儒家的意见，是以知命为养成高尚人格的重要条件。其他“五十而知命”等类的话很多，知命一事在儒家可谓重视极了。再来返观儒家以外的各家的态度怎样呢？墨家树起反对之帜，矫正儒家，所攻击的，大半是儒家所重视的。所以墨家自然不相信命，《墨子·非命》篇中便极端否认知命，在现在讲，可算“打倒知命”了。列子的意见，更可从《力命》篇中看出，他假设两人对话，一名力，一名命，争论结果，偏重于命。列子是代表道家的，可见道家的主张，是根本将命抬到最高的地位，而将力压服在下面，和墨家重力黜命的宗旨恰恰相反。可是儒家就不然，一面讲命，一面亦讲力，知命和努力，是同在同样的重要的地位，即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一句论，为君子便是努力，但却以知命为必要条件，可知在儒家的眼光中两者毫无轩轻了。

命字到底怎么解呢？《论语》中的话很简单，未曾把定义揭出来。我们只好在儒家后辈的书籍中寻解说，《孟子》、《荀子》、《礼记》，这三种都是后来儒家的重要的书。《孟子》说：“莫之致而者命也。”意谓并不靠我们力量去促成，而它自己当然来的，便是命。《荀子》说：“节遇谓之命。”节是时节，意谓在某一时节偶然遇着的，便是命。《礼记》说：“分于道之谓命。”这一条戴东原解释得最详，他以为道是全体的统一的，在那全体里面，分一部分出来，部分对于全体，自然要受其支配，那叫做“分限”，便是命。综合这几条，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行为，受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支配，偶然间遇着一个机会，或者被限制着只许在一定范围自由活动，这便是命。命的观念，大概如此。

分限——命——的观念既明，究竟有多少种类，经过详密的分析，大约有下列四种：（一）自然界给予的分限：这类分限，极为明显易知，如现在天暖，须服薄衣，转眼秋冬来了，又要需用厚衣，这便是一种自然界的分限。用外国语解释，便是自然界对于人类行为，给的一个 order，只能在范围内活动，想超过是不能的。人类常常自夸，人力万能征服了自然界，但是到底征服了多少，还是个问题，譬如前时旧金山和日本的地震，人类几十年努力经营的结果，只消自然界几秒钟的破坏，便消灭无余。人类到底征服了自然界多少呢？近几天，天文家又传说彗星将与地球接近，星尾若扫到地面，便

要发生危险。此事固未实现，然假设慧星尾与地面接触了，那变化又何堪设想，彼时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又如何呢？这样便证明自然界的力量，委实比我们人类大得多，人类不得不在它给予的分限中讨生活的。（二）社会给予的分限：凡是一个社会，必有它的时间的遗传和空间的环境，这两样都能给予人们以重要的分限。无论如何强有力的人，在一个历时很久的社会中，总不能使那若干年遗传的结果消灭，并且自身反要受它的影响。即如我中华民国，挂上民治招牌已十六年了，实际上种种举动，所以名实不符者，实在是完全受了数千年历史情[情，下同]力所支配，不能自拔。社会如此，个人亦如此，一人如此，众人亦如此，不独为世所诟病的军阀官僚，难免此情力之支配，乃至现代蓬勃之青年，是否果能推翻情力，不受其支配，仔细思之，当然不敢自信。吾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不为情力所干涉者，实不多见的。至于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日趋贫乏，几乎有全国国民皆有无食之苦的景况，若想用人的力量去改这种不幸的情形，不是这一端改好，那一端又发生毛病；便是那一端改好，这一端又现出流弊。环境的势力，好似一条长链，互相牵掣，吾人的生活，便是在这全国环境互相牵掣的势力支配的底下决定，人为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小而言之，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凡一个学校，它有学风，某一个在这学校里念书的学生，当然受学风的影响和支配，想跳出学风以外，是不容易的。而这个学校的学风，又不是单独成立的，又与其他学校，发生连带关系，譬如在北京某一学校，它的学风，不能不受全北京学校的学风的影响和支配，而不能脱离，就是这样。全北京的学风，影响到某一校；一校的学风，又影响到某一人，关系是如此其密切而复杂，所以社会在空间上给予人们的分限，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易改造的。（三）个人固有的分限：在个人自身的性质、能力、身体、人格、经济诸方面，常有许多不由自主的状态，这便是个人固有的分限。这些分限，有的是先天带来的，有的是受了社会的影响自然形成的，然而其为分限则一。譬如有些人身体好，有些人身体坏，身体好的人每天做十多个小时的功课，不觉疲倦，身体弱的人每天只用功几点钟，便非常困乏，再不停止，甚至患病，像这种差别，是没有法子去平均和补救的。讲其原因，自然是归咎于父母的身体不强壮，才遗传这般的体质。这不独个人为然，即以民族而言，华人同欧美比较，相去实在很远，这都是以前的祖先遗留的结果，不是一时的现象。然而既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再想齐驱并驾，实无方法可施。既曰实行卫生，或可稍图改善，然一样的运动，一样的营养，而强者自强，弱者自弱，想立刻平等，是不可能的。才能经济诸端，尤其易见，有聪明有天才的人，一目十行，倚马万言，资质愚笨的人，自然赶他不上；有遗产的子弟，可以安富尊荣，卒業游学，家境困苦的人，自然千辛万苦，往往学业不完。这种分限，凡为人类，怎能逃脱。身体才能，固然不能变易，即如物质方面之经济力，似乎可以转换，然而要将一个穷学生于顷刻中化为富豪，亦是不能实现的事。物质的限制尚且如此之难去，何论其他，个人分限，诚不可轻视的了。（四）对手方给予的分限：凡人固然自己要活动，然而同时别人也要活动，彼此原都是一样的。加之人的活动方面，对自然常少，而对于他人的常多，所以人们活动是最易和他人发生关系的。既然如此，人们活动的时候，那对手方对于自己的活动也很有影响，这影响就是分限了。人们对他人发生活动，他人为了应付起见，发生相当的活动来对抗，于是自己起了所谓反应。反应也有顺的，也有逆的，遇见顺的，尚不要紧，遇见逆的，则自己的活动将受其限制，

而不能为所欲为，于是便构成了对手方的分限。这可以拿施教者与受教育者做个比方，施者虽极力求其领会，然受者仍有活动的余地，若起了逆的反应，这个教育的方法，便要失败的。此犹言团体行为也。个人对个人的也是如此，朋友、夫妇间的关系，何莫不然，无论如何任性的人，他的行为总难免受其妻之若干分限，妻子之面亦同。人生最亲爱者，莫如夫妇，而对手方犹不能不有分限，遑论其他。犹之下棋，我走一着，人亦走一着，设禁止人之移棋，任我独下，自属全胜，无如事实不许，禁止他人，既难做到，而人之着一着，常常与我以危险，制我之死命，于是不得不放弃预定计划，与之极力周旋，以求最后之胜利。此即对手分限之说，乃人人相互间，双方行为接触所起之反应了。

此四种分限——再加分析，容或更有——既经明了，只受一种之限制时，已是发生困难，使数十年之工作，一旦毁坏，然人生厄运，不止如是，实际上，吾人日常生活，几无不备受四种分限之包围和压迫。因此，假使有一不知命的人，不承认分限，甚至不知分限，或不注意分限，以为无论何事，我要如何便如何，可以达到目的。此种人勇气虽然很大，动辄行其开步走的主义，一往直前，可是，设使前边有一堵墙，拦住去路，人告诉他前面有墙，墙是走不过去的，而他悍然不顾，以为没有墙，我不信墙的限制，仍然前行。有时前面本是无墙，侥幸得以穿过，然已是可一不可再的成功，今既有墙，若是墙能任意穿行，自然很好，但墙实在是不能通过的东西，于是结果，他碰了墙，碰得头破脑裂，不得不回来，回来改变方向，仍是照这样碰墙，碰了几回之后，一经躺下，比任何软弱人还软弱，再无复起的希望。因他努力自信，总想超过他的希望，不想结果失望，自然一蹶不振。这种人的勇气，不能永久保持，一遇阻碍，必生厌倦，所以不知命——不信分限，专恃莽气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儒家知命的话，在《论语》中有很重要的一句，便是批评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一句。可见知其可为而为之——不知或不信分限，不是勇气；必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算勇气。明知山上有金矿动手去掘的人，那不算有勇；要明知不可为，而知道应该去做的人，才算伟大。这句话很可以表现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为知命与努力的注脚，“知其不可为”便是知命，“而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伟大和勇气，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我们的科学家，或是梦想他的能力可以征服自然界，能够制止地震，固不算真科学家；或是因为知遇地震无法防止，便不讲预防之法，听其自然，也非真科学家。我们的真科学家，必具有下列的精神，便是明知地震是无法控制的，也不作谬妄的大言，但也不流于消极，仍然尽心竭力去研究预防的方法，能够预防多少，便是多少，不因不能控制而自馁，也不因稍一预防而自夸，这种科学家才是真科学家，如我们所需要的。他们的预料，本来只在某一限度，限度之上就应当无效或失败，但他们知道应该做这种工作，仍是勤勉地去做着，尝试复尝试，不妨其多，结果如是失败，原不出其所料，万无失望的打击，幸而一二分的成功，于是他们便喜出望外了。知命之道，如此而已。

这种一二分的成功，为何可喜呢？因为世界的成功，都是比较的，无止境的。中国爱国的人，都想把国家弄得象欧美日本一样富强，好似欧美日本便是国家的极轨一样。谁知欧美日本，也不见得便算成功，国中正在有无穷的纷扰哩！犹如列子所语的愚公移山，他虽不能一手把很高的山移完，可是他的子孙能够继续着去工作，他及身虽只能见到移去一尺二尺，也是够愉快，

比起来未见分毫的移动，强得多了。成功犹如万万里的长道，一人的生命能力，可不能走完，然而走到中途，也胜也终身不走的哩！所以知命者，明知成功之不可必，了解分限之不可逃，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去努力，才是真能努力的人啊！

我们为何需要真正的努力，因为只有真正的努力，才可不厌不倦。人何以有厌倦，多因不知分限，希望过大，动遭失败，所以如此。知命的人，便无此弊。孔门学问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居之无倦”，“请益又曰无倦”，“自强不息”，“不怨天不尤人”诸端。所谓不厌，不倦，不息，不怨，不尤，都是不以前途阻碍而退馁，是消极的知命。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都是以稍有成功而自娱，是积极的努力。所以我们不止要排除尊己黜人的妄诞，也宜去美人恨己的忧伤，因这两者都于事实是无益的。我人徒见美国工人生活舒适，比中国资产阶级甚或过之，于是自怨自艾，于己之地位运动宁复有济。犹之豫湘人民，因罹兵灾，遽羡慕他省人民，又岂于事实有补。总之，生此环境，丁此时期，惟有勤勉乃身，委曲求全，其他夸诞怨艾之念，均不可存的。

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工夫，实在是知命和努力的一个大榜样。儒家弟子，受其感化的，代不乏人，如汉之诸葛亮，固知辅蜀讨曹之无功，然而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职志者，深明“汉贼不两立，皇室不偏安”之义，晓得应该如此做去，故不得不做，此由知命而进于努力者也。又如近代之胡林翼、曾国藩，固曾勋业彪炳，而读其遗书，则立言元不以安命为本，因二公饱经事故，阅历有得，故谆谆以安命为言，此由努力而进于知命者也。凡人能具此二者，则作事时较有把握，较能持久。其知命也，非为懒惰而知命，实因镇定而知命；其努力也，非为侥幸而努力，实为牺牲而努力。既为牺牲而努力，做事自然勇气百倍，既无厌倦，又有快乐了。所以我们要学孔子的发愤忘食，便是学他的努力；要学孔子的乐以忘忧，便是学他的知命。知命和努力，原来是不可分离的，互相为用的，再没有不相容的疑惑了。知命与努力，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民族的一大特色，向来伟大人物，无不如此。诸君持身涉世，如能领悟此一语的意义，做到此一层工夫，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 鲁迅

### 流氓与文学

——1933年就流氓与文学问题发表的演讲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是作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邦，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噫！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整日价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我们现在举一个例来说，比方有一个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儿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噫，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儿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语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田汉

学习·个性·用自己

——1947年1月在上海文化函授学院新年聚餐会上的演讲

今天想与各位谈三个问题。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从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廿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尽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来得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污辱我国女生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干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况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



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十四岁能写二十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六岁的天才儿童。即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杯的热望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而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一切无计划，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当然是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更可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这不仅是“用自己”，不仅是替自己创造机会，而且是对社会与人民的最大的贡献。山东的义丐武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只要我们确实有为人类服务的精神，确实有“用自己”以创造机会的精神，即有自用之机会。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创造歌》，大意谓：天天可是创造时，人人可是创造者，处处可是创造地，只要我们肯努力，不问顺利与困难，都可以创造自己，都可造福社会。只要有这样精神，即不致失败，不致自杀，盖可自用也。

归纳言之，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学习，发展个性，运用自己，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步，更应为争取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中华民国卅六年新年开始的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春天，希望我们的民族也能立刻有一个温暖的春天。

## 陶铸

### 理想和情操

——1960年5月对华南师范学院与暨南大学学生做的演讲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生活，另一个方面是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的问题。一个有崇高的理想、高尚情操的人，就会有充实的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反之，精神生活一定是异常低下和空虚。

物质生活，对每一个人说来，无疑都是需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吃饭怎么样活下去。从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他们对武王领导的伐纣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很有意见。武王伐纣成功后，改号曰周，他们更不满，跑到首阳山上躲起来，叫做“耻食周粟”；但是饿极了，还得要采点“薇”来吃。可见一个人完全没有物质生活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谈精神生活。就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也强调要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闹革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所要实现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想，并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离开物质专讲精神的理想。我们要使大地上都长满庄稼，使荒山野岭都种上果木，使山坑山坳都成为湖泊水库，使湖泊水库里都养上鱼，使所有的海滩都种上树林，变成为绿色长城，使沙漠上都种上葡萄、棉花，使每个人都能住上舒适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都能丰衣足食……这是共产主义的远景，也是我们的理想。这一理想决不是建立在什么“天国”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理想也决不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而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理想，难道不是物质生活么？不错，过去的统治阶级也强调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只强调他们本阶级的，只强调少数人的；他们过的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是榨取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我们却是要使得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能过着丰富的物质生活。

但是，当我们讲到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在物质生活充裕的时候，或是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精神生活对我们都是十分需要的。刚才已经说过，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在对我们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我们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意态昂扬，勇往直前，原因是什么呢？决不只是由于吃多少斤猪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资，即是说，我们前进的动力，不是像庸俗的唯物论者、“金钱万能”论者所了解的那样，片面强调什么“物质刺激”，而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大家都知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为什么要出走，她的出走并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她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了。她的丈夫新升了银行经理，虽然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度波折，但是只要娜拉愿

意，她还是可以照以前那样甚至比以前“更好”地过下去的。但是，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经过了这次波折，她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她发现她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玩偶而已。她发现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异常空虚的。她要摆脱这种生活，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出走了。娜拉的出走，为的是想追求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这种理想当然是模糊的）精神生活。《青春之歌》里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更为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她如果安心于做余永泽的妻子，也是可以过一过“小康之家”的生活的。但是，她不满足于此，她看不起余永泽那种唯我的、自私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她痛切地感到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因此，她才迫切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当她找到了党，党把她领到一条对她说来是崭新而又艰苦的道路上去的时候，她毫不留恋地抛弃掉她的“小康之家”的物质享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不怕险阻，长途跋涉，冒着被国民党、日本军队扣留、杀害的危险到延安去？原因不是别的，也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要过一种更充实的精神生活。当时有人形容自己才到延安的心情，说看到延安的塔影，好像在海洋里出现桅杆，到了延安，好像登上了革命的大船一样。这就是表现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说明他们对革命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比之从前，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空前地充实和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物质条件还很差，要完全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某些物质缺乏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放弃我们的理想，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坚持我们的理想，充实我们的革命的精神生活？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精神生活对我们说来，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由于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快地摆脱贫困，才可以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而出现的困难，从而我们就可以从积极方面去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有了它，我们每个人便能够懂得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对目前所遇到的某些物质上的困难就无所怨尤；因为有了它，我们就懂得不能只从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出发，更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就会自觉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就会保持朝气蓬勃、坚强饱满、勇往直前的革命气魄。所以我常想：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而有了充实的革命精神生活，就算物质生活差些，就算困难大些，也能忍受和克服。所以我又想：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反之，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这使我想起《儒林外史》里的一些人物，如严监生、周进、范进等。他们就是这一类人物。严监生死的时候，总是不断气，原来是为他跟前点的灯盏里有两根灯草，直到懂得他爱财如命的人替他挑去一根时，他才断了气；周进是个所谓“读书人”，他听到几个商人说愿拿钱给他“捐监”，竟爬到地下给他们磕头不止；范进也是个所谓“读书人”，他未中举前穷途潦倒，一中了举，竟喜欢得发了狂。这些人想的是升官发财，完全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真是低下得可悲亦复可怜了。

我最近到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去过，那里的工人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的工资并不高，物质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劲很大，新的产品不断产生，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解放以后，生活稳定而且不断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做工再不是给哪个资本家做的，他们成了自己工厂的主人；他们生产积累的钱也不是跑到哪个人的荷包里，而是用之于国家建设。因此他们有着非要尽快地把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不可的强烈愿望，要在摄影化学工业上为祖国争光，做到世界上有的，我们要有；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虽然提高得不算很快，但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对困难毫不在乎，对个人的利益全不计较。公元厂的工人们是有着高尚的情操与精神生活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也是有高尚的情操的人，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能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那我们就会不为物质所束缚，就会创造出一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古代有一个颜回，好学不倦，他很穷，但是他并不以为苦。所以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还要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具有为颜回所不可比拟的伟大的革命胸襟，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苦的时候，也是如此。同学们都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艰苦多少倍，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写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长征诗》，他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还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丰富、充实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任何困难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修建康藏公路的战士们有一句话：“高山为我们低头，河水为我们让路。”这种英雄豪迈的气概，值得同学们学习。我们不要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不要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 张志公

### 科学、艺术和武器

——1984年7月8日在演讲邀请赛闭幕式上的即席讲话

同志们，青年朋友们：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演讲家，因此我先要做个声明：我讲话不超过五分钟。

演讲是科学，演讲是艺术，演讲是武器。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演讲没有规律性吗？不能认识吗？不是的。它是有规律性的，所以说它是科学；演讲不仅诉诸人类逻辑思维，而且是诉诸人类形象思维，不仅要用道理说服人，还要用感情感染人，所以说它是艺术；演讲捍卫、宣传真理，驳斥谬误，所以说它是武器，而且是重要的武器……我不再多解释下去。我想说一个很不完整的名单，请同志们考虑。

我先说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卢梭、孟德斯鸠，美国发动、领导黑人解放运动、进行南北战争的林肯，宣布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当然，我们更要提到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杰出的演讲家。另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如伽里略、布鲁诺、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也都是杰出的演讲家。

再说我们中国：先秦时代的孔、孟、老、庄、荀，还有其他一些诸子百家（古代思想家），统统是杰出的演讲家。我们都知道秦朝李斯的辩才，我们也知道汉朝的学术性会议——白虎观会议、盐铁论会议，参加会议的那些个人都是杰出的演讲家。很遗憾，演讲活动在我们的历史上，停顿了一段，不重视演讲，忽视演讲。但是到了近代、现代，从唯心改良者梁启超（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大量的的是他的演讲词），到资产阶级革命家、新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文集》里大量的的是他的演讲词），及以后的五四运动那些个先驱者，我们党的革命的先驱者，“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那些个革命的前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那些个领导者，无一不是杰出的演讲家。所以我说演讲是科学、是艺术、是武器。诸位也许说：“你说的是历史，现代的例子呢？”那么，刚才李燕杰的演讲有没有科学？有没有艺术？他为什么能够使这样一个广大会场的同志全部聚精会神地听他演讲，不时地以热烈的掌声去赞扬他的讲话。难道其中没有科学吗？没有规律吗？没有艺术吗？仅仅是因为李燕杰同志样子长的漂亮吗？我想不是的，而是有科学、有艺术的。他今天宣传了什么啦？驳斥了什么啦？坚定了我们什么信心啦？给了我们什么力量啦？这不是武器吗？也许诸位又说了：“我们不就有那么一个李燕杰吗？”不，我们已经有了，而且将要有更多更多、千千万万个李燕杰。

我们这次演讲邀请赛，一共进行了两个上午一个下午，我从头至尾听了。这些小演讲家，都是李燕杰。（热烈的掌声）

我们这次邀请赛的中心主题是“党在我心中”。这些小李燕杰们用非常有说服力的、动人的语言，使我们听者感觉到党在我们心中。他们讲得很具体、很生动，对于那些少数玷污党的形象的人，对于那些少数企图动摇党的

信心的人，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我们的党过去是、现在是、今后还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他们讲了改革；他们讲了一些青年朋友遭遇过某些不幸，遭遇过某些困难，走了某些坎坷的道路，甚至到目前还面临某些困难，但是他们说，应当正确地对待；他们讲了如何学习革命前辈，跟上去，走开新局面的道路，等等。说到这个地方，我很想改变一下子称呼，但又担心有倚老卖老之嫌，可是感情使我不能顾及这个责备，我把“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改称“可爱的孩子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小李燕杰们和这位半老李燕杰，共同向全市、全国证明了演讲是科学、是艺术、是武器，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是我们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需要，是迎接2000年的需要，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需要，回答了对演讲学有所怀疑的同志指出的一些疑问。因此，我感觉到这次活动意义非常重大。从而我就想到在吉林市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演讲与口才》这样的刊物，进行演讲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得到我们省、市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也表明我们这里的领导有远见有胆识，来支持这次活动，支持这项工作。我滥竽充数，做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支持这项社会工作。我们对这里的领导，对这里辛勤工作的同志表示敬意、表示感谢。（热烈鼓掌）

等一会儿，我们这里的领导要向这次演讲优胜获奖的同志发奖，用行动表示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热烈鼓掌）。最后我祝愿这项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演讲之学，把演讲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更好地向全国开展起来，以至于向世界开展起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

巴金

## 核时代的文学

——1984年5月在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

主席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作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溶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死亡人数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我们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还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

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支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支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象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绝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绝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



步服务。只有和平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漓”的报道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一九三五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六十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高尔基、肖伯纳、H·G·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

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支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钱学森

### 思维科学的未来

——1984年8月在全国第一届思维科学学术研讨上的演讲

现在，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思维科学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作什么贡献？

这个问题涉及到前几天我们在这儿召开的一个会：“第五代计算机专家讨论会”。日本人在前几年提出来搞第五代计算机，说它那个第五代计算机比起现有的电子计算机有许多突破，比如说，包括图象信息处理系统，就是计算机能够认识图象。还有一个知识信息处理系统，那就是知识库里的东西，机器都能利用。再一个就是专家系统，最后是把这些东西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并与逻辑计算结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这么一个体系要是能够做出来，那就不叫计算机了，它比计算机要广阔多了，我以为可以叫智能机。因为计算机，就是算么，充其量就是把上升到科学的那一部分知识利用起来，前科学的、经验的那一部分没办法算，那不是个推理的问题，是形象（直感）思维的问题。

前面我讲了，图象处理系统里有经验的成分，经验也是知识。所以知识要比科学的范围广得多。专家系统更是这样。专家系统就是专家的经验，比如说，有了一、二、三，就有九。你问他怎么有了一、二、三，就有九了呢？他说不清楚，反正你记住，有一、有二、有三，就有九。这就是一定范围内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现代科学。这样的经验存储在库里，如果把这些专家系统都纳入系统里，再加上知识库，那么这系统所处理的问题，就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把人的实践经验都纳入进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计算机了，而是把人的知识充分利用起来了。在美国，这叫作知识工程。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全部精神财富，我们现在要用一个机器把它利用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头一台智能机就能做到这样。但是最后要能做到这样，那就是很大的成就。

我们现在要分析一下，日本人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里新的因素就是想办法把人的经验纳入到这个系统中去。人的说话，人的认字，都有经验的因素。这就联系到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比抽象（逻辑）思维更广泛，逻辑思维只是解决科学问题，形象思维是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这是智能机的问题。

当今人类的精神财富的量是极大的，我们现在的困难就是不能很好地利用它。过去我们的老办法是去学习，或者请教，这个办法太落后了。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可能知道，没法知道，也来不及知道。以前古人就说，读书靠记嘛，一个人活到老，读书到老，记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多，“皓首穷经”。那是说头发都白了，还在那儿念书，没完没了的。现在有办法了，不记也没关系，可以通过现代的电子设备，供你调用。怎么是小事情？

当我们讨论，建立了现代化情报科学技术、图书馆文献和档案信息体系之后，让我们想一想，这将是多大的变化。向来一个人自一生下来，都得用脑子记住以前人类和自己社会实践经验产生的知识，对于一个脑力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古人夸一个学者，说他博闻强记，可见脑子里记住学问的重

要性。每个人记得住的东西虽然不同，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但总是有限的。比起人类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前人也说皓首穷经。在将来，我们将从这样一个繁重的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查阅资料可以做到如同自己脑子里记得它一样方便，那就不要去费脑子记了。用计算机的终端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再深思一步，什么是情报资料、图书馆文献档案，它包括不包括文字？当然包括。它包括不包括绘画？包括。它包括不包括音乐、乐谱、录音、录像等等？当然也包括。而且包括文物档案，甚至通过全息摄影，它可以包括造型美术，如雕塑等等。那么，我们所设计的信息体系简直可以包括全部人类千百年所创造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的精神财富。这全部的精神财富又可以由我们一个人随手调用和享受。这不仅能把我们从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一个从来没有的高度文化的新世界。这难道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脑子不要化在记忆上了，那脑子还干什么？从繁重记忆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将有可能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汇贯通，从而搞更多的更高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人将变得更聪明，人类的前进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刚才讲的这些说明，如果不搞智能机，那么我们将会被人类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所压垮。如果搞，那么大量的精神财富就可以为人们所利用，大大提高人的智力。

看起来这个问题涉及到形象思维，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我们还会进一步解决灵感思维的问题。现在可说，这个方面的研究有个门儿了。就是通过智能机，就是专家系统，因为无论是图象信息处理系统，还是知识信息处理系统，实际都是像专家系统这样的东西，就是把经验、知识利用起来嘛，而专家系统的概念过去在人工智能里已经用了，并逐步在发展。我们国家现在有许多同志在做这个工作，比如中医看病，已经进入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一个专家系统。所以专家系统这个东西并不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一步提高，把不同的专家、不同的经验，统统结合起来，通盘地利用。智能机搞出来也许还是初级的，但它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也非常重要。将来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做下去，最终总可以做到把人类的精神财富全部调动利用起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任务就跟我们思维科学有密切关系。思维科学也要通过这项任务向前发展，比如解决形象思维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思维科学工作者就面临着怎样参加第一代智能机的工作，怎么为中国第一代智能机作出贡献的问题。在我们思维科学界，能不能组织一支力量，为中国的第一代智能机作出贡献？

形象（直感）思维是我们思维科学现在要突破的，而且由于智能机的研制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突破形象思维也是一个压力。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隐隐约约的。中国古话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能言传的都是讲得清楚的问题，而形象（直感）思维现在没法讲清楚。如果将来我们说能讲清楚了，哪怕只讲清楚了一点儿也不是小事，我想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科学革命。所以我说，思维科学的研究将孕育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思维科学的研究又会推动智能机的发展，把人的知识、智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肯定又将是一场技术革命。

## 宋教仁

### 回顾广州起义，总结失败原因

——1912年5月在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最初，同志计划进行方法各有不同。或主中央人手，如法、葡是，但在我国颇不易为；或主从地方人手，各处同时大举，是亦恐难以做到；最后决定从边远入手。故从前云、贵、广西诸义举，即缘此义而起，因复有去岁广州一役。

先是，黄克强、赵伯先等，立实行机关于香港，内分数部，或掌运输，或主联络，或谋通财与执文牒，谋甚秘密。孙中山先生、黄君克强先后到南洋美洲一带，募军饷四十余万，兼购最利枪枝。广州举义时，枪未运到，而各处同志来者益众，形迹颇露，卫队及警兵渐相缉探，遂决用手枪炸弹。黄君先人。原拟黄自攻督署，而以赵君攻水师营，其余分三支：一攻旗军；一守南门；一迎新军。入城事成后，则以赵君出江西，黄君入湖南，再分道各省，鼓动响应。此部署大概也。二十六日，机关部得黄电，言事泄矣，请改期二十七日。又得黄电，催众往，遂于二十八日出发，到者仅一部分人，而事已一发难收矣。二十九日余始到，业知失败，未容展我手眼，爰探得举事时，黄君初以事泄，欲解散，多数人反对，遂仓猝举发。黄君所带无百人，又大半留学生，未习战伐。攻督署时，击死卫队甚多，同志死者亦不少。继而黄君直入后堂，见不惟无人，并器具亦无之，乃知张鸣岐得信最早，已携眷潜逃，因率队外出。而各处陆军坌集，黄又击毙数人，而我之队伍已被陆军冲散，黄乃易服出城。其余未出城者，喋血巷战，到死气不馁。黄只身逃至一买卖铺中，伏数日始脱于难。至初四日，入城调查，死尸计七十二人。黄虽未死，受伤颇剧，余则或伤或逃，尤不可胜纪。噫，亦惨矣！

计此事失败原因有三：一、侦探李某充运军火，为平日党中最得力人，不知实乃侦探，后查明，处以死刑，枪毙之香港；二、从戎者皆文弱书生，素无武力；三、起事仓猝，新军未能响应，诸同志亦多奔赴不及。有此三原因，所以失败。

但平心思之，此事究不得以为失败，盖失败一时而收效甚远也。何则？有此一番变动，遂生出三种观念：一、此番死难诸人，如此猛烈，可使一般人知同盟会非徒空谈，实有牺牲性命的精神；二、此番死义，多属青年，易激起人痛惜之心，而生倾向革命之热诚；三、政府对于此举毫无悔心，人愈恨旧政府而争欲推翻之。有此种种，故武昌一起，天下从风，岂偶然哉？虽谓诸烈士已成有圆满无上之功，未为不可也。愿诸君作事勿看眼前成败，要看后来结果，最远之成败，天下事无不可为矣云云。

## 孙中山

### 坚忍冒险，发愤图强

——1912年10月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去年今日，为武昌举义之日，即中华民国开始之第一日。其时余在美国，同志居正君有电达香港黄克强先生，托余筹款助饷。余阅电文，知革命军已得武昌，不胜欣喜。从前在广州、惠州、河口等处革命事业，种种失败，皆因同志过少，未达目的。自广州失败后，乃运动武昌军界，一举而成此大事。所以然者，国民有坚忍心，武昌军界有冒险心，无畏难心之效力。但民国虽成立，而今尚在危险时代，内乱未靖，外患顿闻。譬之建造大厦，基础已定，尚待建筑。愿吾同胞，自今以后，亦须有冒险心、坚忍心，协力赞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头等大国，是鄙人深望于诸君者也。

吾国向来闭塞门户，不与外人往来。暨后中外通商，愚民又常行排外主义。继见彼海、陆军之优，器械之精，转而生畏惧心。然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要知凡事须论公理，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惧心。前年英、脱开衅，英有精兵四十万，甲于环球，而脱之全国人数，亦不过四十万，且军士皆以农夫充之。英国何难一举而灭脱，而所以不能即胜者，因脱人有合力坚忍无畏之心，而能恃公理以敌强权也。嗣后各大国渐知强权不敌公理，遂不敢侮慢小国，故地球上各小邦，尚能久立而不亡。

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满人入关后，愈形衰弱，渐渐召列强之侮。近数年间，留学外洋者日多，初则见彼国种种景物，顿生乐观之念。继见彼种种较吾国为强，乃生悲观之念，甚至悔心废学，以求一死者有之。但处于今日，不当有悲观之念，务须坚忍冒险，发愤求进。即士、农、工、商，见吾挤能忍受如此，亦必愤志图强。如是，则中国前途大有冀望。故“畏惧”两字，自今日起，消灭无有，从兹专心一致，合力以助新造之民国。今年今日，为去年今日举行纪念。愿时年今日，全球各国为吾中国举行纪念。

宋教仁

## 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1912年10月在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今日为中华革命第一次纪念会之第一日，承诸君推鄙人才薄重任，深恐不能胜任。

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革命思想为我中华民族心理中所固有，惟其发动在十年以前，先由中山先生之于广东，次由克强先生与鄙人之于湖南，然皆遭失败，于是于东京发起同盟会，创《民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数年以来，继继绳绳，盖如一日，故能使今日思想普及全国，一举手而成共和之大业。然当发动之初，亦曾几遭失败，后竟苦心研究，规定计划三条：第一由中央入手，即于政府所在地从事运动；第二由南方重要省会入手，即于扬子江流域各重要地点，联络军警各界，各省同时大举；第三由边地入手，盖边地为人所不注意处，从事革命，布置较易，由渐而来，未为不可。三条之中，第一条最难，第三条最易，故实行之始，取其易者，此去年广州一役所由来也。

按广州之役，自革命以来，实为最可痛心。死亡诸君皆革命原动，所以如此者，以屡次革命，利用军队，而军队中人屡次泄漏消息，屡遭失败，故此次不复再用军队，当事者尽为文弱书生，革命原动。先时计划定四月初一为起事之期，于香港先设立机关，更由中山先生筹得经费四十万。其内部组织推克强先生为总理，赵声、姚雨平、鄙人等诸同志佐之，更合四川、福建、安徽、江浙诸省精锐，拟一举而下广州。自正月间先事预备，购枪械，招同志，运器具，其种种困难情形，不可言喻；香港英政府亦防范甚严。其后有同志喻云纪君，能自造炸弹，且远出外国之上，故全军供用率多仰给。于是更有姚君雨平先往省城，预为布置一切。即定约期四月一号起事，岂知至三月二十七，忽由克强先生来电，劝同志不必再来，并改期重举。鄙人等在香港，闻之深为骇异。次日克强先生又来电，促诸同志速赴广州，于是诸同志之在香港者，连夜出发。当时共分数起，有自早出发者，亦有过后一二时出发者。鄙人则在下午离港，迄次晨抵广州，探悉城门已闭，岸上守兵无数，则知事已败，心中甚为焦愤。后探悉同志死者甚少，心为稍慰。晚更悉惟有一船自广州出发，于是偕数同志同至该舟。比至，则满舟皆同志，然相见均默不发一言。其后守兵更来舟中搜寻同志之军藏暗器者，俱为捕去，救援不及，饮注而已。诸同志既由虎口索生，遂各述所遇，始悉当时以赵君声未至，总司令由克强先生代摄，一切计划遂不克周顾。当时由克强先生率诸同志攻总督衙门，先时闻该处守兵已经说通，岂知至则出而抵拒。时同志出为陈说，然卒无效，遂两相攻击，一方更由克强先生率数同志，直入上房粤督。詎料粤督已数日前闻信移住他处，同志等遂出。时水巡兵已遍满街市，同志多自戕，能于此船上相见而庆更生者，已非初料之所及矣。是役也，有可痛之一事，即失败之后一日，城中有一米店，匿数同志，为捕兵侦知，攻击数时，兵不敢近，后官兵将米店付之一炬，诸同志遂无一得生。此广州失败之大略情形也。

吾等计划第三箸既归失败，于是进一步策第二箸，规划湖北，更由陈君英士组织机关于上海，鄙人则从事湖南。时陕西亦有同志已组织完善：特派代表来会，协商一切，遂定乘四川铁路风潮激烈之秋，一举起义，规定湖北。时机部设在汉口，相期以九月一号起义，詎知迄八月十九而机谋又泄，于是匆匆起事，一举而光复武昌，再举而复汉阳、汉口。克强先生更由香港赶至湖北，与清军血战。时则陈君英士光复上海，程君雪楼反正苏州。九月十八，南京第九镇统制徐君固卿攻击石城，不利，更进而合江浙省之各师联军，推徐君为联军总司令，于是再攻南京，张勋败走。时停战之约既成，议和之师南下，后更得北方响应，诸将要求退位，共和之诏遂颁，民国于以成立。

溯武昌起义以来，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岂非我五族同胞倾向共和，赞成民主之所致欤？夫吾等计划，前后计划均未实行，而其最后效果，竟得于一年之间达到目的，视美之十三年，法之三年革命，不亦较胜十倍？则将来大势所趋，三年五年之后，其所得效果，有不能驾欧摯美者，吾不信也。



李大钊

## 图书馆与中国教育

——1919年12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今天是贵校园图书馆二周年纪念日，兄弟得参与盛会，觉得非常荣幸。我今天虽然谈到图书馆教育的事情，可是教育是诸位专门的学业。我对于教育没有特别研究，所以说的，或则是很肤浅。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

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我对于图书馆没有什么研究，不过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的事情，所以谈一谈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洋，都是很久。老子曾经当过柱下史，这就是现在管理图书馆的人。可是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动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所以现在图书馆主张复本增加，就是主要的书不仅只一本，而备了许多本。美国某大学设了助教制度，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现在添了许多助教，这班助教不必上讲堂授课，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因是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图书馆的复本不能不增加。

旧图书馆采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拿书，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来的不合用，又要按从前手续去换。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多主张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英国有安全开架式，比较稍好一点。此外，又因为开架式发生目录的问题。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就是以书名的 A、B、C、D 排列，这种目录很宜于文库式，因为可以使管理的人便利。但是开架式的目录宜于分类，就是依书籍的性质去分别。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式，那就太不方便了。

以上说的两层：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前是开架式，不过设备很不完全。后来移到一座新地

点，这地点本来是作学生寄宿舍的，所以房子很小，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近来没有法子，只得拿小的房子当文库，大的当阅览室，把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从前敝校想移到西山去，恐怕不能成为事实。所以现在想法子废去文库式，采用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读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现在打算从明年起，无论谁都不许借书，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我个人的希望，觉得贵校是最相宜的。从前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后来因经济不够，所以不办。它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是它在城外，也有许多的不便利，所以我仍是希望贵校举行。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

## 李大钊

### 青年的责任

——1922年9月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说

今日与诸君讨论的是“青年问题”。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现在社会的组织，犹是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老年人所有的精神是保守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国有这两种人在社会，所以一方面能保存固有的状态，一方面能发展未来的文明。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么“人”的未来事实，完全为我们青年的责任。进一句话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近几年来政治所以弄得这般糟，是由我们青年着了旧时的观念，不喜过问。所以政治上都让一班无头脑的老人去干，让那些武人军阀去玩弄。总之，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求从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须由我们团结起来奋斗。五四运动是因外交问题激起的。但此次青年运动的结果，社会上受影响很不小。所以我们要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似的团结起来，促进民主主义，要有步骤的进行。民国以来做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算是一个完全的政党。现在还有更和我们有关关系的团体运动，如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都是民主主义的纯粹运动。

几年来战争不已。而每次战争的结果，何尝不是影响于我们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此后对于政治，决不可再有默视的态度。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我们的仇敌。

## 邓颖超

### 死友给我的教训

——1924年1月在天津女师追悼会上的演讲

（前略）我们从伊俩的死，得到几个很好的教训。第一我们要会用感情，人是有情性的，也是有理性的。但感情的冲动往往是盲目的，所以我们要拿理情去支配它，不要受了它的支配。换句话讲便是我们要用它，要会用它，不要被它所用。如果我们会用感情，它能够使我们快乐，使我们向上，使我们的事业完成。如不会用，而反被它支配，那么我们便要陷入不适宜的生活，而感痛苦，甚或至于酿成疾病，人格堕落，遗恨终身。由此看来，我们当感情冲动的时候，总要经过理智的推敲，然后再用。同时也要看环境的情形。如果对于某件事，或某一人，要放出感情的时候，总要经过理智熏陶，看看这个人或一件事，能不能容纳我的感情。放出去与我与人与事，还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如果有益的，便不成问题；如果有害的，便要赶快的收回来。如能发能收，才是理智胜于感情的人。陈君就是能放感情而不能收感情的人。因为不能收感情，才陷到痛苦，因痛苦而得病。从别一方面说，友爱是普通的，不是专一的。如果甲和乙发生友谊，乙和丙、或丁等发生友谊，而彼此互相融洽，这才叫友爱。如果甲乙丙等不相融洽，换一句话说，便是不容第三者参入，这就不叫广义的友谊而叫着狭义的友谊了。狭义的友爱的害处是很大的，对个人的学业、精神、身体各方面，都要受不良的影响，甚或有损前途的事业和幸福。

我们不但要会用感情，而且要会死，我们来到人间数十寒暑，转瞬便要过去。死的关键是人所不免的，但是死有重若泰山，有轻如鸿毛。重若泰山之死，小可以影响那个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大可以影响于后世。陈李两君之死，我不敢说是重若泰山，但很可以做我们前车之鉴。我们念到伊们身世和致死之由。终要令我们感到怅惘。人们要会死，便是我们得到的第二条教训。

我们不但要会死，更得要会活着，要想死得当，必先要会活。会活的第一步，就是每人确定人生观，如果没确定人生观的人，他的生活，可以说是盲目的，是很危险。倘若他的环境偶有变迁，恐怕他的情感意志就要随之转移了。人生观确定了以后，便本着自己的人生向前去努力，如果研究学术，服务社会或者是服务家庭是你人生观的一部或全部的时候，那么为着实现你的人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痛苦，都要忍耐着。因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人格而得来的痛苦，我们应认它为兴奋剂，而要加努力才对，如果要遇到不能忍受的痛苦和压迫的时候，那么我们积极的便要和他奋斗；消极的，也要将它摆脱开。李君和陈君，因为不能跳出伊们的环境，以至今日演出悲哀的一幕，如李君因他的父亲死去，感到环境的孤凄，遂终日悲郁，以至抱憾而死，忘记了他的责任，重大的责任，倘若死而有灵，岂不更要痛苦了么。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不是悲哀所能解决的。

我们一个人，不管别人对我有希望与否，我们自己对自己总要有重大的希望，本着自己的重大的希望而向前努力，要战胜一切烦闷痛苦，始终如一的向前进行。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阻碍，消磨了我们的志气，做那没效果的

牺牲。总而言之，要抱定人生观去做，才可免去危险！

我两三年来，在我已确定的人生进程中，虽然是终日忙忙碌碌，引不起多数人们的同情，未做出一点成绩。甚或有时，还要遇见一些阻碍和痛苦，但是我总是感到愉快的。因为我所做的，是我愿做的，是为我实现我的人生而做的。

所以我很恳切的希望，今天到会的诸君，都要紧紧的记住我们所得的教训，努力去为生，才不负今天的追悼会。

最后，我要拿极痛切的心，向陈李两君之灵，表我的哀忱！

## 李大钊

###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1924年2月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联合举行集会时的演讲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地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向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廖仲恺

## 解放思想，为民主共和而奋斗

——1924年4月在史坚如烈士石像揭幕仪式上的演讲

教职员先生、同学诸君：今日贵校为史坚如烈士石像开幕纪念会，并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史坚如先生当时之就义。时间与事实虽有不同的地方，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均为我民国开国先驱，为民国革命中的Pioneer。先行探险，大刀阔斧，以辟开这一条荆棘道，而中华民国以成。当时的荆棘在满清的君主，腐败的官僚，而茅塞实存于思想之中。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先打开这一条新路，于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才有空间容得中华民国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之诞生，实比较数十万军队的势力还为难能可贵。

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实处在满清淫威宰制、重重压迫之下。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完全与现在不同。当时的社会制裁，与当时思想界对于先烈这种运动，均发生极大的反抗和无穷的压迫。我们知道史坚如就义之日，比七十二烈士先几年，史坚如先生之发难，实欲响应当时惠州诸同志之起义。惠州之发难，因革命同志知北方有“拳匪”之难，故相呼应。我国对于庚子之役，实多未明其重要意义。“拳匪”二字实为失词。从历史眼光观之，当时中国，实多在风雨飘摇之中。瓜分之祸，时时可以实现，就因为中国人民全无抵抗能力之表现。庚子发难，虽为仇外，而中华民族民心未死，强悍之气犹未泯息。列强不敢谓秦无人，瓜分中国之念，乃不敢发生。此非我个人之私言，英人 Sir Robert Hart 也曾说过：“庚子之役既起，瓜分必不能做。虽能做到，亦属无益。”此完全是事实证明。此实 1901 年《评论之评论》所载的言论。由此可知庚子之役之重要，而“拳匪”二字定为轻蔑不庄之词。但当时北方既有刺激人民之猛烈剂；南方同时亦有唤醒国魂的行动。所以惠州同时起义，而史坚如先生所以响应于广州。

当时惠州之役，史坚如先生之就义，均为中华民国奋斗。形式虽有不同，举动虽有差别。然以当时眼光观之，均为大逆不道之行。当时社会情形，对于革命事业，不同今天行开幕礼时诸君赞助之诚，社会欢迎之切。当时不特无人赞助，无人欢迎，史烈士就义后，家族认他为不肖之子，朋友认他为不忠之人。此等举动，他们以为非天下之至愚，断不如此轻举妄动。到现在民国成立已是十三年，我们才有恭恭敬敬的开幕礼。由后人看起来，真真是其智不可及，其愚不可及。史坚如烈士之不可及处，乃在认他为愚，他实在不愚，他实在是一个大智。我们应在大智之下，低首下心，以他为模范。

我们对于烈士的事迹，很容易误会的，就以为怀手枪带炸弹的人，都是

---

意为拓荒者或先驱者。

指义和团运动，是反动派对义和团的污蔑，廖仲恺先生这是借用。

惠州起义又谓“庚子惠州之役”，故称。

指中国。

译音为司赫德，曾把持中国海关的总税务。

因惠州之役是民众举行起义，史坚如是被秘密刺杀。

暴徒。不知史烈士不是一个腰大十围，犷目撩牙，不守规律的荡子。他生在俗说所谓“书香之家”，史家里的进士、翰林、举人都有。实生在钟鼎荣华之家，是一个膏粱文绣的子弟。他家庭是受满清的殊恩，但他能决然舍去，抛弃纨绔之习，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想惠州革命成功，乃自己先作牺牲，以达团体所想达的目的。这种舍己为人的态度，虽在今古号称文明的国家，他这为人牺牲的人格，在人类中，实在无时不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若把社会分几个阶级，我们可以分为三层：一为先知先觉，二为后知知觉，三为不知不觉。先知先觉之人，乃不世出之奇才。不知不觉的人，亦在民族中占很少的数量，故国家不靠这两种人。先知先觉的人或五百年而诞生，或一千年而始有，遭遇不常，偶然不适，岂非落空。不知不觉，蠢如鹿豕，亦非国家社会之中心分子。故国家所依靠的，乃靠着第二流后知后觉之徒。先知先觉为开山祖，开始发难。继续做去，实在靠后知后觉之人。比如军队里有人打了先锋，但打先锋之人，完全要靠四面埋伏着的人来响应。苟有一人打了先锋，而四面埋伏不起，则打先锋的人落空了。我们同志，自乙未之役起，以至史坚如先生惠州之役，黄花岗之役，均已一重重的打开血路，斩除荆棘。现在先知先觉已做了开始的事业，故我们后知后觉应当继续向前，步武先烈。如果我们只记着享福，一切事业都做不去，故当先有一种愚拙的心肠，诚恳的态度，去做世界的事业；享福与不享福，都不必问了。

现在岭南诸同学，你们已有前辈在此（史坚如在岭南读过书）。先辈非有特殊的生长，不过能打胜环境。史烈士虽然生长在钟鼎荣华之家，食膏粱而衣文绣；但他乃有这副大精神去做救国的事业。史坚如先生虽已成为历史上的伟人，我们应该以他的精神为模范。

今天仲恺来代表孙大元帅 出席，所贡献于诸君仅此。望诸君勿忘！

---

指 1895 年（乙未年）兴中会在广州举行的起义，后未成。

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被选为大元帅。



何香凝

## 打倒帝国主义，谋求民国自由独立

——1925年9月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上的演说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各位来此追悼廖先生，我实在很感激。希望各位追悼廖先生的死，更要追悼廖先生的精神，追悼廖先生奋斗和刻苦。廖先生之死为什么缘故而死？是为着中国争自由而死。试问今日中国的民族得着自由么？得着平等么？廖先生为着这个问题，就要尽其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同时就要牺牲他的血去换中国民族自由。

廖先生为国民革命而死。为何要国民革命？是因受着帝国主义以不平等对待，故联合起全民反抗这不平等待遇，以达平等自由的目的。廖先生自从打倒刘、杨以后，就要统一军政财政，因广东人民连年受种种苛捐杂税痛苦，都是军政财政不统一的缘故。廖先生既主张实行军财两政统一，军阀和无聊政客污吏奸官，见失了他们利益，所以设法来暗杀廖先生。我们要知廖先生遭暗杀，显然是一班凶手和反动派，还有帝国主义在后面指挥。反动派是私仇，进一步还有国仇帝国主义者，我们不只单记反动派杀廖先生，别忘记帝国主义者所嗾使。岳武穆有言：“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廖先生生前虽未有十分伟大功绩，但不要钱，不怕死，可以对得起国民的。甚希望国民服膺岳武穆之言，实力做法，挽救中国危亡。

廖先生未死前数天，我曾将有人欲行刺他对他说。廖先生冷笑着说：“我一生没有负党、负国、负人，只尽力为民众谋利益，何畏人仇。且此国家多难之秋，即死何惧。”诸君，我们是中国人，眼见为中国争自由平等的奋斗者牺牲了，各位有什么感想呢？中华民国之立于世界，由孙总理一生努力百折不挠和先烈流了许多热血，拼掷了许多头颅，换取得来。但是我国天天被帝国主义压迫，只税关问题、机器生产，已偷了我不少金钱，致民穷财尽，谋生无路；甚而人民生命也要偷去，如上海、汉口、九江、沙基，偷去了许多人命。试思先烈舍去以谋国家强盛，现在国家弄到如此，我们有何感想呢！在下等动物如狗，受主人豢养，尚且尽力为主人守门口，有盗其主人之物，必起奋力斗之。现在帝国主义者，偷去我金钱、人命，进而想偷中国了，人民赖国家以生存，现在国家处于岌岌之势，国民不努力奋斗吗！

廖先生为着国家人民谋利益，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遂做出共产谣言来破坏，致有人说廖先生是共产党。我有一次问廖先生，人说你是共产党，是何缘故呢？廖先生说：“梦话！中国决不能共产，因谓中国产业落后，无大资本家、大地主，拿第一公园来共吗？至谓扶植农工阶级和联合弱小民族，便是共产更属笑话。我们接受孙总理遗嘱，欲达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须唤醒民众。现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直接间接压迫，欲打倒压迫阶级，必须联合全民。我国农工占人口十分之九，农工阶级受经济压迫，无路谋生，他一天做十数小时的工夫，且不得两餐饱食，何有余力教育子女呢？全国国民十之九无受教育机会，知识当然落后，国何能强？若要中国强，必须提高农工地位，引导他有政治知识，方有希望。且农工俱为我同胞，当有互助义务。农夫耕田，秋寒盛暑，风雨飘摇之时，辛苦做工，每日充饥者不

过薯芋，以谷米供给他人；养蚕缫丝者，只穿布衣；建造工人，仅住棚厂。农工辛苦供给我们衣食住，饮水思源，我们不当助他吗？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观廖先生一段话，可知廖先生决非共产党，只扶植农工以救中国危亡，诸君，今日来追悼廖先生，最要继续如廖先生之奋斗精神，竟廖先生未竟之志。以打一切帝国主义，以谋中华民国自由平等独立。

## 李大钊

### 列宁主义与中山主义

——1926年1月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列宁先生已去世二年了！他的死是世界的大损失，而且他给了我们很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追悼他，就回想到我们的中山先生。前两年我们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的噩耗传到广东，先生亲自出席大会来报告这不幸的消息，曾经有很沉痛的演说，使得到会的同志都有感动，都不能忘。去年今日，我们的中山先生便呻吟在床蓐之上，我们那时抽工夫来纪念列宁，而我们的领袖也就没有希望不能把他的抱负发展了！所以我们同时感觉列宁的死是个损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们的损失，二年以来，国民革命的局势如何紧迫，而两次死去我们的领袖，损失何等的重大，我们的责任更如何的重大！我们所以不能不联想到中山先生，而感觉自己的责任更应该努力！

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就可以比较的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者，他们往往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假使中山先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使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他们主义表面看起来不同，实在是他们环境的不同。中山先生与列宁的目的相同，可是惜乎环境不让他实现得如列宁那样成功！他最初想联合菲列滨，先帮助他们革命成功，再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最初有日本的革命党人。这都是他主张联合世界革命的表现，与列宁的主张相同。他们主张以党治国，列宁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党治国，中山主张以国民党。党的制度是集权，两两相同。何以列宁能够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出他主义的成功，而中山先生不能呢，这全是环境的不同，我们的经济落后。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

前年广州大会追悼列宁，中山先生演说，非常沉痛。他说：“列宁死了，俄国决不危险，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很完密坚固的组织。假使我死了，你们看中国如何？我们的党如何？”我们听了非常悲伤。他当时的遗言，现在如何？他那时就教我们好好组织，就把革命责任交给了我们！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他的主义，我相信现在还没有把光华发扬得出来，将来全世界的革命成功，才是中山主义的胜利！我们哪里好分出什么此疆彼界来，谁是中山主义者，谁是列

宁主义者？现在无论列宁主义者或中山主义者都不应该两下分离！等到中山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了！在坐的同志们，你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

叶圣陶

欺人的与被人欺的

——1926年3月在追悼北京死伤同胞时的讲话

我想见你们激昂而又悲愤的面容，我想见他们高亢而带辛酸的呼号，我想见你们各含着一腔不平的气，我想见你们各怀着一颗纯赤的心。我又想见奴隶的奴隶狠毒地抬起枪支来，我又想见那些枪支里射出无论如何总归是罪恶的子弹。啊！不堪再想，但是又怎能不想。我想见你们震怒地跌倒了，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我想见鲜红的血淌在你们身旁，还在突突地沸腾。我想见你们的眼睛大大地睁着，还是怒对着仇人。我唯有十二分地悲悼，十二分地虔敬，来对待这严重的惨酷的新闻！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你们遭到枪击而死而伤，难道单只是你们的命运么？我知道，凡是要这个民族，要这个国家的，对于奴隶们的措施一定会反对。开一个会，聚起许多人来游行，正是反对的初步表示，可谓平常之至，当然之至。但是他们丧了心，昏了头，就会叫他们的奴隶开枪！那么，我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我的邻居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的邻居；全国的非奴隶们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全国的非奴隶们。你们的死伤，是代表这么多的人吃苦受辱；对于你们，固然十二分地悲悼，但是可悲悼的仅止于你们的死伤么？他们开枪，表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敌对这么多的人；杀伤你们，固然十二分地可恨，但是可恨的仅止于杀伤你们么？

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类人，欺人的与被人欺的。缩小范围来看，这个国度里也清清楚楚认得出这两类人的界线。命令放枪，赞同放枪这件事的，乃至微微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快意的，自然都是“欺人的”。他们有顽固的头脑，有卑劣的贪欲；他们不要这个民族，不惜让它衰微，他们不要这个国家，愿意促它灭亡；同时他们是别人的奴隶。你们死了的，伤了的，我的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以及我，不用讳言自然都是“被人欺的”。但是我们有深刻的悲悯，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这个民族，希望它会壮健，我们要这个国家，相信它会永存；我们始终不肯做别人的奴隶。只有两类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决没有徘徊于两类之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的枪声就像归队的信号。在我们这边的，已经听见信号而且嗅到我们的代表的血腥了，赶快集合起来吧！

我们再不用多说废话了。要是责备他们不该放枪，说他们没有道理，我就认为这个意思不必说。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当然我们也是他们的仇人，仇人相见还该让座献茶么？唯有放枪才是他们的正经事，他们的道理。我们只消问自己：仇人当前，情势严重，如何才是我们眼前的正经事，我们应当尽的道理？

北京死伤的同胞们，我听见了你们的惨酷的消息，悲悼地虔敬地作如是想。

## 陈独秀

### 敬告铁路之友

——1927年2月在“二七”纪念日集会时的讲话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二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画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人的内容；没有司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三、肃清交通系。

## 马寅初

### 北大之精神

——1927年12月在北大29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今日为母校二十九周年纪念，令人发生深切之印象。现学校既受军阀之摧残而暂时消灭，但今天之纪念会，仍能在杭州举行，聚昔日师友同学至二百数十人之多，可见吾北大形质暂时虽去，而北大之精神则依然存在。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苟有北大之牺牲精神，无论举办何事，则结果之良好，俱可期而待。今以浙江一省而论之，如以北大牺牲精神，移办政府与党务，则不出一年，必可为全国之模范省。盖浙江现时之地位，较他省优良之点甚多。财政之统一也。浙江之财政厅，尚能统辖全省财政，较之江苏、安徽、福建等省，俱远过之。江苏因为孙传芳之战事未了，所统一者仅长江以南之一部份。安徽在前数月间虽征收税吏，俱归二三军队首领所委派。福建即菜担妓女，亦俱贴印花，其财政上之紊乱，可以想见。至湖广江西等省，更无须深论矣。金融之平稳二也。全省无滥发纸币，引起金融之扰乱。军队之统一三也。教育之优良完全四也。此次革命军兴，全省所受之损失不大五也。既具此五种之优点，苟政治能上轨道，办事人员俱抱北大精神而徐图改革，则将来之浙江，必较今日可以远胜万倍。

虽然，欲图改革，必须自环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面，而在人心。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如寅初回浙未久，而请寅初代谋统捐捐局长者，不知凡几。且有欲寅初推荐往禁烟局者，彼辈之心理，以为寅初现正在反对禁烟局，则寅初推荐之人员，禁烟局不敢不留用。际此生活困难之时，在政界谋事，果属生活问题，情尚可原。然来寅初处谋事之人，甚至预先说价，必须月薪至若干元以上，或有其他不正当之收益者而后可。是故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元一“公”字之印象。故公家观念之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鹭集。故无论何界，苟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联带而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之义务，应以人民之幸福为前提，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念；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否则，若仅有表面之革命，恐虽经千百次，于国家于社会仍无补于事也。

且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如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若寅初家中妇女，如作此语，寅初本可不加深责。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诸现在之官吏与夫东西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如



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烟，果属静止之道德，然缺乏相当之努力，与夫牺牲之精神，以尽人生应有之义务。虽方趾圆颅，实类似腐尸，西人谓 lifeisactivity ，否则，反不如截发入山，做和尚之为愈，何必在世上忧优哉。

是故以北大之精神，牺牲于社会，对于全国，或以范围过大，尚须相当时日。若仅浙江一省，则改造之目的，诚可立而待也。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举凡战胜环境，改造人心，驱除此等奄奄待毙不负责任之习俗，诸君当与寅初共勉之！

## 冯玉祥

### 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1936年5月在民众抗日同盟军举义三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

民众抗日同盟军举义，转眼之间已到三年。第一周年纪念在烟台举行；第二周年纪念在泰山举行；三周年纪念日，今天在南京举行。回顾三年来的经过，以及现时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瞻前思后，不禁抱有万分隐痛。

三年前日本大举攻察，拟欲乘长城各口战胜之余威，一举而下张垣，进而作南进之企图。当时我在张垣，身边仅有二百手枪队；诸友好多劝我离察，咸以形势紧迫，不可久留。我因忝为军人，志在守土，且平素衣、食、住、行均为百姓所供给，寇来，决不忍舍人民而去，更不忍弃国土以资敌。是时吉林一带大批义军向张垣后退，同时各地民众代表络绎来张，促我树旗抗日。经数日夜之筹划，始于五月念六日通电抗日，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

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意义非常纯正，守土卫民为军人应尽之天职，抗敌图存亦系人民应有之义务。同盟军成立后，曾规定三步工作计划：第一步收复多伦，第二步收复热河，第三步收复东三省。当时最困难之问题，为军费无法筹措。六月溽暑天气，士兵尚有着皮衣皮帽者，经济困难之情形，已可见一斑。通电前，朱子桥先生从上海汇来十万块钱，并以大义相勉。我得此款，始树旗抗日，才能于短期内收复察东四县失地。

收复多伦之前敌总指挥是吉鸿昌，左副指挥是李忠义，右副指挥是邓文。康保于六月念二日克复，宝昌、沽源于七月一日克复。最剧烈一役为多伦战役。吉鸿昌甫抵多伦，一经交绥，即被城内伪军击退，军心为之一挫。这时吉鸿昌从前方来电报给我，说：“前方军事失利，多伦一时急切不易攻下。”我接电后，立即亲复一电，我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抗日本来是我死的，横竖我在后方也没有打算活着。”吉鸿昌接了我的电报，痛哭流涕地回了我一电，说：“打不下多伦，我也不回来了。”经了五日夜的鏖战，吉鸿昌亲率士兵三次肉袒爬城，多伦卒于七月十二日晨克复。总计各战役，共计伤亡一千六百余人，内有团长四人；阵亡者三百一十二人，重伤者四百五十三人，轻伤者九百七十二人。当时我令吉鸿昌将伤亡各官兵尽量运至张垣，以便分别运平医治，或妥予安葬。

多伦收复，第一步保察之计划已经完成，即进行第二步计划，预备收复热河，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从事规划一切。正在这时，日关东军部宣言逼迫抗日军即日退出多伦。我当即答复限日本军应即日退出东四省。隔日，关东军复威吓同盟军说：三日不答复，即以全力取察省。我即答复，限倭奴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取热河。我遂一面调大军三师协守多伦，一面严命守将吉鸿昌、张凌云严修战备。最后，同盟军因种种关系，内政、经济、外交均一筹莫展，不得已遂于八月五日通电收缩军事，政权交诸政府，复土交诸国人。

回忆张垣抗敌至今，瞬已三年；今强邻压境，敌焰大张，河山半壁，名存实亡。在座诸先生，度必与玉祥同感切齿之痛。去岁国家形势日危，举国

---

指当时的察哈尔省。

惶惶，玉祥凜于匹夫有责之义，不敢再度山居生活，遂毅然来京，促成中枢团结之局面。中央坚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相界，玉祥自愧才能弗胜，力辞未获；然就职之日，以竭诚辅佐蒋委员长抗敌挽救民族危亡相期。中国历史前程，大势所趋，舍求民族之解放与自由以外，殆别无他途。近日国际形势日非，敌人大举增兵，意在囊括我整个之国家，初不仅只限于华北一隅。刻时机已迫，抗敌图存之关键，稍纵即逝。深望各同志奋起努力，自救救亡。玉祥虽愚，当誓本初衷，为民族存正气，为国家留完人也。

邹韬奋

一句话演讲

——1936年10月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冯玉祥

## 精诚团结，抗敌救国

——1937年5月在辛亥滦州革命诸烈士国葬大典上的致词

主席，诸位来宾：

今天是举行辛亥滦州革命诸烈士国葬大典的日子，兄弟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回到泰安来参加这个盛典；恰巧今天又是四年前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一天；回忆当时牺牲性命收复多伦的烈士，今天五月二十六日实在是个双重的纪念日。

今天虽然是一个双重的纪念日，可是滦州革命和抗日同盟军的诸先烈们，他们的殉难却都是为的一个同样的目的——救国救民的目的。滦州起义为的是推倒满清，创造共和，使中国不受满清的奴使，所以滦州起义是光荣的民族革命。而察省抗日也不仅是要保卫疆土并且是要收复失地，所以也是民族抗争。两次举义，当中虽然隔了二十二年之久，要打倒的对象也不同，但是两次举义的目的都是为国为民，都是为的完成民族革命。今天在这里同时纪念这两桩事情，纵然是巧合，也是极有深义的。

辛亥滦州革命的经过，我们已经印了一本《辛亥滦州革命纪实》，在这里不必详说。总之，当时因为要联络革命同志，所以组织了武学研究会和军人山东同乡会（我们今天在山东泰安造碑造林也就是为的这个理由）。另外一方面，为的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暗中取得联络，曾派王金铭之弟南下接洽。十一月十二日通电宣告独立，终因王怀庆的奸诈和张建功的变节，结果失败了。

滦州革命虽然终于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当时恰当武汉起义之后，南方革命军受挫于武昌，龟蛇两山正在危急的时候，满清依靠着新军的精锐，以为革命军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所以南北和议，延宕多时。等到滦州起义之后，牵制淮军十五营不能南下，二十镇也有二十营不能南开，而攻打革命军的第三镇又调回来了一混成旅八营之众。而且清室知道了新军也深染了革命思想，不能再战，因此，攻打武汉的清军，败退广水，清室终于自动退位了。

滦州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了武汉起义的成功，而且在于后死诸同志本着先烈的革命牺牲精神，继续和帝制余孽及反革命者斗争，一直到十七年的北伐成功。所以我们在今天来纪念滦州革命，我们就要维护诸先烈所艰难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许敌人再夺取我们一寸的土地，已经失去的国土，我们一寸一分都要把它收复回来，才不负诸先烈轰轰烈烈的死难。

四年前的今天，正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时候。当时我住在张垣，敌人一百二十八名骑兵，以急行军而毫无抵抗地占据了整个热河。又看见了英勇的长城各口血战，虽然得了不少次个别的胜利，而终于被敌人个个击破，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平律危急，即将缔结城下之盟。我看见敌人已经占据了口外重镇的多伦，不久就将占据察哈尔全省，而囊括整个内内蒙古。我又看见从热河退下来的东北义勇军流离失所，军队、民众和学生的抗敌热情。当时我们好比在一间屋子里，强盗已经闯进这间屋里来了，我们也顾不得找手枪，也顾不得呼兄叫弟，只有抄起手边的家伙便和敌人拼命。察哈尔的抗日同盟

军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成立起来的。

正在同盟军加紧训练的期间，伪军张海鹏、崔新五等已经在六月四日陷宝昌，八日陷康保，威胁张垣。同盟军于是在六月中旬召集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二十日任命前敌负责将领，即日北征，六月二十二日遂克复康保。跟着就冒雨前进，于七月一日夜进驻宝昌。这个时候，抗日军节节胜利，伪军下级干部纷纷酝酿投诚。这种情形影响了驻沽源的伪军领袖刘桂堂，在抗日军克复宝昌的那一天，即通电就抗日军第六路总指挥职。驻沽源的伪军另一部张海鹏部陷于孤立，被抗日军击破，沽源也完全恢复。敌人既然连着失败，就决定集中伪军，构筑坚固的工事，死守多伦。而抗日军方面却要完全收复察省失地，以为收复东北失地的基础，七月七日起，同盟军各军开始围攻多伦，不顾日机的轰炸，不顾伪军机枪的扫射，鏖战五昼夜，在七月十二早晨十点钟，分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多伦城内。失守了七十二天的多伦终于光复了，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今天我们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四周年，我们至少应该有两点认识：

第一，敌人是不可怕的。察省抗日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枪械虽然不精，子弹虽然不充足，但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杀敌的决心、勇敢的精神、民众和军队的合作，足可以补救武器上的缺点。我们看抗日军，不怕淋雨，不怕挨饿，不怕吃苦，不怕轰炸而终于收复了察北。所以，只要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和敌人抗战，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第二，抗日军收复了察东四县，而不能继续完成收复东北四省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能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和敌人斗争。所以，今天为纪念抗日死难诸先烈，我们就要国内精诚团结，共同从事抗敌救国的工作。国内无论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要以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地提出来大家商量，以求解决之道。我们要知道，敌人对付我们的最狠毒的办法，就是挑拨离间分化……要我们自己打起来，它好在旁面收渔人之利。我们国内和平，共同抗敌就是对付敌人的最有效的策略。去年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抗日的空气更加浓厚。我们全国同胞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必定能达到完全解除国难的目的。

五月二十六日是双重的纪念日。为纪念滦州革命和察省抗日的诸烈士，我们却只有一个中心的工作，就是在精诚团结抗敌救国的前提下，各尽所能地为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

## 毛泽东

### 学习鲁迅精神

——1937年10月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加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勉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地准确，那样地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些人也不少。比如鲁迅先生所说，

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意志拿出专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跳起来，就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 毛泽东

### 孙中山的精神

——1938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时的演讲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亲手订的三民主义的新纲领，它被通过了大会，即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劈头一句所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着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共产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的，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满清而联合各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政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认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

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的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员，许多是其他党派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真、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自尊心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龄等数十万人就是为着这个而牺牲了。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它还要进攻我们的西安、郑州、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它想吞灭全中国。但是我要告诉那些发疯的敌人，他们的目的不一定达不到。不要以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就算达到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会达到。你们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一方面。而且战争打到结局，你们也一定只能占领我们一部分地方，要占领全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们得到了一个城市的速决战，同时也就要你们得到一个乡村的持久战，例如你们把山西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占领了，但数倍于你们占领地的乡村将始终是中华民国。我们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全国的同胞，日本差不多在任何一省都只能作部分的占领，日本的兵力不够分配；它的野蛮政策又激怒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有广大的军队与人民，中国又实行着统一战线的良好政策，就此决定了持久战以及最大胜利之属于那一方。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结果，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个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如象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我们的这个外线的战争，配合着内线的战争，又从各方努力把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民各项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内外夹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内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白流的呢？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能说不是必然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思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我们要使全国人民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都懂得最好的持久战方针，在这四大战中，齐心协力，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锁链摆脱掉。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向一切在前线奋战的将士们致敬礼，因为他们都在为着最后胜利作英勇的斗争，我们要向一切抗日军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们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军人；我们也要向在后方各界辛苦焦劳、克己奉公以及从事于抗战工作的各级工作人员与各级领袖们致敬礼，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直接指导了或帮助了抗战。

大会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让我们永远地团结起来呵！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宋庆龄

## 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

——1944年3月在美国纪念中山先生的广播演说

十九年前，孙中山在他那以后成为中国进步史上基本政治文献之一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这个文献的原则在今天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民族或国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联系；“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联系。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这是我们的抗日斗争的结果）与国内民主会议的召开（这到目前为止尚未举行）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同一个重要思想：只有当国际民主实现之后，世界上才会有巩固的和平。今天我们虽然在行动上不是大家都做到，但在言论上大家都承认这一点。“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当孙中山必须用几句话来总结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最大需要而奋斗的思想与经验时，他首先提出了这两件事。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这次战争的目标正是孙中山一生的目标——争取充分的民族平等。中国被满清统治了约三百年。在过去的一世纪中，中国变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并几乎成为朝鲜第二。今天，我们的沦陷区是十足的殖民地，而我国其他地区则在不同的程度上正在从半殖民地转变成为完全的民族自由的地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要摆脱一切对外的屈从和依赖。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人民现在或者将来是排外的，或者他们会有一天忘却孙中山的遗训——联合目标相同的朋友，联合真正的朋友，无论是国家、群众运动还是个人。因为这个遗训指出了中国人民的真正需要。所有的民族革命都曾得到世界各地进步思想行动的支持。美国的革命在英国人民中间有它的朋友，同时它本身又影响了法国的革命。我们推翻满清的运动深深受到美国的革命传统的影响，而我们反对军阀、争取人民政权、争取真正民族平等的运动，则又受到苏联的革命的鼓舞与支援。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 闻一多

###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的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的演讲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讲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

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 周恩来

### 抗战、团结、民主与妥协、分裂、独裁

——1946年12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话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

“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地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先生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育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蒋介石的抗战既是被逼的勉强的，所以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采。中共与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敌。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地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首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更不惜实行内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以便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使抗战陷于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敌后努力，人民在全国坚持，中国的抗战早已被蒋介石断送了。所以日寇一经投降，蒋介石便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今年一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又曾被逼地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

但不久便被他所指使的南京二月“整军会议”与重庆三月“二中全会”或明或暗地推翻了。等到东北大打与关内大打，更证明他接受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决非心甘情愿。内战发展到最近，五个月侵占我解放区这样多的地方，现在又在开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的一切欺骗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无遗了。

就这一年多的情况看来，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之间依然继续着西安事变以前及西安事变以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及人民是主张依照政协路线实现和平民主与独立，坚决拥护一月停战令，主张政协决议的依序实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蒋内战。而蒋介石则不惜破坏政协路线，坚决走上内战、独裁与卖国的道路。他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以亡国的“中美商约”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但他这种企图，一定会如十年前进行内战时一样遭遇到悲惨的失败。现在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与独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图，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想追随美帝国主义之后寻找出路，结果必走到悬崖绝壁。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人民的世纪已经降临，中国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反动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各国人民的进步，将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到来。历史的发展会警告反动统治者：内战、独裁、卖国的道路是不是要走到底？

就在目前，蒋介石还高谈“政治解决”，然而，多数人已经知道这是骗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势”。为辨别这一“政治解决”的真伪，我们只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蒋介石如果肯这样做，那才有回到政协路线上的可能。不然，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更清楚：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我们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以来的十年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是再不会上当的了。



郭沫若

## 年轻精神的品质

——1948年8月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演讲

年轻的朋友们！

讲演对于我倒不是件难事，然而要不多不少恰好“五分钟”，却使我感到困难。而主席又只要我作“五分钟”的滩头讲演，让你们好早点跳下海去，作你们的青春之舞泳。

我想了，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演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大家沉默五分钟！”于是当大家沉默到五分钟的时候，我便说：“沉默毕，我的讲演完了。”

大家假如要反问我：“你向我们作五分钟的讲演，为什么叫我们沉默五分钟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朋友，人们不是说‘沉默胜于雄辩’吗？”

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讲演的，但是当我听了刚才×先生两分钟的演讲，太漂亮了！他说：“人民的作家萧红女士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奔走，到头来死在这南国的海边，伙伴们把她埋在这浅水湾上，今天，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年轻人，今后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年轻人来围绕着她。朋友们！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感慨，请大家向萧红女士鼓掌。”太好了，我的五分钟讲演只好改变计划了，让我把年轻人引申来说一下吧。

年轻人之所以为年轻人，并不是单靠着年纪轻，假如是单靠年纪轻，我们倒看见有好些年纪轻轻的人，却已经成了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虽然还活着，但早已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

反过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见有好些年纪老的人，精神并不老，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所以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靠着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年龄。便是“年轻精神”充分的，虽老而不死；“年轻精神”丧失的，年虽轻而人已死了。

那么，什么是年轻精神的品质呢？

第一，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是一张白纸，毫无成见地去接受客观真实，他为饥为渴地请人指教，虚心坦怀地受人指教，他肯向一切学习，以养成他的智慧。这是年轻人的第一特征。

第二，是博爱的实践者。他大公无私，好打抱不平，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算，实实在在地有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而为他人服务。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二特征。

第三，是勇敢的战士。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他富于弹性，倒下去立刻跳起来，碰伤了敌干血迹，若无其事，他以牺牲自我的意志彻底一切，这是年轻人的第三特征。

这三种年轻精神的特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假如他把这些特征保持着，并扩大着，那他便永远年轻，就死了还年轻；假如他把这些特征失掉，比如年纪轻，便做狗腿子的事，那他不仅不年轻，而且老早是一个死鬼了。

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冯玉祥

## 实现中国民主

——1948年10月在纪念中华民国成立37周年时的讲话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们能来纪念中华民国三十七岁的生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我们才成为民国。什么叫民国，就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了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在说别的话之前，我先回答两个问题。有人说：“冯玉祥是政府派出来的，为什么批评南京政府贪污无能，压迫人民打内战？”你们想想，如果我说南京政府非常清廉，没有杀学生，没有捕学生，没有征兵征粮，没有抢米的风潮，……你们看可会有人相信？人家会指着冯玉祥骂，说我不讲良心话。

又有人说：“你和蒋先生是好朋友，做国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就是二十年。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大家不知道，我不是不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但说了，而且每次说了以后，还加上一封信。我出版一本《蒋冯书简》，看了就知道我一切的话，都说完了。说了人家不听，如今我不能不向全国同胞说话，向世界人民说话。我们看训政训了二十年，实不是国民党训政，而是一个人 and 少数几个人的训政。

今天在纽约能和这么多中国的青年主人翁们见面，是冯玉祥到美国后第一次最快乐的事。这原因还不仅因为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共同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七岁的生日，更因为诸位是主张中国民主的进步青年。在中文和英文报上，我都看见了，今天这个盛会的发起人，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今年在美东、美西和美中都召集了夏令会，各处参加的同学有百来位，都曾以绝对大多数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实现中国民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勇敢地提出主张来，真是合于耶稣基督勇敢牺牲的精神。中国史书上说：“禹闻善言则拜。”冯玉祥不敢比大禹，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胸公仆。本大总统这次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就是其余文武百官也都是你们的奴隶。从前帝国时代，四万万人都都是奴隶；现在民国时代，大家都是主人翁，这就是民国和帝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演讲词）可惜孙先生二十年以前说的“大变动”，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他们要四万万同胞做奴隶。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诸位青年主人翁知道自己做主人翁的责任，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结果，中华民国过去三十六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过，老百姓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反而不如一个战败的日本。一切和平和赔款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反而被逼迫地和日本通商，又作日本经济侵略的牺牲品。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四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三十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贪污不法的事情，最著名的像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孚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的情形，登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听见严厉惩办。今年夏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抬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狂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学生睡梦中糊里糊涂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到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公务员枵腹从公，好的公务员，像北平的余心清少将，是好的基督教徒，是好的美国留字主，在重庆是最廉洁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只因为说真话，主张和平，便被特务逮捕了。工矿企业家想作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就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二千二百万的农民。

一句话说，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这些人人都要打破这痛苦的现状，都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和它必然实现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大规模剿共已剿了一年零三个月，今天成绩如何，大家天天读报，知道得很清楚。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没有倒台以前，以为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总可以长期挣扎，然而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以后，团结全国各革命的力量，不到四年工夫，便扫荡了军阀，完成了北伐。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从国民党民主派到共产党，经过了八年抗战的锻炼，经过了胜利后民主奋斗的两年努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是不能摧毁的革命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今天在海外的同学们虽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虽然你们得不到随便卖给扬子、孚中公司的外汇，虽然你们之中的很多位，只买了半年用费的美金，半年之后的生活费和回国船资都无着落，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要认清，民主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你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睡洗衣馆熨衣板的精神，要有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惧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中华民国名副其实，让全中国都成为你们贡献研究心得的自由园地。这样，才不辜负我们今天来纪念双十节一场。

我们今天纪念先烈，要对得起流芳万古的秋瑾女士、黄花岗烈士、滦州起义的烈士和所有的烈士们，必须自己勉励自己，有“舜人也我亦人也”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决议案好极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建议请求你们尽量宣传，每一个人抱定一个志愿，写一千封信到国内去，把国内的同胞都唤醒过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那我们民主胜利的成功就更快了。

宋庆龄

## 打倒帝国主义，促进民族解放

——1949年7月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大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件。“七七”便标志着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侵略之一。但“七七”却又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因为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阀对我们生命财产的血腥的侵犯，也改变了那一时期的整个国际阵线的面目。我相信，每一个在这儿的人，都会记得，日本军阀曾经怎样夸口说：中国军队不能抵抗三个月。然而每一个人却也知道，尽管敌人疯狂地轰炸和海军用大炮来掩护进攻，只是在上海，我们就曾经和敌人战斗了三个月。保卫未曾设防的上海，怎样会可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曾经准备了牺牲，这便形成了一个警告。必须承认，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正逐渐地加强，因为中国人民在今天已经处在一种更其不可征服的地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此外，我们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因此，我们向全国企图阻止我们巨大的民主浪潮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警告，我们向虚妄地制造国际战争烟幕并且威胁人民民主力量的和平愿望的反动派提出严重警告：滚开吧！否则你们将同归于尽。在今年“七七”，我们中国人民很有自信地瞻望我们国家的一个光荣的未来，在那时，人民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要一并辉煌地实现。我们也预见了我们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国家幸福。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陈毅

## 加强革命团结，为被难同胞复仇

——1950年2月在上海市各界人民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胞们！各位同志们！

今晚上海各界代表举行追悼会，追悼“二六”轰炸被难的同胞。二月六日那天被炸死的同胞近五百人，受伤者六百余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我们对被难同胞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复仇。我们对受伤的同胞表示同情和慰问，希望他们迅速治好创伤，以便同我们一道去为死难同胞复仇。美蒋的轰炸落在被难同胞身上，正如落在我们身上一样。他们的伤和死，正如我们家里人的伤和死一样。沉痛和酸楚是共同的，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愤恨也是共同的。被难的工友和同胞们，他们是为了新上海的建设而牺牲。他们的牺牲永远在上海市民的纪念中。我们的追悼不仅是表示悲伤、沉痛，而应该勇敢、沉着。我们在此举行代表会，代表六百万市民，喊出一个口号。这口号就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迅速消灭蒋匪帮，为被难同胞复仇！

上海解放到现在八个多月了。八个月的历史很值得回忆一下。上海去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到六月二十三日，敌人就开始海上武装封锁，想用武装封锁的办法，逼使我们向帝国主义低头，以恢复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取消我们人民已获得的胜利。但是我们坚决进行反封锁，提出了六大任务，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低头，我们决不向敌人示弱。八个月的事实证明，敌人的封锁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民不依靠帝国主义也是可以生活的。而且我们在接管上海、建立上海的人民民主生活上有了相当成就。因此，美帝国主义就在二月六日开始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轰炸。二月六日蒋匪对上海的轰炸是美帝国主义批准的，企图用轰炸来摧毁上海。从封锁到轰炸是美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的具体政策。我们在此警告美帝国主义，你们的封锁轰炸不仅达不到你们的目的，相反的只有增加你自己的罪恶和加速蒋匪帮的灭亡。

在二月六日的轰炸中，全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努力作救护、灭火和修复工作，上海人民是沉得住气的，并不惊惶失措。例如：由于街灯失明，全市军警出动六万人，组织巡逻队，维持治安；工厂、学校、里弄居民组成自卫队、纠察队，协助军警巡查。各公用事业的工友、工程人员，昼夜努力抢修，不避风雨，使许多被炸毁的地方得到局部修复；医卫人员彻夜不停努力救治；各机关各团体迅速出动救济，使灾民初步获得食宿的达五万人。党政军首脑都彻夜办公，督导应变工作。这些，表现了上海人民的英勇气概，秩序井然。上海人民有革命的伟大团结；是经得起考验的。上海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最伟大的革命动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美蒋的轰炸是吓不倒的。

同胞们同志们！对获得解放和自由的人民表示其仇恨，遇有机会能发挥其鲁性的破坏时一定不放松，这本是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天性。二月六日的轰炸便是证明。美蒋轰炸还会继续，我们反轰炸的工作也应该加紧进行。我们应加强防空工作，考虑显著目标的伪装与疏散；妥善筹备水电供应的保持，万一水电断绝时，仍然有代替办法。我盼望各技术专家和各厂工友，在此能

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们应加强防火灭火的准备，清查爆炸物，并将其埋藏和转移；对易燃的物品应有妥善处理。一切灭火器应重加检查。公安局、消防队应更努力作充分准备。人民志愿消防队应立即组织起来。公私医院和全市医卫人员应有组织地动员起来，为防空反轰炸服务。对工友和贫苦人民的救护，更应特别关心。在上海无职业的人们应考虑疏散和向内地搬移。六百万人拥挤一团，这样大的城市，遭受轰炸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均应适当改变，以适防空疏散的需要。例如在街上结队游行、打腰鼓、扭秧歌、白天大的群众集会均不得举行。夜间灯火管制和防空警报制度均应迅速建立起来。我们上海人民要更清楚记住，在台湾未解放之前，应随时准备反对美蒋轰炸。一切部署均应考虑适合防空疏散的要求。上述工作做得好，则完全可能做到少受损失，多得安全。

我相信，深具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依靠我们的革命团结，努力作各种克服轰炸破坏的准备，一定能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的！

陆走一

## 革命的文学生

——1956年10月在首都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主义者开始，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先生作了极其崇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并吞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行所谓“剿共”的战争，和禁止人民的抗日运动。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鲁迅先生曾经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现在，这句话成了对我国现实的写照。鲁迅先生所毕生追求而没有亲自看到它的成功的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更加幸福更加繁荣的前景已经可望得到了！六万万人民，从地狱里解放了出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革命的文学，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鲁迅先生把文学当作被压迫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武器。他曾经说：“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我们的政治任务，过去曾经是实现两个革命，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革命文学，曾经在这两个革命的时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对于这种革命文学怀着感激的心情，因为这种革命文学能够鼓舞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取得胜利。鲁迅先生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还有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有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任务，但是，我们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建设，我们还要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积极参加这个为建设的斗争，为和平的斗争。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坚决地和人民大众在一起，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和平事业。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为了动员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革命的文艺家，要学习鲁迅先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同时要学习鲁

迅先生对同志和朋友讲团结的精神。对估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是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的。但是对同志和朋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团结的政策。同志和朋友，相互之间是有批评的，这种批评是应该做的。没有批评，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发展。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为了团结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革命的文艺家，对于政治上的同志和朋友，不应该有鲁迅先生所斥责的“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不应该像鲁迅先生所嘲笑的“假洋鬼子”那样不准别人革命。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曾经说过：“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现在，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一切具有爱国思想的党外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应该同一切赞成社会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在艺术上应该允许各种不同创作方法、不同艺术流派的并存和竞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又违反现实主义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成为团结的核心，去团结别人，帮助别人，并且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一切这样做的，就是对的。不这样做，不论是右的或者“左”的，都是不对的。

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们应该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文艺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们应该同全世界各国的文艺家，在维护和平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鲁迅的革命文学的旗帜万岁！



朱德

## 向社会主义新事业前进

——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的演讲

明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导师。

孙中山先生从十九世纪末期就献身于革命事业，组织革命团体，领导革命起义，为一切爱国人士所景仰。二十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更加强了对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清朝政府也更加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借以维持其封建统治。国家濒于危亡，人民生活痛苦，爱国人士莫不为救亡而要求革命。孙中山先生于一九〇五年联合许多革命团体和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同盟会会员分头在各地建立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革命起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的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一切反清力量的统一战线的成功，促成了革命的胜利。同盟会一开始就注意武装斗争，革命党利用军事力量瓦解了绿营、巡防营等旧军队。那时起义的军队注意了维持军队的纪律，不去扰害百姓，但是并不知道发动群众。同盟会会员热心于革命，努力于武装起义，但是并不知道应该注意革命的思想教育。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皇帝打倒了，形式上的民国成立了，许多人松了劲，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没有想到进一步地组织革命力量，同旧势力作斗争。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向革命进攻，一九一三年以后便控制了全国。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首先致电祝贺，一九二一年就决定联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对滇、粤、赣军讲演时说：俄国“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他指出中国革命要学苏联。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族独立英勇地斗争了四十年，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帮助中国革命（个别外国人士的帮助是有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支持中国革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上批道：“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规定的革命纲领而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范围的胜利。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事变的发展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清

朝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继承并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首先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民族问题方面，中国除台湾外，已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完全的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得到一律平等。在民权问题方面，实现了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原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在民生问题方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纲领。凡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烈追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一起，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充分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几年来为完成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努力。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方面也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不能够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过去一切革命的先烈。我们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正可以吸取向社会主义新事业前进的鼓舞力量。

## 毛泽东

### 向孙中山先主学习

——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的讲话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田汉

## 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

——1961年在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的致词

当代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七岁就登台献艺，当时艺名“七龄童”，到十一岁才改名“麒麟童”。他和梅兰芳同志同年，都是属马的，今年六十七岁，正当信芳同志的演剧生活满六十年。一九五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为梅、周两位举行过他们的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今年我们又在这里隆重举行信芳同志的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庆祝这位艺术家在解放以来所取得的新的成就和他的永恒的艺术青春，现在这个有意义的会开始了！

一位艺术工作者能竭他六十年的精力从事艺术创造，已经是值得庆喜的事。但纪念周信芳同志演剧生活六十年却有其极不平凡的意义。

这首先由于信芳同志从他的年轻时候起就能感到清末民初国事日非，人民起来反抗内外敌人的革命空气，而有意无意地把他所初步掌握的艺术武器为革命服务。我写过几首诗赠给他，第一首前四句说：

喜为人间吐不平，早年英锐已知名，曾因王莽诛民贼，亦借陈东励学生。

前者指袁世凯称帝时，信芳写《王莽篡位》，讽刺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后者指日寇入侵后他又在《徽钦二帝》中写北宋大学生陈东等的爱国行动。他还演了《宋教仁》、《学拳打金刚》等现代剧。此外像《文天祥》等政治性是非常强烈的。从周信芳同志真理探求阶段起差不多一根红线贯串下来。他曾经是一个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艺人，今天更成为共产主义者，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信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的戏剧战士，当然由于他一直追求进步，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不断地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由于他不断追求新，追求进步，他不断靠拢进步力量，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猖獗，乌云乱翻的年代，他虽有苦闷，但总是坚决靠拢党，终至走进革命队伍，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但信芳同志的革命热情是主要通过他的艺术活动表现出来的。他的具有特色的艺术对广大爱国反帝的革命人民起过很好的作用，在京剧艺术界形成一种优秀的流派，并起过广泛深刻的影响，不只在老生行，在其他的行当也拥有许多弟子。

关于信芳的艺术成就应该引起广大戏剧艺术界认真的研究和估价。这次纪念会除信芳同志外还有麒派传人的优秀表演，我们将在座谈会上充分讨论。这里只介绍欧阳予倩同志的一些看法。

欧阳老在我赴大连的前夜谈起信芳同志的艺术，说他想写一封信给我，他将每天写一点点。但因他病后体气未复，没有写，今天我回来去看他，他仍兴奋地给我谈了这些：“信芳同志的艺术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程式化的最好的结合。既有力地表现了现实，也丰富和提高了程式。从早年起，他在表演上力求真实，但也不忘把生活真实跟艺术真实的结合。他重视传统，勤苦地学习和继承传统，他真是文武全才，精通各种行当，他不是武生应行，但他能从头到底分析《挑滑车》之类的武生戏的每一动作。老生之外他能演红

生、黑头、小生，他也能说青衣花旦戏。他对戏曲结构，特别是京剧结构非常熟悉，他精通京剧场面，善用锣鼓。他的表演很注意人物性格。他塑造了许多优异的人物形象，如宋江、宋士杰、张元秀之类。他能演悲剧，但也爱喜剧，我就跟他配过喜剧。他从搞时装戏到喜爱话剧，他能编能导，也是受了话剧的影响。他虽不擅长文学，但他喜欢读书，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这就帮助了他正确有力地创造人物。”

欧阳老是信芳同志的老朋友，又跟他多年同台演出，他的评价是中肯的。当然欧阳老也说，信芳的艺术精髓，几句话还说不清楚，还有待更细致的研究总结。

周信芳同志对京剧艺术的贡献，的确正如梅兰芳同志一样，既是传统的勤慎的继承者，又是它的大胆的革新者。举《清风亭》为例，信芳同志从前辈郝寿昌学会了半部，其后从夏月珊学会了《赶子》，观摩了该剧各种不同的演出，又经与合作者琢磨研究，前后经过十来年，才把此剧生动深刻地搬上舞台，这比起前一辈的演出来已经有许多优异的创造。

信芳同志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戏剧教育家。在高百岁同志写的《学习麒派的几点体会》中看到这样一个例子。高百岁同志也学着他先生一样，在《一捧雪》中连去莫成、陆炳、莫怀古三个角色。信芳同志告诉他，不要让观众一晚看高百岁三次出场，而要让观众看这一出戏中高百岁扮演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角色。这就说明信芳同志不只自己善于刻划人物性格，也善于启迪他的后继者怎样注意人物性格的精雕细琢。

信芳同志也是一个不服小、不服老的好榜样。他七岁登台演《黄金台》一类的主要戏，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一面不倒的旗帜，这决不是容易的事，这说明他在战斗的半生中终于找到贡献自己一切的方向，因而勇气百倍地向党所指示的高远理想迈进，不知老之将至。我们借今晚这个机会祝信芳同志的艺术和身体如松柏长青。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将更隆重地为他举行演剧生活的七十年纪念！

我们号召戏剧界同志们借这机会更好地向信芳同志精进不懈的战斗精神学习！

胡耀邦

## 鲁迅的精神

——1981年9月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鲁迅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是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的革命精神和他所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在他逝世后四十五年间，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尊重。现在，我们隆重集会，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纪念他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

鲁迅的一生处于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的奴役和压迫，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黑暗时代。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抱着改造中国的目的而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和思想工作。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迷惘痛苦，但他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右翼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表现消沉、倒退的年代里，他继续以其卓越的文艺创作和锋利的思想批评，对一切阻碍中国进步的旧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跃进。我国有不少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出发，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他一生最后八、九年间，他把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他和旧势力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中的战斗性及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都达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鲁迅是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主将。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热切地追求真理，永不停顿地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鲁迅是通过长期的实际斗争和独立思考而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所以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他公开宣布，“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似前，我党正处于极困难的年代，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但还很弱小，而且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就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坚信党的力量，同党站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何等可贵的革命精神和远大眼光啊！鲁迅的革命精神是那种鼠目寸光、稍受挫折就灰心丧气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也是那种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一革命就应当出现“极乐世界”，否则就嘲笑以至咒骂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鲁迅深知革命的道路决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一定会有荆棘，有曲折；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要求，不顾会遭遇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鲁迅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但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鲁迅始终把斗争锋芒对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对敌人的斗争是异常坚决和勇敢的。在革命阵营内部和进步文艺界内部，他总是着重于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他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拒绝

任何“左”倾空谈和“左”倾冒险的错误方针。对于同志和战友的缺点错误，他出于公心，提出针砭和批评，决不含混敷衍，尽管有时可能失之过严，但总是善意的、深刻的，富有启发和教育的意义，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提高。鲁迅对自己是很严格的。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就是这样做了的。为了培养青年一代，鲁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以自己的言行鼓舞和教育青年，给了他们以前进的力量和智慧。

鲁迅的主要战斗武器是文艺。在文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有力地批驳了文艺是个人“灵感”的爆发之类的论调，指出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独立，只不过是臆造的幻影。他强调革命文艺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是改革社会的工具，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文艺要正确而有力地描写社会，并且反过来影响社会，使革命更加深化和展开，推动社会前进。鲁迅以他毕生的创作实践告诉人们，他极端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总是以思想上、艺术上尽可能完善的作品献给人民。他尖锐地指出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作家往往将革命写歪，甚至借革命文学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这样的作品对革命是有害的。在鲁迅看来，革命文艺应当对人民特别是青年极端负责任，如果用自己的错误思想把青年引入危途，那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孽。鲁迅把革命作家应当首先是一个“革命人”，看作根本问题。革命作家应当是“大众中的一人”，必须和革命同命运，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和人民大众“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这样才会有革命文艺。鲁迅十分重视文艺批评，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剪除恶草，灌溉佳花”，是文艺批评的任务。没有批评，文艺就不能前进。批评家应当有明确的是非，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才于作者有益，于人民有益。鲁迅终生孜孜不倦，勤奋的程度是惊人的。他对青年苦口忠告，要不断地努力，切勿幻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从五四运动算起到鲁迅逝世，不过十八年，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人民创作了四百万字，翻译了三百万字高水平的作品。这些著作至今几乎全部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启发力和长远流传的价值。

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十分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用很大精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艺。他关心和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三十年代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他是一个英勇而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

同志们，朋友们！

由于鲁迅逝世过早，他没有亲眼看到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的东方这块大地上所掀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鲁迅逝世前两年所作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一定要实现的预言，的的确确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

尽管我们党由于多年来的许多失误，遗留下成堆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好，尽管横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还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愈来愈相信，这几年我们党中央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民意志所确定的路线、政策和各种根本措施，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有进展。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我们今年的情

况确实比去年好。通过对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团聚力是大大加强了。我们调整和改革的决策正在逐步实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上健康稳步发展的道路。虽然今年有好几个省区发生了较大的水旱灾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我国的农业仍将是一个全面的较大幅度增长的年景。

几年来，我们党一直肯定，现在仍然肯定，文艺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都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了辛勤的努力，文艺工作是很成绩的部门之一。但是，在充分肯定文艺战线的主流的同时，我们也指出了文艺工作中同时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消极的、有害于人民的东西。同志们都记得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我们党曾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并且同文艺界的同志们进行了多次亲切的讨论，进一步提出了繁荣文艺的许多建议。可惜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重要意见，没有引起文艺界同志的充分注意。

要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情况是，好些优秀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表扬，而某些很坏的作品，则受不到有力的批评和谴责。对好作品和不好的作品，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和评论。有些同志和朋友虽然知道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但是过于忧心忡忡，老是担心刚刚恢复过来的文艺欣欣向荣的局面会被打下去。这些同志和朋友看问题不大全面，缺少两点：第一是缺少一点辩证法。如果我们让恶草和佳花并长，而不作必要的斗争，那我们的文艺只能是一个混乱的局面。第二是没有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党已经正确地总结了在发展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而始终注意和能够消除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

党中央已经并将继续精心指导全党，对于文艺界、理论界、出版界、新闻界发表过严重错误言论的人们，采取分析态度，区分不同情况，加以正确对待。

有些同志曾经做过许多好事，写过许多好的作品，由于一时的迷误，也发表了有害的作品。我们既不能因此否定他的成就和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有过成就和贡献，就放任他的有害作品。还有些同志因为过去受了冤屈，吃了苦头，有点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因此抱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怨恨的情绪来观察社会，写成作品，那就是极错误的了，我们应当通过说服和批评，帮助他们把自己有害作品修改好或索性废弃。我们党对于自己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决议，就加以撤销和废除，难道文艺界不可以借鉴和推广这种终归不仅不会丢脸反而大有出息的风格吗？

还有某些作者是由于对人民、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坚持错误的创作方向。这里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是把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错了位置。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脱离现实人民的斗争，用心造的幻影，编出几篇东西，借革命以营私。有的是对新社会发展和革命征途中难免出现的错误和曲折，不作分析。他们不懂得鲁迅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他们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作叫苦鸣不平的文学。而鲁迅处在旧中国的黑暗时代就斩钉截铁地断言，仅仅只有叫苦和鸣不平的文字，这个民族还是没有希望的，何况现在已经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有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信心。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缺乏自信力，因为没有这种自信力，就转化为信外国，信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信力。而这种他信力，到头来，



变成了使人民上当也使自己吃苦的自欺力。我国人民能够容忍上述种种错误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态度吗？对于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和硬要把这样的作品塞给人民群众，特别是要塞给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少年的人，难道我们大家不应该挺身而出，进行批评，进行抵制，这样来教育团结人民，同时，也教育帮助犯这样错误的作家吗？

我还想和同志们讨论的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骨子里从来就是仇恨新中国，仇恨社会主义，仇恨我们的党。新社会也有这样的人，如同鲁迅所说的：狮子身上也有害虫。用他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化了装从背后捅刀子的人。我决不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有好些这样的人，更不是说这样的人有多么大的能量，能够扭转已经前进的历史车轮。我只是告诉同志们，我们党认为，这种人，哪怕是极少数的、个别的，我们也决不能丧失应有的警惕性，小看他们的危害。对这种人的反革命罪行，必须绳之以法。

我们把党对当前文艺界和其他思想界的错误倾向的看法和克服的方法，告诉了同志们。我相信广大文艺界同志和人民群众是赞成的，但也免不了会引起国内国外有些人的议论。其中可能有的人要鼓起舌根起点哄，甚至咒骂几句，这也无关大局。鲁迅说得好，一切古今人从来就没有被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而是因为被揭穿了假面具。我们党被骂过几十年，不是从来没有被骂倒过吗？而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终究是要被揭穿的，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同志认为，为什么只要思想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其他战线不要开展？难道只有思想界才有消极面而其他战线没有消极面吗？

这完全是误解。我们党一直认为，我们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同时都存在大量的问题。我们的一切工作，既有光明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又有阴暗面，这是决不可忽略的一面。

当前，我们的工作中，广大干部、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除了思想战线上一些人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之外，其他战线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例如，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不钻研问题，又不解决问题，死抱住老框框，对必要的改革不感兴趣，对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极不负责任的那种官僚主义现象。例如，在某些部门，首先是某些经济部门的某些同志，缺乏全局观点，凡是不合自己的局部利益和口味的事，就扯皮，就顶着不办。这是一种损害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错误行为。例如，在某些工矿企业和某些农村社队干部中，违反党和国家历来主张的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全局观点，打着代表群众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工人、农民中的落后意识，一有机会就向国家敲竹杠，要高价，这是损害国家利益的错误行为。例如，某些干部不顾党纪国法，胆大妄为，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个人的私利，甚至发展到向外国人索取财物，接受贿赂，丧失国格人格。所有这些消极的因素，都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采取正确的方法，坚决地加以克服。

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有，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还会有各种阴暗现象。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容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祸害。我们的党历来说，我们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同这些错误的、丑恶的行为以及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个斗争不是几天，不是一年二年，而是经常的，像鲁迅所提倡的那样，靠长期不懈的韧性的战斗。

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急急忙忙乱斗一通行吗？不行。拖拖沓沓放任自

流行吗？不行。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民内部，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历来行之有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恢复和发扬这种作风，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经过一个时间，使我国人民人人都学会使用这个武器，正确运用这个武器。

有同志说，这个武器运用得好，可以使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变成好同志，使好同志变为更好的同志。这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我们党认为：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自我教育的一大法宝，是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一大法宝，是提高我们各族人民精神境界，发扬新社会优良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大法宝。

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界和整个思想战线的同志们，在学习和正确运用这个法宝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文艺界和一切思想战线上的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你们就可以极大地帮助党更好地实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党之所以热切地希望文艺界和一切思想战线上的同志，首先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消极因素，发扬自己队伍中的积极因素，完全是出于这个积极的目的。我们党相信，经过千锤百炼，做过巨大历史贡献的我国思想战线的革命大军，一定能够把这个光荣的任务担当起来！

同志们，朋友们！

去年二月，我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曾经说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攀登这么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我们是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同志们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包袱，还有这样那样的创伤。能不能攀上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高峰去呢？有人会掉队，有人会开小差吗？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抛弃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事业的同志，也决不会抛弃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总之，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我们还必须加强同各国进步的文艺界思想界的友好往来，吸收他们的一切优良成果，并同他们一起，共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携手并进。

在我们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努力奋斗吧！

## 附录：人物简介（按姓名音序排列）

### 艾青（1910——）

浙江金华人。中国现代诗人。1928年艾青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在院长的鼓励下，次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艾青归国潜心诗歌创作，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投身于革命文艺运动。7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被判徒刑6年。1935年获释后，开始发表诗歌创作。抗战期间，艾青以其诗作投入到争取进步艺术的战斗之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延安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57年被错划左派，离文艺界去黑龙江、新疆等地接受“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又一再受到批判。1976年后重新获得创作自由，1979年当选为六届人大常委，1985年荣获法国授予的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

### 巴金（1904——）

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年发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 蔡畅（1900——1990）

湖南双峰永丰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1915年入长沙私立周南女子师范求学，191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年10月与向警予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上海、香港妇委委员等职。1931年底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部长，

江西省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常委，任女工部长。建国后，为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和第四、五届副委员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在40年代后期，她还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副主席。蔡畅一生为妇女解放、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陈独秀（1879——1942）

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与李大钊等在上海主编《国民日报》，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13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成为“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下遭受了惨重的损失。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党的总书记职务。此后他拒绝改正错误，并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反党小组，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逝。

陈独秀是我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迹的人物。他从早年积极宣传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最后堕落为反党的托派分子，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但是他早年那些叱咤风云，领时代之潮流的呐喊，仍不失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 蔡锷（1882——1916）

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8年，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并参加维新变法派组织的自立军，准备拥护光绪皇帝当选而起兵“勤王”。起义失败后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懂得救亡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此后立志习武，以图报国。1904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等省训练新军。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积极配合，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担心他拥兵自重，下令调他进北京，暗加监视。由于袁世凯违反

民意，企图恢复帝制废除共和，于是蔡锷和梁启超策划反袁。于 1915 年底在云南组织救国军起兵反袁，云南独立后不久，贵州、广东、浙江等地也纷纷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蔡锷任四川省督军及省长，后因病赴日本就医，不幸逝世。

### 蔡和森（1895—1931）

湖南湘乡人。1918 年同毛泽东等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 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寻求救国道路，明确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1921 年 11 月回国后不久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二大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1925 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 10 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 年 4 月回国，在中共五大上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不久，被陈独秀借故去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席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坚决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继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在党内受到错误打击。在 1928 年底至 1930 年底赴苏联治病期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继续为党工作。1931 年初回国，被派往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 6 月在香港被捕。被捕前共产国际已来电通知中共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但他本人未能获悉，不久即遭杀害。

### 陈云（1905—1995）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管理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1919 年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1925 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等。后回上海先后担任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并从事工人运动。1930 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 年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 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指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军第五军团任中央代表。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又由上海去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7 年冬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的建树。1944 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

局书记，后任东北局副局长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对解放全东北和恢复东北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出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对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除继续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的名义外，被解除了在中央的一切领导职务。197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这些主张，对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结束多年来经济指导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陈毅（1901——1972）

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重庆《新蜀报》任文艺副主笔。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后曾在四川旧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党委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1928年4月，同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起义的农军，在江西耒市同毛泽东部会师，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赣南领导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北。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1902年，他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李大钊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奔走呼号，倡导抗日，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提出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等颇有影响的思想见解。

### 丁玲（1904——1986）

湖南临澧人。中国现代作家。“五四”运动时，即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游行和演讲等学生运动。20年代中期，丁玲开始发表作品，成为引人注目的女作家。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左翼作家、进步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以及国际文人友人曾发起营救运动。193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丁玲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历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丁玲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诞生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及常务副主席，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又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78年，丁玲恢复名誉，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86年病逝。

### 邓小平（1904——）

原名希贤，又名斌。四川广安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及总设计师。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前苏联学习。1926年底回国，被派到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曾被当时党内“左”倾的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战争。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7年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1973年3月恢复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因受江青一伙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前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以后，不再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实践。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 邓颖超（1904—1992）

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3年至1920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后任小学教员。1919年“五四”运动时，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并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4年发起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响应孙中山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运动。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1925年调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她在1926年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她在上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10月，带病参加长征。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1939年至1946年她大部分时间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央妇委副书记。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从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为历届中央委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83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她



提出的不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请求。1988年以后，也不再担任国家的领导职务。

### 邓中夏（1894—1933）

湖南宜章县人。我国劳工运动的领导者与积极参与者。早在“五四”运动时，当时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就开始精心研究劳动问题，并参加了北京的工人小报《过去音》的工作。1920年底，他到长辛店筹划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翌年初，就组成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1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是负责人之一，在翌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他任书记部主任。在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中，他参加和指导了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到来之际，他参加了组织和领导上海22个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继而又领导省港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邓中夏是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最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后，他每次都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8年夏，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在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他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留驻莫斯科。在此期间，写下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1930年他由莫斯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特派员第二军团政委，1933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 冯玉祥（1882—1948）

安徽巢县人。中国近代爱国将领。少年时入保定练兵营从军，后入袁世凯武卫右军，任第二十镇管带。辛亥革命时，曾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共谋滦州起义。辛亥革命后任近卫军团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坚决反对，并促使陈宦在四川独立。张勋复辟时，他率部入京讨伐。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北京政变，通电主和。后组织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1925年任西北边防办，统领西北军。翌年赴前苏联考察，加入国民党。回国后被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1928年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反蒋中原大战。1933年建立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多次击败日寇，收复失地。因受蒋介石压制而辞职。他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反对内战，主张坚持抗日，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支持中国内战。1948年7月，应中共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归国途中不幸因船失事而遇难。

### 方志敏（1899—193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江西弋阳人。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南昌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在江西积极领导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925年7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江西省农协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转战赣南农村，领导弋阳、横峰武装起义，创建赣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在

白色恐怖势力的包围中坚持并发展红色据点，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参加并粉碎了几次反革命“围剿”。1934年11月，受命率红十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抵皖南后于1935年1月中旬向赣北怀玉山区转移。1月29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12篇文稿和信件。1935年8月6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参与四川保路运动。1918年开始创作新诗。“五四”时期他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与郁达夫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创造社”，标举自我，弘扬个性，反抗现实。1924年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文学革命。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出师北伐。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古代史和甲骨文研究。抗战开始时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并组织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华罗庚（1910—1982）

江苏金坛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24年从金坛县初中毕业后，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0年因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重视，被邀请到清华大学当助理，一年后任助教，又一年升为讲师。1934年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其间写有《堆垒素数论》专著，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46年去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在美国意大利诺斯大学任教授。1950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1958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67年开始研究优选学，写成《优选学》和《优选法平话》，并到全国各地开展推广运用统筹法和优选法工作。这期间，华罗庚教授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1978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数学大会时，不幸猝然病逝。

###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学者，以倡导文学革命闻名于世。1904年入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任《竞业旬报》编辑。1910年赴美国留学，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5

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从师于杜威。1916年《寄陈独秀》一文在《新青年》发表，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1917年在该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提出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2年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织“好人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特使身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193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京大学校长、旧国大代表等职。1948年后，长期居住美国，后去台湾。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 黄兴（1874—1916）

湖南长沙人。民主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和杨笃生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参加拒俄义勇队。回国后，1904年和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未发事泄，逃亡日本。次年在日本协助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执行部庶务。1907年后，参与和指挥钦州、防城起义、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广州新军起义。1909年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1911年与赵声领导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亲自率领敢死队进攻两广总督署。失败后返香港。武昌起义后，被任命为革命军总司令。汉阳失陷后，因与武昌地区革命党人意见不一致，辞职赴上海。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兼灵参谋总长。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黄兴主张武装讨袁，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美。1916年病逝于上海。

### 何香凝（1879—1972）

近代女革命家。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幼时爱听太平天国故事，反对妇女缠足。1897年10月与廖仲恺结婚。1902年，随廖赴日本留学，先后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结识孙中山后，投人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7月参与同盟会创建活动，从事革命宣传和联络工作。辛亥革命后，始随廖返回广州。“二次革命”爆发后，参加讨袁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与廖一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和中央执行委员，即号召妇女参加革命，兼组织各界妇女联合会。廖被刺后，继续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沈钧儒等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美协主席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擅长国画。

### 胡耀邦（1915—1989）

湖南浏阳人。政治家，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参加了长征，先后在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做民运和青年工作。到陕北后，先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诞生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1952年起，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和团中央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197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是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中共十二大所作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并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冲破重重阻力，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 黄炎培（1878—1965）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江苏川沙（今上海川沙）人。举人出身。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董事。次年成立爱国学社为教员。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赴美国考察，回国后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1949年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 陆定一（1906——）

江苏无锡人。1918年起，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在上海学联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大学毕业，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任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1930年回上海，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1931年，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部长。1938年，到晋东南，任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部部长。1940年百团大战后，调回延安。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解放日报》总编。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54年7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文化大

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编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18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同年与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从1919年底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1920年他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在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他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 梁启超（1873——1929）

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梁启超从小熟读四书五经，17岁中举人。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梁启超愤中国积弱不振，于是同康有为一一道，倡导变法维新，随康有为一一道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廷变法。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与推进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康有为一一道建立保皇党，创办《清议报》、《新民众报》等，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受到民主革命派的反对。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策动蔡愕组成护国军反袁，反袁运动结束后，又出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五四”时期，他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专制的复辟，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在学术上多有建树。

### 刘少奇（1898——1969）

湖南宁乡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派往前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回到上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领导工运。1923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5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即赴上海，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夏任中央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首席代表。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2年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中先后任红八军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抗战爆发后，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年5月任华中局书记。1943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职。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逝世于开封。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刘少奇一生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 鲁迅（1881——1936）

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02年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任教。其间他发表了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小说《狂人日记》，并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转赴上海。这期间，他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左翼作家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36年10月病逝于上海。

### 李远哲（1936——）

美国华裔化学家。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62年留学美国，196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在气态化学、动力学、分子束及辐射化学领域有重要成就。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

### 廖仲恺（1878——1925）

广东惠阳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出生于美国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偕夫人何香凝留学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共同组织同盟

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并兼理财务，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他出任财政部次长兼广东财政厅长。1922年受孙中山委托与前苏联代表越飞谈判，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因领导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坚持执行三大政策，于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 茅盾（1896——1981）

原名沈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窘迫，不得已中断学业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茅盾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运动之中，并于1921年1月，与郑振铎等十二人成立了新文学运动最早的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倡导文学要反映人生，反对把文学当成消遣品。同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30年，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与鲁迅一道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时期也是茅盾文学创作丰收期，长篇小说《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发表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抗战胜利后，茅盾积极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揭露国民党反民主、要内战的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政协常委和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1981年病逝于北京。

### 马寅初（1882——1982）

浙江绍兴人。著名学者。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被保送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1927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因反蒋而被监禁数年。1944年恢复人身自由，但被剥夺在公立学校任教和发表文章、演说的权利。后到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至196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历任全国政协第一、三届委员，第二、四、九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五届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5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以大量调查分析为依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人口有计划增长的人口理论，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60年以后专心从事著述。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

### 毛泽东（1893——1976）

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913年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湘江评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等革命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初，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任中共中央农运委员会主任、全国农协总干事。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发动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历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担任此职直到逝世。抗战中，于1943年3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主席。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一生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阶段都写下了重要的著作，为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崇高尊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 彭德怀（1898—1974）

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同年11月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反“围剿”作战。后参加长征，历任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支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抗战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7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重新工作。“文革”期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彭德怀一生光明磊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彭湃（1896—1929）



广东省海丰县人。原名彭汉育。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1916年在校读书时即组织“群进会”同学斗争当地劣绅地主。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救国运动。1921年回国后，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及《新海丰》、《赤心周刊》等刊物，积极宣传革命主张。不久，即致力于农民运动，与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决裂。1922年9月，组织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在他的领导下办起了“济丧会”，设立“农民医务所”。到1922年2月，海丰县成立了农会，会员超过10万，彭湃当选为县总农会会长。广东省农协成立，彭湃当选为委员长，兼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7年1月，彭湃带领一部分武装队伍转移到海陆丰，组织自卫军，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928年春调至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农委书记并参加江苏省委的领导的工作。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闻路经远里开会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外国巡捕和中国包探拘捕。8月30日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

### 乔冠华（1913—1983）

笔名乔木、于怀。江苏盐城人。外交家。1929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后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次年底到香港，为《时事新报》撰写社论，并为《世界知识》杂志撰写国际述评。1945年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述评》专栏。1946年再赴香港，担任《华商报》社论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建国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 秋瑾（1875—1907）

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革命家、作家。她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1898年前后，随夫到北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蹂躏国人的悲惨景象，从此思想发生剧变，决计献身革命。1904年，她赴日留学，先后参加实行共爱会、演说练习会等。次年初，她一度回国，加入光复会。7月再返回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评论员和浙江主盟人。她经常登坛讲演，鼓吹革命，又学习射击和制造炸药，准备以后进行武装斗争。1906年回国，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积极联络会党与军学各界，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同时在安徽和浙江两地起义。7月徐锡麟起义失败，清政府由此发觉皖浙联系，派军队包围大通学堂，13日秋瑾被捕，15日从容就义。

### 钱学森（1911——）

中国现代科学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留学美国，1938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科工委主任等职。提出跨声速流动相似律，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

### 宋教仁（1882—1913）

湖南桃源人。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1904年12月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划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后被推为湖南分会副会长。1907年受派到东北创同盟会辽东支部。1910年在上海主持《民立报》，次年与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干事，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北迁后，到北京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回到上海，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政团，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以图限制袁世凯专权，引起袁的忌恨。1913年3月从上海北上时，被袁派人刺死于上海车站。

### 沈钧儒（1875—1963）

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主张变法维新。1904年中进士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从事宪章运动，曾任浙江咨议局副局长。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光复工作，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长，加入同盟会和南社。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先后任浙江教育司司长、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护法运动中任护法军政府检察长。后任直系军阀政府参议院秘书长，曾反对曹锟贿选。国民党统治时期，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律师协会理事长，热心于教育和民主运动。1935年因力主抗日，发起成立救国会，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参政员、旧政协代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与黄炎培等共同创建、领导了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

### 宋庆龄（1893—1981）

曾用名庆琳、林泰。原籍海南文昌，出生于上海。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1908年留学美国。1913年回国，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她辅助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制订三大政策、实行新三民主义等重大活动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对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痛斥了蒋介石的叛卖行径。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她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被迫出国，1929年5月回国后，拒绝担任国民党党政职务，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此后，她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支持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并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她应邀任名誉主席。1949年9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

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和196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 邵力子（1881——1967）

近代教育家、政治家。原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早年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提倡新文学，主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1926年退出共产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前苏大使和巨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今北京）。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

### 孙中山（1866——1925）

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曾在澳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1894年9月从上海去檀香山，11月组织兴中会。1905年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他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并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起响应。他于12月19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组成临时参议院。2月12日清帝退位。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力下与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孙中山于2月13日被迫辞去大总统职，3月主持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他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他号召起兵讨袁。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1918年被迫去职至上海。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离广东退居上海。1924年1月，在中共、苏共的帮助下于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事，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 田汉（1898——1968）

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1917年赴日本求学。1922年回国，在上海书局任编辑，同时任教于上海大学，创办《南国月刊》，发表了《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翻译《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925年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电影《到民间去》，1927年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至1928年建立“南国艺术学院”。1930年6月，反动军警查抄了“南国社”，田汉即带领“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转入地下活动。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1934年创作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1935年2月，在上海被捕，后解住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等保释，出狱就医，软禁南京。出狱后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演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回故乡长沙创办《抗战日报》任主编。抗战胜利后，1949年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建国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文革”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将他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打成所谓“四条汉子”，于1966年被捕入狱，于1968年12月10日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于1979年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 陶行知（1891——1946）

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上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从事民主运动，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引导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 陶铸（1908——1969）

湖南祁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及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曾组织和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交涉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地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治委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秘书长、总政法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平津战役时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并担负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來华南分局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三届全国委员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给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名誉。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铸针对青年中一些思想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了不少杂文，做了不少讲演。

### 闻一多（1899——1946）

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少年时即开始创作诗歌。早年参加文学社团“新月社”。1922年赴美留学，专习美术、文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及抗战胜利后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1944年加入民主同盟，次年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长。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与血腥统治造成的黑暗现实，使他拍案而起，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中。1946年7月14日，在参加追悼李公朴大会后，于归家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

### 向警予（1895——1928）

湖南省溆浦县人。1915年，在周南女校学习期间即投身社会活动。1916年夏于周南女校毕业回家乡创办溆浦女校。1918年底来到北京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遇到从湖南去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加入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5月，给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1921年底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担任了妇女部长。在其直接领导下，1924年1月成立了上海丝厂女工协会。1928年春回到武汉，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在市总工会和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4月12日被“引渡”到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于5月1日被害。

### 夏衍（1900——）

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的组织者、领导者。1919年即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中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日本深造。留学期间，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夏衍于1927年被迫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并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1935年，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敌人破坏，夏衍受到追捕，避居

于上海一家小公寓之中。在蛰居期间，开始话剧创作。1937年抗战开始，夏衍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总编，尔后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夏衍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岗位上。

#### 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利群书社”和“共存社”，传播马列主义，团结进步青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者。1926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打击，被调到上海沪东区工作。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1931年4月在南京英勇就义。

#### 杨虎城（1893——1949）

陕西蒲城人。西北军爱国将领。1911年率“中秋会”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陕西革命党人成立“靖国军”，任第三路军第一支队司令。1924年加入国民党，次年率部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6年1月至9月率守军万人在西安保卫战中击溃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进攻，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作为陕西省最高行政长官，积极支持各界人士的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3月，在石家庄见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遭拒，其后被蒋介石撤掉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初，张学良率东北军移驻西北地区，张、杨二人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导的协调和帮助下，加紧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被迫辞职，1937年6月赴欧美“调查军事”。10月底归国时在香港被蒋介石扣押拘禁。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 时圣陶（1894——1988）

著名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江苏苏州人。从小受革新运动的影响。1919年3月加入新潮社。“五四”后即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激流。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1923年后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解放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教育部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 杨振宁（1922——）

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6年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弱相反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原理，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朱德（1886——1976）

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在蔡锷所部任营长、团长等职。1915年参加反袁起义，出征四川，升任少将旅长。“五四”运动后逐渐接受马列主义，随后赴德留学。1922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德政府驱逐。1925年赴莫斯科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后率部分起义军在湘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1928年4月率部在宁冈与毛泽东所部会师，成立红四军，任军长。1930年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委主席。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错误，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了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司令。1941年中央军委成立，他任副主席兼军队总司令。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常委会委员长。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的一生为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尤其是领导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国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张澜（1872—1955）

四川南充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年主张维新变法，参加资产阶级立宪请愿运动。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发动了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四川发动武装讨袁。1920年曾任四川省长。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成都师范校长、成都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41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选为同盟主席。1944年该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仍任主席。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流产后去上海，被国民党当局软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 赵树理（1906—1970）

山西沁水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曲作家。赵树理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参加劳动，深受农民生活、情趣与语言的熏陶。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参加了校内共产党领导

的学生运动，并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因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潜回家乡，失掉了学籍与党籍。此后在家乡从事小学教书、差役、店员等工作，并开始进行创作。1936年赵树理经友人之聘任乡村师范语文教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编写小型街头剧，亲自参加演出。次年重新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等地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编辑，并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类“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解放后赵树理继续用他的作品捕捉时代的新旋律，深刻表现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生活。1962年，因大连会议受牵连。1965年调山西省文联工作。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文革”中，赵树理受到迫害。1970年9月在太原病逝。

赵树理是一位来自农村、反映农民心声的农民作家。他严格遵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创作原则，反复申述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道理。他的一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几代作家接受党的思想教育、跟党走听党话的知识分子形象。

### 邹韬奋（1895—1944）

江西余江人。1912年进南洋公学读书。1919年初，转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3年由黄炎培介绍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并编译《职业教育丛书》，开始新闻出版工作。1926年10月，接手《生活》周刊。“九·一八”之后，《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妥协政策和卖国谬论。“八·一三”后，他在“孤岛”上海、香港、重庆等地主编和出版了《抗战》。1930年，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1月，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由于以宋庆龄为首的救国会等团体和爱国人士的积极营救，被释放出狱。不久出版《抗战》三日刊。1941年辞去参政员身份秘密前往香港。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后转移梅县。为躲避蒋介石的迫害，又转移苏北根据地。1942年12月到达苏北解放区。1943年3月赴上海治病，由于病情严重，1944年7月24日经抢救无效逝世，被党中央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章太炎（1869—1936）

原名炳麟，又名绛，字枚叔。浙江省余杭人。为近代著名的革命思想家和学者。章太炎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日甲午战争造成了民族的深重危机，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夭折后，他东渡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章太炎从维新梦中惊醒过来，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主张。开始树起反清旗帜，并剪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加入光复会，对革命充满信心。1906年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08年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亲至警庭，慷



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最后以妥协告终，章太炎对此不满，加之早与同盟会产生裂痕，故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拥护袁世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錮。袁死后被释放，后一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9年他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躲进“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思想渐趋消极，钻研文学音训经史，有深邃修养。但当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祖国时，又出来谴责国民党右派“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病逝。

### 周恩来（1898——1976）

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0年赴法、德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和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会委员长及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任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27年3月参加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蒋、汪叛变革命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中共“六大”之后，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江西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8年底到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1945年8月与毛泽东一起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南京。1946年11月后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从中共“五大”到“十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中共“六大”至“十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八届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一生为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 张闻天（1900——197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不少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中国共

产党的地下工作。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担任工作。1930年底回国后，任中共宣传部部长。中共临时中央局成立后，任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摒弃王明的“左”倾错误，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前苏联大使。1955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1959年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理。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对他做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 张学良（1901——）

字汉卿。辽宁海城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东北军爱国将领。1936年12月12日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蒋抗日。12月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并立即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开展全国对日抗战奠定了基础。在伴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留。此后，长期被蒋囚于大陆、台湾。1991年90岁高龄时重获自由。

#### 周扬（1908——1989）

湖南益阳人。中国现代著名理论家。早年在上海民国大学、厦门大学读书，曾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重新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主持左联活动并兼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奉调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1938年，主持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1939年起，任鲁艺院长，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1942年，参与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此后撰写许多文章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1949年，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被选为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控为“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和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彻

底平反。

